

我们拉丁美洲作家都欠了奥内蒂一笔还不清的债。
——巴尔加斯·略萨

Juan Carlos Onetti
El astillero

造船厂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著
赵德明 王治权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南美洲最伟大的小说家。

——胡利奥·科塔萨尔

奥内蒂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是我们现代派文学的基石。在叙事的智慧和文学想象的挚爱方面，他给我们所有人上了一课。

——卡洛斯·富恩特斯

奥内蒂是南美现代文学的经典和巅峰。

——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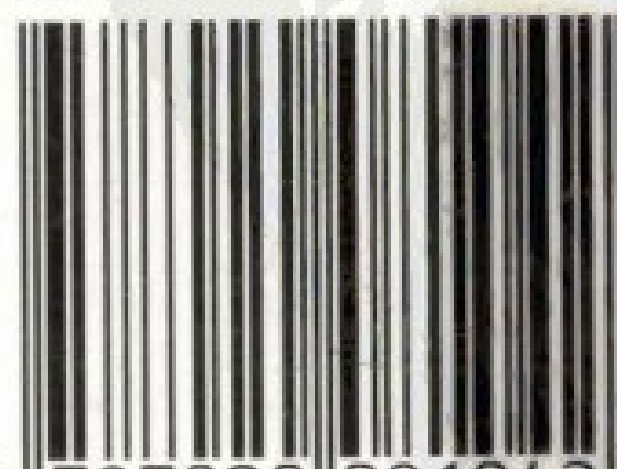
他的每一本书，每一个故事，都仿佛一部尚未写作就已存在的长篇小说巨作中的部分篇章，仿佛一幅跨越空间与时间的地图的局部，那是虚构的圣玛利亚和真实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的城市风光。

——安东尼奥·穆尼奥兹·莫利纳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02-008104-2



9 787020 081042 >

定价：21.00 元

Juan Carlos Onetti
El astillero

造船厂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著
赵德明 王治权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275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造船厂/(乌拉圭)奥内蒂著;赵德明,王治权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104-2

I. ①造… II. ①奥… ②赵… ③王… III. ①长篇小说—乌拉圭—现代 IV. ①I7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7299 号

JUAN CARLOS ONETTI

EL ASTILLERO

Copyright © Heirs of JUAN CARLOS ONETTI, 1961

All rights reserved.

特约策划:彭 伦

责任编辑:胡真才

装帧设计:张志全

造船厂

[乌拉圭]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著 赵德明 王治权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125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104-2

定价 21.00

圣玛利亚——奥内蒂创造的文学世界

赵德明

距今大约三十年前,我们开始翻译乌拉圭著名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代表作《造船厂》的时候,感觉无论语言、文字还是内容情节都十分陌生,很难理解人物的言谈举止、心理活动以及当时的社会氛围。有趣的是今天再看《造船厂》,感觉当今社会生活的某些阴暗面与《造船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行贿、受贿、投机倒把、官场腐败、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和尔虞我诈……由此不得不佩服胡安·卡洛斯·奥内蒂对资本主义入木三分的认识水平和远见卓识。《造船厂》创作于一九六一年,距今快有半个世纪了,但是它放之四海的普适价值并没有贬值,恰恰相反,这两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尤其是美国金融界欺诈行为造成的危害,简直就是《造船厂》的当代版。由此我们更加怀念和钦敬奥内蒂的为人与为文。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于一九〇九年七月一日出生在乌拉圭

首都蒙得维的亚。他从小就酷爱文学,十三四岁时开始小说创作。少年时因家境贫寒,靠自学成材。他先后做过出版社的校对、编辑。青年时期当过英国路透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记者,后升任办事处主任。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还协助创办乌拉圭《前进》杂志和阿根廷《请看与请读》杂志。四十五岁时,经乌拉圭总统的推荐,奥内蒂担任了执政党机关刊物《行动报》社长。三年后即辞职。四十八岁时担任首都图书馆馆长兼国家喜剧院艺术指导。五十三岁时获得乌拉圭国家文学奖。六十六岁时,由于参加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受到军政府的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后来定居西班牙专心从事小说创作。一九九四年,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病故于马德里,终年八十五岁。

奥内蒂从三十岁起正式发表长篇小说:一九三九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井》问世,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反英雄形象:离过婚,不满社会现实,对生活悲观失望,怀疑现存的秩序和价值观。这对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学的乡土观念是个冲击,因为表现乡土生活的地域主义文学主张作家应该深深扎根乡土、表现乡土,才是作家的出路,结果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十分干瘪,渐渐地失去了读者。奥内蒂解放思想,认为想象力与虚构结合才会大有作为。他把这一认识付诸于创作实践中,成为开启拉美先锋派文学的领军人物。这样的超前优势,他一直保持到晚年。

一九四一年奥内蒂发表了长篇小说《无主的土地》。故事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书中还提到了希特勒、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人公名叫亚尔维,是个革命知识分

子、共产党员,但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甚至同情托洛茨基派。但是这个人物的嘴脸十分模糊,他很快就加入到失意的人群中了,他们都厌恶战争和政治斗争,怀疑精神道德的价值,宁肯与流氓、妓女为伍,成为“冷漠的一代”。

一九四一年奥内蒂还创作了长篇小说《圆梦》。主要情节讲述一位贵妇愿意花钱请剧团老板复制出她做的一个梦,因为这个梦让她快乐幸福。老板于是雇佣了两男一女为贵妇圆梦。表演到最后,贵妇死了!是自杀呢?还是梦里他杀?死于梦内呢?还是梦外?作者都没有交代。但有一点十分清楚:贵妇渴望从现实遁入到幻想中,极力把现实嵌入幻想。整个故事由晚年的剧团老板在养老院里讲述出来。

一九四三年他的长篇小说《为了今晚》问世,作者以西班牙内战中人民阵线的内部斗争为题,写了一个共产党领袖的故事。内部分歧迫使这位领袖投敌叛变、出卖同志,他企图躲开党内的惩处,但又不愿意落到警方的手中,于是东躲西藏,满城鼠窜。作品用了大量笔墨描写他惶惶不可终日的狼狈处境。但作者又没有把他完全抹杀,还特别安排了他帮助一个少女逃离虎口的情节,表明了落魄中的他还仍然有人性闪光的一面。作为主人公的对立面,作者塑造了强有力的铁腕角色:警察莫拉森,他性格粗暴、嗜杀成性,没有任何的政治信仰,他是人性丑恶的化身,他要摧毁一切真诚、善良、美好的人物。这部作品虽然有政治色彩,却远非演绎意识形态的小说。

一九四四年他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题为《鲍伯,欢迎你》,一个无名氏讲述了如下的故事;他年轻时与鲍伯交往,十分嫉妒鲍伯的

英俊、充满活力以及青春浪漫的生活。鲍伯有个妹妹准备与老翁结婚,他坚决反对。但妹妹不顾一切,终于成婚。叙述者幸灾乐祸。尤其是鲍伯经受了种种失败挫折之后疾病缠身,上了年纪之后陷于彻底的颓败。叙述者暗暗拍手称快。鲍伯晚年的精神状态可以概括为:堕落到无耻的地步,是个彻底的行尸走肉。而且与他同龄的人都有道德沦丧的病态。

在《鲍伯,欢迎你》里,作者彰显了驾驭“主观时间”的能力和高超的叙事艺术表现力。作品中的时间特点是缓慢的,为描写心理活动服务,巧妙地运用了内心独白的手法。在叙事技巧方面,他设置了迷宫,情节进退交错,倒叙与跳跃交叉前进,并非是直线叙述,而是螺旋式的上升。这些技巧为拉美心理现实主义的形式打下了基础。

一九五〇年他的《短暂的生命》问世。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名叫胡安·马利亚·布劳森,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故事一开始描写主人公的妻子由于外科手术而失去一个乳房,他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但有被解聘的危险。正当他经济十分拮据的时候,电影制片商请他写一个剧本,虚构几个人物,住在一座虚构的城市里,他给这座城市起名叫圣玛利亚。布劳森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妻子赫特鲁迪斯的生病经历。安排了一位老医生出售吗啡。布劳森准备写作剧本,打算从老医生写起。但他一直没动笔。可是圣玛利亚这座城市却诞生了。它是文学虚构的人造现实,是座虚拟的城市。为了沟通这个虚构与真实的关系,作者让布劳森帮助一个杀人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逃入圣玛利亚,从而把写实与想象结合起来。这个

从写实到虚构的质的飞跃是借助一个平台完成的：让布劳森与一名妓女发生关系。这个妓女名叫盖卡，与布劳森为邻。围绕布劳森与妻子赫特鲁迪斯、与女邻居盖卡、电影制片商斯坦因、与广告公司老板麦克劳尔的关系形成了第一个人物圈，活动的舞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

第二个舞台是盖卡的房间，但房内的活动全是布劳森猜想出来的，虚实参半：他与妓女居住一墙之隔，全凭对女邻居的动静的猜测得出结论。读者所得到信息的准确性非常有限。在布劳森想象出来的世界里，他另外有个名字：阿尔塞。他想象的那个世界一定有个给妓女撑腰的地痞，名叫埃尔内斯托。凭着探听隔壁的响动，这个地痞大概经常在做爱时殴打盖卡，甚至叫嚣要杀了盖卡。布劳森猜想这三个人物活动的范围应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圣玛利亚两地，即处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一个地方。

第三个舞台是纯粹虚构的圣玛利亚。主要人物全部更名改姓：布劳森化身为迪亚斯·克雷伊医生，布劳森的妻子化身为埃莱娜·萨拉，但是埃莱娜又成了制片商的老婆。其实，这全都是作者借助布劳森的想象编造出来的。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读者会发现是布劳森在帮助地痞埃尔内斯托逃往圣玛利亚，因为后者杀害了盖卡。但是，从此埃尔内斯托就进入了虚构的圣玛利亚：一个只靠想象和话语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人类来说就是：当现实生活难以忍受时，人们可以逃避到幻想的天地中去。这样读者可以比较容易地理解小说荒唐的结尾了：主要人物在化装舞会上丢掉了原来的衣裳，只剩下了假面，迷失

在虚构的天地里。

从现实跳到虚构世界是由虚实参半的中介条件调节的。比如，在布劳森的真实生活中，当他感觉到真的处于绝境时——老婆走了，他被解雇了——他就开始过虚构的“生活”。他凭借老板给的一点失业赔偿金，就设想自己办起了广告公司，租了半间办公室，做了名片和公文信笺；甚至设想举办招待会与亲朋大吃大喝……那么，布劳森是不是脑子出毛病了呢？不是，这是人性使然，人类总是有点幻想的，而梦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正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缩短了、甚至消灭了两者的距离。如《堂吉珂德》的主人公，在他脑海里，梦想与现实是没有界限的。在《短暂的生命》里，布劳森最后的庇护所就是做梦和想象，直至最后的自杀。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又是憎恶道德败坏的，相信“为富不仁”，不相信物质发展之后，精神面貌一定会改善。

虚构的圣玛利亚从《短暂的生命》开始就经常出现在奥内蒂的作品中。但它的位置是模糊的，只说是在拉布拉他河岸某地，旁边是“瑞士农场”，对岸是拉万达市和造船厂港口。乘坐快艇半个小时可到达造船厂。在后来的长篇小说中，许多人物来往于上述几个地方。

到了创作《造船厂》的时候(1961)，奥内蒂把二十多年来的经验都运用到这部长篇小说中了。专门研究奥内蒂创作史的拉丁美洲文学史专家埃米尔·罗德里盖斯·莫内卡(Emir Rodríguez Monegal)认为，《造船厂》是奥内蒂的最佳作品，因为它文字明快，故事动人，有深层的意蕴。有些段落的描写堪称经典，例如拉尔森与佩特

鲁斯在圣玛利亚监狱里的谈话。

创作《造船厂》的灵感来自参观一家造船厂。奥内蒂在回忆此事时说：“那时我在写《收尸人》，一天，突然有人请我去参观一家造船厂，地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区。实际上，那里有两家造船厂：一家在南道克，另一家在罗萨里奥。我去过南道克的那一家，又认识罗萨里奥那一家的老总。南道克那一家已经宣布破产，正在打官司。那里有位老先生，名叫弗莱依达，衣冠楚楚，说话口气强硬，坚信打官司自己必定胜诉。他说，哪怕不能履行承诺，不得不清仓甩卖，也要坚持到底。我见到这位老先生时，他正在恭候债主登门和法院的查封，但是他并不气馁，神情令人敬佩。陪同我参观的是造船厂的一位部门经理。他就是那种生活在幻想中的人。奇怪和神秘的是，他们居然能维持造船厂的运转，仿佛一切都很正常。可实际上，到处贴着封条，任何东西都禁止挪移，可是经理弄到一把钥匙，打开他的办公室。里面的设备齐全，办公桌、椅等都是贵重木料做的。但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我记得船厂是个大铁棚，有个铁柱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禁止携带和使用武器！’显然是针对警察的啦！”

奥内蒂这番话说明了破败的造船厂给他的刺激很深，让他放弃了《收尸人》的创作，他立即动手写《造船厂》，因为倒闭的真情实景与经理极力伪装的“正常”表演，为奥内蒂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创作素材，一个他长期经营的虚实互换的题材，所以他当机立断马上动笔。另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乌拉圭社会变化给奥内蒂留下的印象是社会生活里的人们都在作秀，都在表演，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

角色。

因此,奥内蒂在《造船厂》里安排的人物也是如此:人人都活在虚构之中,虚构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空气”,所以作品极力营造这样的“空气”:一切都是假的,只有假的才是真的。造船厂的地理位置是假的:“在海岸线的任何地方。乘快艇半个小时可到圣玛利亚。”而后者也是虚构的城市。在这个虚构的舞台上,每个人都有一张假面孔:董事长贝特鲁斯徒有虚名,他已经破产,债台高筑。他下属的总经理拉尔森、技术部经理、行政经理都是光杆司令,是他们的想象和主观意愿在维持这种虚构的生活。实际上穷得吃不上饭;脑海里的财富却堆积如山。这四位先生的顽强意志让他们全然不理睬残酷的现实,终日沉湎在海市蜃楼之中。四个人做的事情,个个心知肚明,那就是装蒜,像演员在舞台上那样:煞有介事地天天上班,不迟到不早退,翻阅订单,查财会报表,修订合同,核对图纸……其实那都是过时作废的东西,他们只是兢兢业业地作勤奋状罢了。拉尔森也承认:“这一切是神魂颠倒的。”这自欺欺人的闹剧吓坏了拉尔森:闹剧出了格,做戏的人们无法驾驭了,游戏成了脱缰的野马。游戏人生的结果,就是人生被游戏了。作秀的同时,饥肠辘辘的肚子是不饶人的。于是,他们四人拆废船、卖废铁、卖生锈的机器以此维持生计。在上述四人对外欺骗的同时,这个集团内部还互相欺骗。董事长欺骗总经理;总经理欺骗部门经理。这些人对各自的家属、朋友、情人整日谎话连篇。因而他们是谎言团伙,是集体性质的尔虞我诈。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因为利欲熏心,让人丧尽天良,导致他们最终的疯狂和毁灭。所以他们人人有灾难降临的感觉,有末

日要遭审判的恐惧。靠自欺欺人苟且偷生如同饮鸩止渴，熬过一时算一时罢了。实际上，这是对生活或人生的绝望态度，也是奥内蒂的几部小说努力揭示的精神病态和危机。他分别在几部小说里让这种患有绝望症的人们或自杀，或疯狂，或杀人犯罪，或沉迷于妄想之中。否则就心甘情愿地做现实生活的奴隶：房奴、车奴、人奴……他们选择了为奴隶的生活当然迫于无奈，不得不屈从于社会环境、地位、权势以及自身的愚昧和盲目中。他们常常沉湎于幻想，可幻想又拯救不了灵魂，因为残酷的现实总要迫使他们从孤独、自闭的心境里回来，如同天总是要亮的、梦总是要醒来一样。要么站起来拼搏，要么逃跑，要么死掉，要么忍辱屈从，总之生活不给弱者出路，因为弱者的生存条件是由强者决定的，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越是专制的社会，弱者可选择的空间就越少。所以弱者经常遁入幻想之中。甚至极端专制的国家连“幻想”都要操控：要“狠斗私心一闪念”，要“交心”，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奥内蒂给《造船厂》的主要人物安排的最后归宿分别是：劳尔森死于肺炎，行政主管自杀，技术经理逃亡，董事长下狱，他的女儿彻底变疯……一句话，灾难降临到所有人的头上，无一例外，说明作者对这个欺诈社会的否定。

那么，《造船厂》是否寓意着乌拉圭社会的衰败呢？《造船厂》的英译本问世后，美国文学评论界就有这样的看法。对此，奥内蒂表示反对，他说：“我不喜欢寓意小说。这里没有什么衰败的寓意。这里只有真实、具体的衰败：造船厂实实在在的衰败，拉尔森的衰败。”他不赞成把文学作品当做社会、历史文献，这种倾向是有害的，不利

于文学创作。这一倾向的起因是文学评论界的短视和功利的表现，歪曲了文学的特性，企图把文学当成政治宣传和传播意识形态的工具。但是，奥内蒂并不否认，文学作品也是历史和社会的证据。文学作品为历史和社会作证的方式是微妙的，间接和充满矛盾的，更多的情况下，并非作者主观意愿。一个简单但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作家是生活在人间！生活在有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的人间烟火里。因此，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有意无意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具体社会生活的影响。这些烙印和影响使得有些作品落墨浓重；有些则间接和隐晦。《造船厂》中的悲观、绝望情绪就与作者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有密切关系：奥内蒂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正是乌拉圭经济发展的繁荣期，肉类、皮毛产品曾经名列世界前茅，人均收入第一，被誉为“美洲瑞士”，在社会秩序稳定、民主生活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都是美洲国家的楷模。但一九二九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也波及乌拉圭，它的出口额一落千丈，给农牧加工业以致命的打击。国人纷纷发出“灾难降临”的绝望悲叹。这种情绪自然影响到了奥内蒂。在深入研究《造船厂》之后，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怨天尤人，都有今不如昔的感觉，都拼命想重建往日的天堂，尽管是在闹剧中作秀，但态度是认真的。这是奥内蒂对国民悲观情绪的艺术性补充、是具象性的补充。而把情绪拟人化恰恰是文学的专长，是哲学和历史所不能代替的，更是社会学不可能做到的。尤其是作品营造的“灾难气氛”，用拉尔森的话就是“瘟疫”。它弥漫在处于沉沦的世界里，被荒谬、不公和暴力所腐蚀。这是作者对残酷现实的夸张、补充和升华，因而证明了文学的宝贵之处和重要作用：让人类忍受生存

的重压,用虚构战胜现实,用虚构世界的自由去代替被现实生活剥夺的自由。

“精神状态的不发达”是《造船厂》努力表现的方面。它表现在:受根深蒂固的偏见影响而坚持错误,受意识形态盲目性、或者意志薄弱和宿命论影响而坚持错误;做事不能持之以恒;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容易消沉、沮丧;对违法现象采取容忍的态度,助长腐败堕落的孳生;屈从于现行社会结构中的不合理因素,尽管这样的结构关闭了穷人发展的机会,或者吝啬地给穷人一些机会,而对权贵阶层却门户大开;甚至连灾难性的后果也不是“机会均等”的:董事长破产后仍然住着豪宅,进监狱后住“优待间”。而灾难给行政主管一家带来的是饥寒交迫、冻饿而死,更不要说乞丐和流浪汉了。“精神状态”的“不发达”还表现在有失败感、怨恨、无能为力、绝望的感觉;在社会上层则表现为自私、贪婪、不讲文明、反对现代自由民主、法治、社会公正和繁荣和谐,等等。西班牙—秘鲁著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指出,《造船厂》表现出来的“不发达的精神状态”在拉丁美洲“几乎多数人如此”,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许多人感觉奋斗无用,劳动无用,雄心壮志无用,因为一个强大、无形的机制打破、腐蚀、消解了一切努力,总是让奋斗的人们品尝失败的苦果。”因此,可以说《造船厂》揭示出来的“精神状态”已经超出了造船厂,超出了乌拉圭,甚至超出了拉丁美洲。

在《造船厂》问世之后,一九六四年奥内蒂又完成了长篇小说《收尸人》,作品讲述一家妓院的故事。作者把这家妓院当作“不发达”现象加以描写,因为妓院里集中了贫困、剥削、无知、偏见、反常

心理和绝望情绪等种种表现。一九六八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被偷走的新娘》，讲述了一个名叫蒙恰的姑娘，曾相信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而前往欧洲，回乌拉圭之后患上了幻想症，以为自己坠入情网，她穿上婚纱满大街乱跑，而圣玛利亚的人们则信以为真，为她喝彩。但结局是蒙恰服安眠药自尽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乌拉圭政局突变。军人掌握了政府，实行了军事独裁。奥内蒂对军政权不满，但并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他坚持过与世无争的生活。但军政权找了个借口，说是奥内蒂参加了一个评委会，该会评出了一部题名《保镖》的小说，其内容有“色情暴力章节”。军政府下令逮捕作者和评委会。奥内蒂也被牵连入狱。此事引起国内外一片抗议之声。奥内蒂被关押了三个月之后释放出狱，因为他在狱中无法忍受侮辱，企图自尽，未遂后被转移到精神病院治疗。等到奥内蒂出院后，他发觉许多进步人士被捕、被杀、被流放。全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文化界许多人士纷纷逃亡到国外。

乌拉圭军政府没有料到国际上要求释放奥内蒂的呼声是如此之高。负责奥内蒂一案的警察局长收到大量抗议电报、邮件，不由得惊呼：“这个他妈的奥内蒂怎么会这么有人缘啊！”西班牙驻乌拉圭大使特纳·伊巴拉曾经在一九七二年陪同奥内蒂去西班牙文化学院做报告，这时听闻奥内蒂被捕的消息，特地从西班牙赶来营救。此次，他以邀请奥内蒂夫妇参加巴洛克文学国际研讨会的名义正式致函乌拉圭军政府，要求释放奥内蒂。这样，奥内蒂才走出精神病院偕夫人前往西班牙，从此永远离开了祖国。独裁政权对奥内蒂的

迫害“帮助”这为作家的作品译成多国文字。许多国家的文化团体邀请他做报告。意大利—拉美学会授予《造船厂》为拉美年度最佳小说。古巴政府邀请他去主持美洲之家文学奖的评奖活动。乌拉圭军政权垮台之后，第一任民选总统何塞·马利亚·桑吉内迪把国家文学大奖的证书和奖金亲自送到西班牙，颁发给奥内蒂。一九八〇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把西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塞万提斯奖授予奥内蒂。西班牙、拉美各国许多著名学者、作家纷纷表示祝贺。在此之前，一九七九年第一届西语作家国际大会召开，代表们推举奥内蒂为主席。

奥内蒂流亡西班牙期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请听清风倾诉》。主人公名叫麦迪纳，原来是个警官，在圣玛利亚工作；后来当了画家。作品的第一部分情节发生在距圣玛利亚不远的拉万达。麦迪纳在圣玛利亚犯了事，逃到拉万达，与歌女弗莱达同居。麦迪纳整天不是绘画就是酗酒，要么与使女华尼娜鬼混，有时干脆三人同床。第二部分，故事发生在圣玛利亚，麦迪纳的官司了结了，又返回故里，再次当上了警察。麦迪纳无论当画家还是警察，都总是与走私、杀人、吸毒、酗酒、堕落的人渣为伍。作品以麦迪纳杀死歌女弗莱达结束，因为她与一个吸毒的小伙子塞奥阿内通奸。这个小伙子吸毒过量自杀，但动因是歌女被害和他对麦迪纳的仇恨。全书的气氛沉重、阴暗，令人感到绝望，尤其是主人公麦迪纳没完没了的逃跑成为作品的主题。此书问世于一九七九年，距离作者逃离乌拉圭有四年的时间。

一九八七年奥内蒂创作了长篇小说《那时候》。故事情节短小

紧凑；人物是记者、妓女、无赖、吃白食者，骗子、走私犯，总之，都是生活方式不正当、不正常的人；情节展开的舞台是：酒吧、餐馆、妓院。重大事情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部分故事是其中的一个人物——地方小报主编拉玛斯——从虚构的拉万达讲述出来的。全书由四个片段组成，由第一人称讲述。其中两个片段由拉玛斯叙述。第一个片段由拉玛斯手下的记者叙述；第二个由港口冷库的会计巴斯托尔叙述；第三、第四由拉玛斯完成。主要情节如下：一个化名马格达的小妓女（真名叫彼特罗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夜总会陪酒、陪舞、陪睡。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的武官爱上了这个小妓女，把她包出去同居达两年之久。对马格达来说，这是幸福的两年。突然，有一天巴西军方命令武官抛弃马格达，强迫他与妻子和好。马格达闻讯痛不欲生、终日酗酒，或是以泪洗面，不久便自杀而亡。马格达本来是个非常美丽的小姑娘，许多小伙子为之心碎。其中就有记者拉玛斯，他与马格达有过一夜情，因此小姑娘的死对他震动很大，悲伤之余，他要逃避现实，结果悄然出走，躲到虚构的拉万达去了。

比这个故事更重要的是作者描写的气氛：夜总会里放荡、腐化的氛围。它由两种环境组成：楼下的舞池、乐队、餐桌和二十几位陪酒、陪舞的姑娘。楼上是包厢，但只有桌椅，如果性交，就在地上或桌上。夜总会有个管家，名叫堂路易斯，是个流氓，所有的舞女被录用之前都必须和他上床。但是，真正霸道的人物是夜总会老板萨弗夫人。她在书中出现的时间很短，但作者把她描写得十分动人。这一段描写是拉玛斯叙述的，他记得萨弗夫人年轻时在罗萨里奥市的

一家妓院做“头牌姑娘”，曾经红极一时，如今徐娘半老，当上了夜总会老板，住在高楼里遥控着一切，举手投足都做“高雅”状，如果下人说粗话，她会发怒。她的短暂出现让读者明白了什么叫“当了婊子之后再立牌坊”以及“高贵人士”的“高雅”来自何方。

书中另外一处夜间活动的场所是个小酒吧，常客称它为“无名氏”，夜游神们常常在深夜里去那里再饮一杯。那里有位黑人调酒师西蒙，曾经在拉玛斯和小妓女马格达约会时，为二人调鸡尾酒，因此知道他俩的许多故事。

冷库会计巴斯托尔是在马格达自杀后出现的，他是事件的目击者，叙述的方式就是给警方讲述他看到的实情。三位叙述者的叙事是不连贯的，甚至令读者觉得不可思议，怀疑作者是否已经“江郎才尽”或者“丧失记忆”。

奥内蒂一生最后的几年对写作冷漠，处于懈怠状态，但身体还算健康。他一反年轻时的孤僻、冷漠，愿意接待来访者，常常与客人谈话；与儿童游戏，与小狗消磨时光，但更多的时间仍然是读书，尤其是侦探小说。

一九九三年，在奥内蒂去世前一年，他完成了长篇小说《当无关紧要之时》，其中有两个重要人物是在《造船厂》里出现过的。一个是医生迪亚斯·戈雷依，一个是造船厂董事长的疯子女儿伊内丝。这二人已结为夫妇。伊内丝婚前就与一些小流氓鬼混，直到怀了孕才去求助医生打胎。医生拒绝给她做手术，但愿意帮她掩盖丑闻，办法就是去教堂结婚。但这二人的故事是由一个名叫卡尔的人用记日记的方式叙述出来的，而且不是系统完整的日记，只

有片片断断的故事,没有日期,没有具体的地点,只有笼统的圣玛利亚,而且这时的圣玛利亚已经扩大为新圣玛利亚、老圣玛利亚和东圣玛利亚。但这三个地区的人口却急剧下降了,因为大量居民到国外去找工作了。反之,美国石油公司却来到这里寻找石油,他们雇佣印第安人修水坝、建营地,准备建设油田。原来的巴西边境距圣玛利亚遥远,如今已近在咫尺,这大大方便了走私活动。走私集团的头目名叫阿布·赫斯尼,原来是沙特阿拉伯人,是国际刑警通缉的要犯,此时却指挥着成队的卡车不受干扰地来往于边境地区。

时过境迁,老圣玛利亚人已经所剩无几,酒吧、餐馆、妓院也已改头换面,居民的成分也从土生白人为主转变为印第安人和黑人与混血人为主要成分了。

时间和空间转换的跨度很大,常常令读者费解。例如,疯女伊内丝生下的女孩名叫爱尔维拉,本来由女佣何塞菲娜养育。但是,卡尔的日记中不加任何铺垫和过渡,就说有个姑娘书包里装着安全套和匕首,是对付强奸犯团伙的,她天天准备割掉男人的“球球”,其实这个姑娘就是二十年后的爱尔维拉。

此外,奥内蒂这最后一部小说还常常流露思乡的情绪。至于人名地名的模糊可能与八十四岁老人的记忆衰退有关。尽管如此,《当无关紧要之时》还试图取消西班牙语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使用,力图句子简练,但总体效果欠佳。无论如何,奥内蒂努力革新叙事文学语言的精神是应该称道的。

奥内蒂用毕生的精力为后人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学艺术世界:

圣玛利亚。这个世界里充满了悲观、绝望、腐败、堕落的人物，这些反面人物是属于全世界的，是有长远警世意义的：人性恶除非人类灭亡，它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在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全球悲观、绝望情绪的增长，腐败、堕落现象的蔓延就是明证。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二日于青岛大学

圣玛利亚之一

五年前，省长决定把拉尔森（又称“收尸人”）^①逐出该省的时候，有人曾信口戏言，拉尔森将会重返故里，以延续那百日王朝，这王朝曾是我们城志上众说纷纭、激动人心的一页——虽则现在几乎已被人忘却了。听到这一戏言的为数不多，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因受挫而抱病、又被警察押解着的拉尔森本人，也立时就忘掉了这一戏言，他已放弃了回到本城来的任何希望。

但是不管怎么样，自那句戏言说过五年之后，拉尔森在一天上午从科隆城开来的公共汽车上走了下来。他把手提箱放在地上，拽拽绸衫的袖口，然后提起箱子，缓步而踌躇地向圣玛利亚城中走去。这时雨过初晴。他似乎更胖、更矮了，他的模样已难以辨认，好像已被驯服了。

他在伯尔纳饭店的柜台上一面喝开胃酒，一面平静地注视着饭店老板的眼睛，直到被后者不动声色地认出方才作罢。他就在那里

^① 拉尔森非法为孕妇堕胎，收取钱财，因而得名。

独自用过午餐，周围是些身穿方格印花衬衣的卡车司机。（眼下这些卡车司机在同铁路抢生意，他们往返于罗萨里奥城和北方沿河各口岸。这些人似乎生来如此：身强力壮、二十来岁、喜欢喊叫、无所顾忌。仿佛是跟数月前通车的石子公路一起出生的。）后来，拉尔森换到靠近门窗的桌子上，喝起咖啡加白兰地来。

许多人都口气肯定地说，他们在那深秋的中午看见过拉尔森。一些人特别强调拉尔森那卷土重来的神情，强调他那夸张到近乎漫画式的架势，说他企图以此重演五年前那副懒散、玩世不恭和傲慢的言谈举止；另一些人则提醒说拉尔森是在极力让人认出他来，因此他有两个手指总是蠢蠢欲动，随时准备有人打招呼时便举到帽檐，随时准备迎接因重逢而表示的惊异目光。但是，也有些人持相反意见，他们坚持认为拉尔森神情冷漠、不知羞愧，说他手肘撑在餐桌上，嘴上叼着香烟，面对阿尔蒂加斯大街的潮湿空气，注视着走进饭店的各种面孔，一心琢磨着人世的冷暖；一面嘴角上露出浅浅的假笑，一面暗中记下这样和那样的嘴脸。

付饭钱时，他像往常那样小费额外地比别人多，随后重新住进伯尔纳饭店楼上的房间。午睡之后，他开始在圣玛利亚城闲逛。由于放下了手提箱，因而不那么令人注意，更符合他的本来面目了。他步履缓慢、踏地无声，像个不修边幅的外乡人那样从过往行人身旁和店铺门前走过。他沿着中心广场的四边和两条对角线走过一遍，仿佛要解决如何通过各条路径从甲地走到乙地而不重复旧路的难题。他对着教堂那刚油漆过的黑色栅栏走去，随后又折返回来，走进了店主依然是巴尔特的药店。这时他的步伐更趋缓慢、更具特

色、也更加警惕了。他进药店是为了量体重,买肥皂和牙膏,同时还要看铺子里的告示牌,就像偶然看看某个朋友的照片一样,只见那上面写着:“十七点前,药剂师不在店内。”

随后,拉尔森在附近兜了一圈,便摇摇摆摆地朝着通向沿江公路的三四个街区走下去。这条路与去科洛尼亚镇的大道相接,路上冷冷清清,走到尽头处便是那座造有天蓝色阳台的小楼房,现在是牙医莫伦兹租用着。后来,有人在雷冬多磨坊附近看到了拉尔森,只见他双脚踏在湿漉漉的草地上,背靠大树在吸烟;接着他用双手叩打着曼特罗农场的大门,买了一杯牛奶和一块面包,并不直接回答那些企图询问他住址的人的问题。(“他愁眉苦脸,一副苍老的样子,似乎很想吵架。他还拿出钱来给大家看,好像是我们在担心他不付钱就会溜掉。”)后来,拉尔森可能跑到科洛尼亚镇去消磨了几个钟头。晚上七点半,他又在广场酒吧的柜台前出现了。过去他住在圣玛利亚市的时候,从未光顾这家酒吧。整个夜里,他都在酒吧重演中午在伯尔纳饭店那咄咄逼人和假装正经的故伎。

他手举酒杯,和气地同男招待争论鸡尾酒的配方,冰块的大小以及汤勺的长短——免得提起他被放逐五年一事。也许他是在等候马尔科斯和他的朋友们。他向迪亚斯·格雷依博士瞥了一眼,可是不想同他打招呼。拉尔森付过酒账,把小费往柜台里一推,然后从高脚凳上笨拙然而满有把握地跳下来,沿着亚麻色通道地毯向外走去。他摇摇摆摆,迈着事先想好的细碎步走着,心里确信他获释这一事实虽则已成旧闻,但随着他的脚步声一定会传播开来,一定会既咄咄逼人又简单明了地传播到每个人耳中。

拉尔森从酒吧出来以后,肯定是穿过广场回伯尔纳饭店的房间睡觉去了。但是,城中没有任何一个居民记得在他回城后的头十五天里再见过他。十五天后正是个礼拜天,在望过大弥撒之后,大家都看见了拉尔森,他站在教堂外的人行道上,神情诡秘,面貌苍老,浑身尘土,手持一小束紫罗兰,紧贴在胸口上。大家也都看见了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的女儿——那个未出嫁的白痴独女。只见她拉着那个脾气暴躁的驼背父亲从拉尔森面前走过,她甚至还对紫罗兰笑了一下,跨过一步后,她努努嘴巴,弯下身子,惊恐而茫然地眨动着两只对眼儿。

造船厂之一

是巧合，当然是巧合，因为拉尔森不可能知道造船厂的事。圣玛利亚市全体居民中，只有巴斯克斯——那个送报工人——才可能同意在拉尔森被流放的五年中给他写信；但是不知道巴斯克斯是否会写字；更何况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倒闭的造船厂、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的兴衰、有大理石雕像的大房子和呆傻姑娘等等，会是由弗罗依兰·巴斯克斯发出的任何信函中的话题：不，也许不是巧合而是命运的安排。为命运所驱使的嗅觉和知觉，把拉尔森带回圣玛利亚市，原来他纯粹为了满足报复心理，故意在他仇恨的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后来命运却把他带到了那座饰有大理石雕像和滴灌龙头的杂草丛生的大房子跟前，带到了造船厂乱如麻团的电缆堆跟前。

据传，在回来后的第三天，拉尔森一大早就离开了寄宿处，在空无一人的码头上慢悠悠地走着——认识他的人们觉得，他夸张地摇摆着，鞋跟使劲踏地，腆着肚子显胖，竭力装出一副温良恭俭让、施恩不图报的表情，一直走到渔船码头上。他把报纸一叠，垫在地上

坐了下去，瞧着雾气弥漫的河对岸，瞧着恩杜罗罐头厂的货场上来来往往的卡车，瞧着赛艇俱乐部的工作艇和那些长长的、轻巧的、不知为什么急急忙忙出航的小艇。他的屁股一直没有离开码头上潮乎乎的石头上，坐在那里吃了午饭，吃的是孩子们卖给他的炸鱼、面包和葡萄酒。孩子们赤着脚，还穿着夏天的破衣烂衫，跟他纠缠不休。拉尔森看见一只平底驳船靠了岸卸货，他漫不经心地注视着乘客的面孔，然后打了个哈欠，取下黑领带上镶着一颗珍珠的别针剔牙。他想起了几个人的死，这使他回忆起了一桩桩往事，回忆起了那些轻蔑的微笑，那些闲言碎语，那些总想改变他命运的企图。站起来的时候，时钟已快打下午两点了。他用两根指头蘸了唾沫，抹了抹裤线，拾起那张布宜诺斯艾利斯头天晚上出版的报纸，走进了下台阶去乘船的人群中。船已张开白色的风帆，准备溯河而上。

旅途中，他躺在床上继续看早上看过的报上的文章，身体依旧摇来晃去，跷着二郎腿，帽子压住了一道眉毛，傲慢的、若无其事的脸向上仰着，两只眼睛假装专心看报，以免引人注目和被人认出来。在那个名叫造船厂之港的码头，他跟在一个又胖又老的妇人后面下了船；老妇人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躺着一个睡着了的小女孩。——也许，这跟他在任何地方下船的情景一模一样。

他沿着潮湿的土路毫不犹豫地往上爬。路边是一块块郁郁葱葱的庄稼地，地块之间长满了杂草。他看了看那两台锈迹斑斑的吊车；看了看那座灰色的平顶楼房——一马平川之中，它们显得格外高大；又看了看那些硕大无朋的字母，字母已经残缺不全，几乎难以辨认。楼房仿佛成了个哑巴巨人，正在无声地呼叫着：“赫雷米亚

斯·佩特鲁斯公司。”尽管是白天，两扇窗子里仍然亮着灯光。他继续在破破烂烂的房舍中间，在蘸漆树木桩架起的铁丝网里，在小狗的叫声和女人们的喊声中走着。女人们有的放下了锄头，有的停止了浆洗，偷偷地瞧着他，似乎期待着什么。

土路或胶泥街道上尚未留下车辙印儿。阳光射在新近修建的路灯柱上投下的阴影，把路面分割得明一条暗一条。街道后面，就是那座捉摸不透的水泥楼房和没有船只、没有工人的空空如也的船台，以及那些用陈年旧铁制造的吊车——一旦有人试图启动，它们就会嘎嘎乱响，分崩离析。天空彤云密布，空气凝滞，山雨欲来。

“呸！地地道道的肮脏不堪的穷乡僻壤。”拉尔森啐了一口，随即又笑了一下。他站在沙滩嘴的夹角里，显得肥胖、矮小，不知何去何从。他诅咒他在圣玛利亚市度过的那些个年头，诅咒他的获释归来，诅咒那铅块似的低低的乌云，诅咒那倒霉的命运。

他往右一拐，又走了两个街口，然后走进了“贝尔格拉诺”。那里有酒吧间、饭馆，还有旅馆和杂货店。就是说，他走进了一个商场。商场的橱窗里摆着凉鞋、瓶子和铍片，门上有一个霓虹灯广告牌，地板一半是花砖，一半是胶泥。很快，他就自个儿给这个商场取了个名字——“贝尔格拉诺之家”。他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随便要了点东西：一杯茴香酒加苏打水，但是没有香烟。有了避雨的地方，其余要做的事情就是等雨下来，透过饰有用苍蝇药写的赞美一位癩病医生的环形字句的玻璃窗，听雨点打在房顶上翘首盼水的胶泥和锌皮上的声音，看从上面流过的雨水。然后就无事可干了，放弃心血来潮时产生的信心，最终接受不能取信于人和垂垂老矣的现实。

他又要了一杯苏打水茴香酒，小心翼翼地兑着饮料，回忆着逝去的年代和被判刑以前的生活。这时门开了，一个女人小跑着奔进来，一直冲到柜台跟前。他马上就把这个穿靴子的高个儿女人和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女人同刚听到的马蹄声联系起来了。高个儿女人站在老板对面，兴致勃勃地点着名字要东西。另一个女人长得圆滚滚的，像是印第安人，温顺老实，她关门的时候没有弄出一点儿声音，几乎没有用门去顶习习乍起的风，关好门后，她走到高个儿女人后面站住了，耐心，殷勤，规规矩矩。

拉尔森立即知道可以做点儿还说不准的事儿，知道他只能依靠那个穿靴子的傻女人；知道一切都必须通过那个女仆去做，利用那半推半就的女仆牵线搭桥。这时，女仆正站在主人后面一步远的地方，叉开两条又粗又短的大腿，双手合在一起按在肚子上，头上裹了一块深色头巾，脸上唯一的表情是故意装出来的无缘无故的笑容。她并不使拉尔森感到发怵，她属于一种他眼一闭就想得起来的女人。这种人可以分门别类，但是大同小异，仿佛是机器制造出来的；跟动物一样，虽有温驯和淘气、狗和猫之分，但一眼就看得出来。他又观察另一个。她仍然在笑，在用鞭子敲打柜台上那个罐头的边儿。她高高的个子，金发碧眼，竖看有三十岁，横看有四十岁。

她那两只半睁半闭的明亮的眼睛里，还残留着童稚的痕迹；目光是怒气冲冲的、挑衅性的，看一下又马上躲闪开。她扫了一眼自己扁平的胸部，又瞥一下身上那件男式衬衣和脖子上那纤巧的丝织花边。接着，她又用同样的目光望望两条长腿和消瘦的胯部——它们在马裤里稀哩晃荡，跟半大小伙的一样。她那金色的长发向后倒

梳,用一根丝绒带系在后颈上。她的门牙大而暴突,一旦开口笑起来,就浑身乱抖,随后戛然而止,立刻露出惊疑而专注的神情,似乎要收敛笑容,又似乎想知道笑容是如何离开自己那容光焕发、过分宽大的白面孔,又似乎想知道笑容是怎样瞬息即逝,化为乌有,消失在柜台上、老板的胸膛上和酒柜里的蜘蛛网上。

“应当开开玩笑。”拉尔森心里想,他一面盘算一面等待时机。他伸出一个指头,向侍者晃一晃,请再来一杯茴香酒。他笑眯眯地发现,细雨正轻轻地敲打着屋顶和街道,听起来犹如音乐伴奏,犹如明察秋毫、目光敏锐的交谈者的话语。

拉尔森发现,贴在那女人后背上的肮脏长发一定很久没洗了。那个好像百合花,又好像木梳似的金色发帘下面,是一张苍白的脸,脸上皱纹初起,粉黛掩不住憔悴,显然经历过忧患的日子。她的笑声尖厉刺耳,其实并不是因为什么而发笑,而是跟打嗝儿、咳嗽和打喷嚏一样,不可避免地要发出响声。

店里的桌子旁边再没有其他人了。拉尔森蛮有把握,那两个女人出去的时候准得从他身边走过,准会看见他。不过,在那个当口,最好是来点儿新鲜的。另外找一个引人注目的方式。他理了理领带,把口袋里的丝手绢拉出一截儿,然后慢吞吞地踱到柜台跟前。他用肩膀遮住那个女人,朝老板彬彬有礼地笑了笑。“我不是来挑剔茴香酒的,”他低沉而洪亮地说,“我明白在这年头……不过,您没有更好的牌子了吗?”老板先是说没有了,过了一会儿,又试着说了一个牌子的名字。拉尔森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谛听着身旁那个闷声不响的女人的动静。只听见女佣说:“我们走吧,天晚了,又下了

雨。”声音隔着一个人传来，像是从一个既遥远又近在咫尺的深渊里传出来的一样。老板接连又报了几个外国牌子的名字，干巴巴地念叨着，仿佛在讲课。结果一无所获，他自己本来不抱希望。

“那好吧！先生，没关系。请让我看看商标。”

他靠在柜台上，笑容可掬，宽宏大量，缓缓地念着橱柜里的瓶子上的字母。那个女人又笑开了。他没打算看她，心里暗暗在想：“有门儿。”沙沙沙的雨声正在谈论着报仇雪耻和他那使别人甘拜下风的本事，宣告必须让最后的业绩使那些逝去的年头不算白过。

“不过，我相信，小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早点儿迟点儿就是了。”老板说。

她又笑了起来，挺直了身子。笑声戛然而止，被懒洋洋的、一本正经的、坚韧不拔的雨声弄走了，吞没了。

“等一会儿。你要被淋湿的。”她对女佣说道，并没有转过身来，不知道她到底在看谁。她的两只眼睛东张张西望望，最后一动不动地瞧着离老板头顶两公分的地方。“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付出了资财和劳动，提出了设想和计划。政府这个走了那个来，都说是的，他是对的。但一个个政府都走了，都没有使事情好起来。”她再次笑了起来，任凭笑声从那大而暴突的牙齿间迸发出来，两个眼珠抱歉地求助地转来转去。“打我小时候起就是这样，现在看来是真的了，几周内的事情。我不是为了自个儿，不过我每天上午都到教堂去，就跟这个姑娘一起，去祈求让事情好起来，早点或晚点，在他不中用以前好起来。要不，太伤心了！”

“不，不会的。”老板说，“应当好起来，而且很快就会好起来。”

拉尔森把两个胳膊肘同时撑在柜台上，又是吃惊又是同情地看着女佣的脸笑了，一丝浅浅的笑纹挂在脸上。摇摇晃晃的女佣眨着眼睛，嘴也张开了。她朝前跨了一步，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拉尔森，碰了碰女主人的衬衣。

“我们走吧，下雨了，天也晚了。”她说。

这时，拉尔森拿起放在柜台上的马鞭，敏捷而又礼貌地递给那个披着长发的、嘎嘎笑着的穿靴子的女人；没有说话，也没有瞧她。他看着她们出去，透过灰黄的、凄惨的橱窗看她们上了马，又同老板开始了关于茴香酒的枯燥无味的闲聊。他邀请老板一块儿喝酒，不提什么问题，对旁人的问话则用谎言搪塞过去。

他动身去乘到圣玛利亚市的末班船时，已经夜幕四合，牛毛细雨也差不多停了。他慢条斯理地走着，任随树上掉下来的水点儿打湿衣裳，就这样一直走到若明若暗的孤零零的码头上。他既不愿设想，也不愿应承，一路上只是出神地想着那个穿骑马服的女人，想象她的暴戾，想象她的苦闷。

凉亭之一

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两周之后的一天，弥撒结束时，他在教堂的栅栏里，装出羞羞答答的样子，奉献那束他贴在胸口的头荏紫罗兰。那是礼拜日的中午，他在那里，魂不守舍，洋相百出，表情却肃穆而安宁，逐渐发胖的身子裹在剪裁合体的深色大衣里，旁若无人，茕茕孑立，毫不理睬各种各样的眼色、寒冷的天气、喳喳叫的小鸟和揶揄的话语。一切都没在他脸上引起丝毫反应，宛若一尊雕像。那是在六月，正是圣胡安节。当时，佩特鲁斯的女儿安赫莉卡·伊内丝正在圣玛利亚市小住，住在她的亲戚家里，离科洛尼亚镇不远。

后来，拉尔森回到造船厂之港。在“贝尔格拉诺之家”尽头的一个肮脏的房间里安顿下来之后，他到了一道铁门跟前。铁门上堂而皇之地挂着一个赫字和一个佩字。他踏进那座房子的杂草丛生的院子，房子是佩特鲁斯在十四根水泥柱上修起来的，濒临河边，紧挨着造船厂。此后，在好几个昏暗的、令人回味的、习以为常的夜晚里，他同女佣窃窃私语。女佣三十岁，是佩特鲁斯的亡妻养大的。

她在一场敬慕、友爱、奴役和报复的游戏中消磨时光。“小姑娘”极其愚笨，既是这场游戏的目标，又是这场游戏的纽带和游戏伙伴。拉尔森搞了一连串约会，这些约会几乎如出一辙，极为相似，犹如重复一场令人厌恶的砸了锅的演出。其中的妙趣均等地分散在游戏双方，分散在变得干燥了的冬天的夜光里，分散在安赫莉卡·伊内丝那略嫌不合身的长长的白色连衣裙里，分散在拉尔森从头上摘下黑帽子、把它举在离他那妩媚、纯洁、造作的笑容上面几公分高的地方，停留在几秒钟的戏剧性的缓慢的动作里。

接着，第一次真正的约会到了。会见是在花园里进行的。在那里，拉尔森不知不觉地、无缘无故地受到了羞辱，还出现了未来的羞辱和请他却步的征候。但他没弄清楚，他不承认眼下的问题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他用咬手指甲来掩饰笑容，饱经世故和过分自信使他觉得经验广泛和丰富定会万无一失。

当时，佩特鲁斯老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同他的律师一起炮制上诉材料，或者为他的开拓者的观点和关于国家兴旺发达的信念寻找依据，或者点头哈腰地、诚惶诚恐而又愤愤不平地奔走在政府各部的办公室和银行的经理室之间。女佣何塞菲娜终于点头了。这是在被纠缠了两个晚上之后，在肩膀上出人意外地被搭上一块丝手绢之后，在拉尔森苦苦央求加上爱情和爱情的风暴激荡起来之后的事。这种风暴并不单单在安赫莉卡·伊内丝·佩特鲁斯身上产生，而是广泛地、模模糊糊地在一切凡是在尘世上叹过气的女人，尤其是她，女佣何塞菲娜的身上产生。

于是，这天下午五点钟时分，拉尔森缓缓而行，到那边栽有马尾

松的街上去了。他全身黑衣服，熨得平平整整，洗得干干净净，颇为得体，一根手指头上挂着个点心盒子，擦得油光锃亮的皮鞋踩着最后一场雨积下的水坑，四平八稳地迈着方步，满怀贪婪，一肚子使不完的智谋。

“跟钟表一样准确！”何塞菲娜在大门口对他说，语气有点儿讥诮，又有点儿苦涩。她系着新围裙，上面描满了花，沾满了粉渍。

拉尔森碰了碰帽檐儿，把点心盒子递给她。

“我带了一点儿东西来。”他带着歉意谦逊地说。

她没像“收尸人”期望的那样伸出一根手指来接盒子，而是伸出一只手竖着把盒子抓了过去，又把它像本书似的贴在滚圆的大腿上，同时从头到脚地把拉尔森看了一遍，从那动人的笑靥一直看到完好无损的鞋尖。“我真希望不要那么干。”她说，“不过，现在她在等着您，别忘了我给您说过的话，喝完茶就走，对她放尊重点。”

“那当然，亲爱的宝贝！”拉尔森表示同意。他看了看她的眼睛，脸色阴沉下来：“听您吩咐。如果您希望，我可以不进门就是。听您的，亲爱的宝贝。”

她又看了看他，这次看的是他那两只细小的、心满意足的眼睛，它们毫不费力地流露出讨好和顺从的神气。她耸了耸肩膀，往院里走去。拉尔森手里拿着帽子，看着她的屁股和她那坚定的步子，疑疑惑惑地跟在她后头，拿不准她是否邀请过他进去。

杂草随心所欲地滋长了至少一年之久，树皮上有些潮湿的、没有光泽的青白色斑痕。现在，拉尔森只需用耳朵听着那个女人的连续不断的脚步声和大腿划过草丛的嚓嚓声就行了。花园中央有个

水池、圆形的水池四周围了一道一米高的墙，墙上长满了苔藓，裂缝处塞满了枯树枝。水池后面，跟水池挨在一起的是个凉亭，凉亭也是圆形的，用木条修建而成，漆成了海军蓝颜色，油漆剥脱了，凉亭呈圆锥形，尖顶朝天。凉亭再过去，就是那座方块形水泥房子，它呆呆板板地顶在水泥柱子上，过分高出洪水可能涨到的地方，半灰不白的肮脏的墙壁上有无数个窗户。花园里到处都是通体污痕的、被树枝掩映着的白色大理石裸体女人雕像。“他们在让它变成废墟，”拉尔森不快地想道，“我看能值二十万比索，还不止，谁知道后面，从房子到河边还有多少地皮呢！”何塞菲娜围着水池兜了一圈，拉尔森顺从地看了看池里的脏水，看了看水面上横七竖八的水草和那个在水池中央曲着身子的小天使雕像。

何塞菲娜在凉亭门口停住了脚步，懒洋洋地抬起了一只胳膊。“上当了！”但是拉尔森还是挤出一丝微笑，点了点头，然后摘下帽子，朝凉亭里的水泥桌子走去。桌子周围放着铁椅子，桌子上面铺着一块绣花台布，上面放着杯子、一瓶紫罗兰和几个装着薄饼、点心的碟子。

“请随意，她马上就来，今天下午不冷。”何塞菲娜说道，没有看他，手里晃悠着那个点心盒子。

“谢谢，一切都太好了！”他又一次把头朝那个女人弯了过去，朝那个矮墩墩的、急急忙忙擦着凉亭的裂缝木头躲开的身子弯了过去。

拉尔森把帽子挂在一颗钉子上，摸了摸铁椅子，坐下去之前垫上了一块手绢，想咂摸咂摸受骗的滋味。

这是下午五点。冬天的黄昏孤独而寂寞，拉尔森透过刨得粗糙、漆得马虎的蓝色木板的缝隙，瞧着呈半圆形的、越来越昏暗的天空和外边的景色，黑影像在被追赶着似的向前推进，蒿草无风而折腰。一股潮湿的、冷冰冰的醇厚味儿，一股夜晚才有或闭眼时才闻到的味儿，从水池里飘了过来。另一端，房子矗立在纤细的水泥柱子上，矗立在高高的紫黑色的穹隆里。房子底下堆码着夏天用的床垫和坐垫，支棱着一条灌溉用的水管，放着一辆自行车。拉尔森眯缝起一只眼睛，以便瞧得更清楚。眼里的那座房子似乎就是那个他梦寐以求的，许诺给他的天国的空虚形象，就是他希望一劳永逸地登堂入室、去利用有生余年变本加厉地报复、萎靡不振地发泄淫欲和自命风流、随心所欲地当家做主的那座城市的大门。

他嘴里咕哝了一句脏话，笑了笑，起身迎接走过来的两个女人。他相信装出微感惊讶的神情是合乎时宜的，并且知道在开始交谈时如何利用这种惊讶。“我等着您，想着您，几乎忘记了我身在何处，忘记了您会来。当您出现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盼望成了现实。”说完以后，他差点儿要去倒茶，屁股离开椅子后他明白了，在凉亭这个小天地里，礼貌可以通过稳重来表示。伊内丝的两只眼睛像一头被关在圈里、怀着永久敌意和总是处于戒备状态但并不害怕的牲口那样来回转动，然后开口说了一句话。似乎相信笑两声就能使句子完整、可以理解 and 经久不忘，于是她的身子抖动了两下，随即两只眼睛和一张嘴巴都张开了一会儿，茫无知觉，仿佛是用眼睛和嘴巴来聆听，直到那两声大笑彻底溶化在空气里。她板起面孔，在拉尔森脸上寻找笑的痕迹，然后移开了视线。

乱草丛中显得既遥远又邻近的凉亭外边，何塞菲娜边同狗谈话，边固定着玫瑰花的支架。凉亭里边，问题尚未摊开。藏在安赫莉卡宽阔发型中的白皙的脸庞，此时显得毕恭毕敬，两只粗壮白净的胳膊，不时挥动着打断她的谈话，打断手中那没完没了的针线活儿。她身穿一件紫红色连衣裙，腰带以下其阔无比，长长的一直拖到扣得紧紧的鞋子上，衣服的前胸和双肩全是图案。冬天里黄昏的凉意和一阵紧似一阵的萧瑟的风，从外到里，从头顶上灌下来，吹在拉尔森那发胖了的、挺得笔直的身子上。

“大水淹了旧房子的时候，”她说，“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那是一天夜里，我们把东西搬到卧室那层楼去，每个人都拖着自己最心爱的东西。简直是一场历险。马比我们还害怕，母鸡都淹死了，小伙子们住到了小艇上。爸爸暴跳如雷，但从来没有害怕过。小伙子们划着小艇在树梢丛中钻来钻去，想给我们送点吃的来，邀请我们去散心。吃的我们倒有。现在，新房子不怕涨水了。小伙子们划着船来来往往，涨水对他们来说已算不了什么，他们划着小艇从四面八方赶来，挥着衬衣打招呼。”

“请您猜猜，”拉尔森在凉亭里说，“一千年都猜不着，因为您没有注意。我住在贝尔格拉诺，是偶然到这个离造船厂一个街口的商场的。我不知道如何安排我的生活，相信我吧！我上了一条船，在我愿意下船的地方下去了。下起雨来了，于是我就钻进了那个商场。您出现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渴望见到您，同您说话。不知为什么，而且我也不是本地人，可我在没见到您和没有同您谈话之前不想离开。现在如愿以偿了，喘过气来了，我

正看着您,随便同您谈话。我不知道生活还给我安排了什么,但这次约会已经给我报偿了,我看见了您,而且还在看着您。”

何塞菲娜打了狗一下,使它叫了起来。她和狗一起进了凉亭,看见安赫莉卡·伊内丝脸上露出微笑,气喘吁吁;拉尔森则一脸苦相,水泥桌上的碟子无人过问,一动没动。

“我不要求什么。”拉尔森大声说,“不过,我希望能再见到您,向您表示感谢,万分的感谢,感谢您的多方关照!”

他把鞋跟一碰,弓下了腰,然后去摘帽子。这时,佩特鲁斯的女儿起身离座并笑了起来。拉尔森再次弓了弓腰,顺便拿起了椅子上的手绢。

“天已经黑了,”何塞菲娜低声说道,她把半边屁股靠在凉亭的门柱上,看着自己那只给狗喂食的手,“请吧!我送您。”

在女佣的身体指引下,耳不闻声、目不见物的拉尔森融进了多次预报过的寒潮中,融进了刀剑似的杂草发出的嚓嚓声中,融进了凄惨的灯光中,融进了远远的狗叫声中。

在栅栏门口的赫字和佩字下面,返老还童的拉尔森鲁莽地按住何塞菲娜的脸颊,弯下腰去吻她。

“谢谢,亲爱的,”他说,“我会感谢你的。”

但她用一只手撑住了他的嘴巴。

“别动!”她心不在焉地说,仿佛在同一匹驯服的马谈话。

造船厂之二

弄不清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和拉尔森是如何碰头的。毫无疑问，会见是拉尔森策划的。也许得到了贝尔格拉诺之家老板波埃特斯帮助，因为很难想象，拉尔森会请圣玛利亚市任何别的居民帮这个忙。再说还应当想到早在半年前造船厂就缺总经理来监督和管理了。

不管是怎么回事吧！反正一天中午，会晤在造船厂举行了。这一次拉尔森仍未能走进建在柱子上的那幢房子。

“这是加尔维斯和孔茨，”佩特鲁斯指着两个男人说，“他们分别负责公司的行政管理和技术工作，是不错的同事。”

秃头的年轻人和黑头发的老头冷淡地把手伸给拉尔森，两人都露出讥诮和敌视的神情，仿佛串通好了要胡诌一番，随即看着佩特鲁斯，说了几句。

“明天我们结束盘点清查，佩特鲁斯先生。”孔茨——那个年纪最大的——说道。

“是核查。”加尔维斯纠正说，带着一副过分甜蜜的笑容，十个手

指头互相摩挲着，“到目前为止，一个螺丝钉都不少。”

“一根铁丝都不缺。”孔茨证实道。

佩特鲁斯靠在写字台上，黑礼帽始终戴着，用手抻着一个耳朵在听，眯缝着眼睛瞧那没有玻璃的窗户，瞧下午的阳光和寒风。他嘴唇紧闭，脑袋神经质地、庄严地点着，暗暗欣赏自己想起的每个主意。

拉尔森又看了看等着佩特鲁斯发话的两个汉子那一动不动、满含敌意和讥诮的脸，心想：抵抗和回击仇恨，可以是人生的一种意义，一种习惯，一种享受。几乎无论什么东西都比这大窟窿连小窟窿的铁皮屋顶更可取，比这缠绕在拆毁的大铁窗架上的扎人的蒿草更可取，比这靠在墙上堆积如山的卷宗和书籍以及这满是尘埃的瘸腿写字台更可取，比这令人难以忍耐的工作、企业和因使用、虫蛀而毁坏了的、急急忙忙地露出木材本来面目的家具所表现的虚假繁荣以及歇斯底里的喜剧更可取，比这被雨水、阳光和脚印弄脏了的乱七八糟地堆在水泥地板上的文件以及堆成金字塔的蓝白相间的图纸卷和钉在墙上的支离破碎的图纸更可取。

“对！”佩特鲁斯终于用他的气喘病嗓音说，“可以经常向股东委员会报告，不必等他们要求。股东们的利益都保护得好好的。我们必须坚持到履行法律手续那一天。要工作——我一直是这么干的，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船厂跟它的船一起沉没，但我们，先生们，我们不会沉没。我们的船倾斜了，随波漂移，但还不是遇难。”说到后面一句话时，他的胸腔里响了一下，两道眉毛期望而骄傲地往上一挑，满口的黄牙一闪，然后用手刮了一下帽檐儿，“让我们明

天一准结束盘点核查,先生们。帮帮忙!拉尔森先生……”

拉尔森缓慢而挑衅性地看了看那两副如出一辙表示告别的笑脸。那两张脸上不知从何而来的讥诮神情更加明显了,而且还不知不觉地显露出一种一丘之貉的强迫人同流合污的表情来,然后跟着佩特鲁斯那竭力挺直的、匆匆晃动的身子走了。他有意地、毫无怨恨而略感忧郁地吸了一口散发着潮湿、臭气、烂纸、废墟、寒冷、迷茫和欺骗味道的空气。不用回头,就听见不知是加尔维斯或是孔茨大声说:

“造船厂的伟大的老头子。他是白手起家混成人样儿的。”

孔茨或加尔维斯学着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的声音回答道:

“我是开拓者!股东先生们。”

他们穿过两间没有门扇的办公室。这里尘埃厚积,杂乱不堪,孤独凄凉,一台电话总机的电线绞成了乱团,有用氰亚铁酸块那见所未见的不可思议的蓝颜色描绘的图纸,还有一些腿上开裂的一模一样的桌椅。进入后面的房间,佩特鲁斯绕着一张巨大的椭圆形桌子走了一圈。桌上全是灰尘,放着两部电话机,一些吸墨纸有的用过了,有的还没用过。

佩特鲁斯挂上帽子,请拉尔森坐下。他思索了一会儿,两道浓眉挤到了一起,双手摊开放在桌子上,然后突然咧开嘴巴笑了一下。他望着拉尔森并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只把那长长的黄牙显露了出来,可能还包括因长有黄牙而感到的骄傲。拉尔森觉得冷飕飕的,既不能想到愤慨,又不能真正感到惊奇,一个劲儿地在佩特鲁斯的讲话停顿的时候点头赞许。这个不朽的讲话,几个月或几年以前,

加尔维斯、孔茨和数十个穷汉——此时他们早已风流云散，有的不见了，有的死了，都成了幽灵——满怀希望和感激之情聆听过，那变化多端的迷人的许诺，证明了上帝、好运气和姗姗来迟但毫发不爽的公道确实存在。

“三千多万，先生。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近几年对某些物资的巨额估价，也不包括还可以抢救出来的许多其他物资，比如可以部分变成土地的数以公里计的马路和出厂的那段铁路等等。我说的是实实在在的财产，是随时都可以卖到这个数的财产。还有楼房，船只上的废铁，您在库房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的机器和零件。孔茨先生将得到有关的指示。一切表明，法官很快就得撤销破产的判决。那时，摆脱了股东委员会那实在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的监督，我们就能使企业复活，获得新的发展。现在我已经具备必需的资金了。现在的工作就是选人。因此，您的服务对我是举足轻重的，先生。我是个优秀的人才鉴赏家，我相信我不会后悔。不过，您需要不失时机地同企业取得联系。我给您委派的职务是：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股份公司总经理。责任非常重大，等待您的任务是繁重的。至于您的薪金，我等着您的建议，一旦您可以估计出企业对您的献身、对您的智慧和忠诚有何期待的时候就请告诉我。”

说话的时候，佩特鲁斯的两只手举在脸前面，指尖勾在一起，说完话他重新把手放到桌子上，又一次露出了牙齿。

“先生，如您所说，我将答复您。”拉尔森平静地回答，“那要等我研究了全部情况以后，这不是随随便便决定的事。”他没有说出那个几天前就已经计算好了的数字，那是在安赫莉卡·伊内丝似信非

信、满脸怪相地看着他，不仅初步确认了爱情，而且也初步确认了老头子佩特鲁斯考虑给他在造船厂里安排个职务、一个基本上足以吸引得住他拉尔森先生的令人垂涎的牢靠地位之后，这个职位和前途都超过他拉尔森先生正在研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人提出的另一个建议。

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站起来，拿起了帽子。拉尔森陪着老头子穿过亮晃晃的冷如冰窖的大厅的两个空房间。他疑虑重重，不大痛快地承认信心得到了恢复，模模糊糊地抑制着那种从老头子的驼背上看到的庇护的感觉。

“小伙子们吃饭去了。”佩特鲁斯宽容地说，脸上露出三分之一的笑容。“不过，我们别耽误时间了。下午来吧，作个自我介绍，您就是总经理。中午我得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细节问题咱们以后再谈。”

现在，剩下拉尔森自个儿了。他倒背着手，小心地踩着图纸和文件，踩着满是灰尘的地板和呻吟着的木板，在巨大的空空如也的办公室里转悠起来。原先，窗户是有玻璃的，每对破烂了的电话线都连着一部电话机，二三十个人伏案工作，一个姑娘准确无误地插进和拔出总机上的插头（“您好！我是佩特鲁斯股份公司。”），其他的姑娘们一摇一晃地来往于金属卡片箱之间。老头子强迫女人们穿灰色罩衣，也许，她们认为是老头子强迫她们保守贞操，不出丑事。收发室的小伙子们每天至少要发出三百封信。在尽里头，看不见的地方，呆着半信半疑的老头子，他和现在一样老，短小精悍，信心十足，三千万哪！

小伙子们——孔茨和加尔维斯，正在贝尔格拉诺之家吃饭。如果这天中午拉尔森自己去吃点儿东西充饥，而不是在强烈的爱情、重归故里并恢复疲劳之后呼吸故乡的空气等等那种他不知不觉地巩固和热爱着的尾声气氛中种种迹象纷呈的时候决定禁食，也许就保全了自己，或者至少是继续在用不着认可的情况下沉沦；即使沉沦也不致弄得瞒不胜瞒，人人皆知，让他人幸灾乐祸。

自从那天他未经考虑地跟在一个用篮子提着一个睡着了的小女孩的胖女人后面在造船厂之港下船以来，他有好几次预感到有一个说不准的陷阱，正张着贪婪的大嘴。现在，他已经到了陷阱上面，却不能给陷阱取个名字，不知道他奔走、谋划、微笑、狡猾而耐心地演戏的结果只是自己钻进这个陷阱，安置在这个绝望而荒唐的最后的收容所里。

如果他穿过了这座空楼去寻找出口处的台阶，那么，他准会进贝尔格拉诺之家去吃午饭。出口处下方，像奇迹似的，一个金属女人铸像在他的脚边飞翔，笑咪咪的，衣服和头发被海风吹得飞快地向后飘，她轻松地举着一个不成比例的火焰熊熊的螺纹水晶火炬。当然，随后就会发生——在他同意步入歧途之前——事实上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后，翌日中午，他已经蒙在鼓里做了不可反悔的选择之后发生的事情。

次日中午，他进了贝尔格拉诺之家，看见加尔维斯和孔茨在他们吃饭的桌子上回过头来瞧他，他们既没有邀请他，也没有招呼他。他们脸上、眼睛里都向他露出诡诡诈诈和耍小聪明的表情，似乎又万事无求，连想都不想，仿佛正在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冷漠地等着

下雨。见到这种情景，拉尔森走到他们的桌子跟前，边脱大衣边粗声粗气地说：

“借光，如果不妨碍你们的话。”

他谢绝了冷盘，好赶上同他们吃同一道菜。他们一同喝了汤，吃了烤牛肉和蛋奶冻，边滔滔不绝、虚情假意地大谈天气、收成、政治和各个省会的夜生活，一个人说的时候，另一个人并不插话。他们对着咖啡杯子吸烟的时候，孔茨——最老的那个，他的头发和眉毛都染过似的——看了加尔维斯一眼，用一根指头指了指拉尔森：

“这么说您就是新任总经理了？挣多少？三千？对不起，不过因为加尔维斯负责行政管理，这你很快就会知道的。他得把这个记在账簿上，记在拉尔森先生名下。拉尔森，对吗？两千，三千或五千比索，您六月份的薪金。”

拉尔森看了看他们，先盯着一个看，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再看另一个，以便拖延时间。他想好了一句侮辱人的话，里面有好些浊音字，对他的男低音和慢音节都很理想。然而，他拿不准他们是否在嘲弄他。最老的那个，毛发浓密，长得滚圆、魁梧，哈着腰，跟个大蜘蛛似的，脸上有疏疏几道很深的皱纹；孔茨只是带着好奇心看着他，两只黑眼睛里闪着儿童般兴奋的光芒。另一个，加尔维斯，坦率地露出孩子般的牙齿，缓缓地搔着光秃秃的脑袋。

“他们只不过是开开心，看样子是在找个噱头，今天晚上好对他们那子虚乌有的老婆咋呼。说不定他们已经有老婆了，可怜而不幸的两对夫妻。没有必要吵架。”

“就算是那么回事儿吧！您说的不差。”拉尔森说，“我就是总经

理,或者这么说吧,假如佩特鲁斯先生接受我的条件的话,我就得成为总经理。另外,不用说,我必须研究企业的真实情况。”

“真实情况吗?”加尔维斯问道,“不赖。”

“我们是初次认识先生,”孔茨的脸上闪过一丝恭敬的笑容,“但要讲真话才够意思。”

“慢着,”加尔维斯打断他的话,“您是高深技术方面的专家,可以断定那些东西是因河里的潮气还是因被氧化而腐烂的。反正,全都在烂,全都长了一层皮,应当扔掉或者卖掉。您是干这个的。而拉买卖,技术经理,那是挣两千比索的人的。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没有一个月忘记过把这两千比索记入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股份公司的账上。不过这是另一码事了,这是我的事。拉尔森先生,假设您接受总经理这个职务,我可以问一声您考虑要多少工资吗?这只不过是好奇而已,请多包涵。我恭恭敬敬地把您说的数儿记下来,一百比索还是两百万比索都一样。”

“不过,您不妨给这位新朋友提个醒儿,”孔茨笑嘻嘻地说,一边给自己斟葡萄酒。“您不妨泄露点儿秘密,用以前的先例帮帮他。”

“那自然,我已经决定这么做了。”加尔维斯点头同意,“因此我才问他。我只想知道,在拉尔森先生看来,造船厂总经理的工资该是多少。”

“您应当告诉他那些前任总经理领了多少。”

“这跟我不相干,谢谢。”拉尔森说,“我想过了,少了五千我不干。每月五千,还有以后应得的佣金。”他端起咖啡杯子吮里面的糖的时候,觉得手脚无措,陷进了可笑的境地。但他无法控制自己,没

能后退一步走出陷阱。“我老了，做不了大事情了。这么些钱就差不离了，我可以在其他地方挣这么多。我感兴趣的是让公司朝前走。我知道公司有亿万比索。”

“如何？”孔茨低头把脸贴在台布上，向加尔维斯问道。

“嗯，那好吧！”加尔维斯说，“等一等，”他搔了搔头皮，笑着向拉尔森凑了过去。“五千。我祝贺您，这是最高的了。我有过挣两千、三千、四千和五千的总经理。对，这份工资对得起这个职务。不过，请让我说完。最后一位挣五千的总经理，也是位德国人，叫舒瓦尔茨。他借了一支猎枪，要杀我还是要杀佩特鲁斯先生——那位创始人，弄不大清楚。他在后门，就是我家和船厂大楼之间那道门，等了一个星期，最后，据说是对着自个儿开了枪。他为挣五千比索干了一年。我说这个是为了帮助您，我知道从那以后钱跌了不少价，您满可以要六千。”他转过头来，“您觉得不对吗？孔茨。”

“我觉得对极了！”孔茨用双手理着乱蓬蓬的头发说，突然变得严肃和悲伤起来，“六千比索，这不太多，也不少。这个数目和那个职务是相对的。”

这时，拉尔森点燃了一支香烟，向后一靠，笑吟吟的，注定要捍卫某种他不知道的东西，虽然这是荒唐而谬误的。

“再次谢谢，”他说，“五千就行了。我们明天开始工作，我提醒二位，我希望都好好干活。”

两人点头表示赞同。然后又要了咖啡，默默地相互递了一阵香烟和火柴。他们从窗户里朝灰暗、泥泞的街道上看了看。加尔维斯哆嗦着抬起头，要打喷嚏，但没有打出来，然后要过账单，签了字。

空旷的街道上剩下的最后一个水洼里映出了一块天空，灰暗而肮脏。拉尔森想起了安赫莉卡·伊内丝，想起了何塞菲娜，想起了那些使他感到宽慰的往事。

“好吧！如果您坚持，就五千吧！”加尔维斯看了看孔茨后说道，“对我来说都是一回事儿，写五千六千都费同样的手续。不过，据说，这里什么都包不住，您差不多是姑爷了。如果是真的，我祝贺你。一个蛮不错的姑娘和三千万，不是现钱，当然啦，也不都是他的。但谁也不敢同我争辩说总资产不是这个数儿。”拉尔森一下子堕入五里雾中，随后才慢慢回过味来了。他挑衅而阴郁地动了动嘴唇和舌头，把香烟在嘴里换了个地方。

“关于这件事，还什么也没定，再说又是私人的事儿。”他慢条斯理地说道，“对您二位来说，请别见怪，只应当知道我是总经理，从明天开始我将认认真真工作就行了。今天下午我用来发电报和向布宜诺斯艾利斯通电话。今天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明天上午八点钟，我就在办公室恭候，我们把事情重新安排安排。”

他站了起来，毫无信心地穿上那件合体的大衣，郁郁寡欢，犹豫犹豫，像是徒劳地寻找着一种可以给自己提劲儿的告别方式，如同喝醉了酒之后被一种难以置信的心血来潮左右着行动，除了仇恨之外别无所持。

“九点吧！”加尔维斯越发漾起笑容说，“我们从来没在九点前到过。不过要是需要我的话，请到那个厂棚，就是那个库房旁边的窝棚里去叫我，什么时候都行，不碍事儿。”

“拉尔森先生，”孔茨带着一副无辜的表情站起来说，脸上的皱

纹跟伤疤似的，“跟您一起吃饭很高兴。那么就是五千，如您吩咐。不过，请允许我对您说，您要得太少了，实际上少得可怜。”

“再见吧！”拉尔森回答。

然而，这一切发生得太晚了，晚了二十四小时。同佩特鲁斯会晤那天中午，他已经是总经理了，虽然尚未确定工资。当时，拉尔森忘记了吃午饭，在回忆过从那间分割成办公室的大厅里消逝了的身影、担忧和表情之后，他开始缓慢而平稳地走下那道人一上去就吱吱嘎嘎发响的通向厂棚和另一部分码头的铁楼梯。

他笨手笨脚地往下面走着，心里觉得发虚、孤立无援，当他走到第二段楼梯，看到墙壁已不复存在、吱嘎乱响的铁楼梯悬吊在空中时，竟有点夸张地颤抖起来。后来，他踩着潮湿的沙地继续走着，留神鞋子和裤脚不被杂草拌住。他贴着一辆四只轮子都陷入地面的卡车走过去，露在外面的汽车发动机上还残留着一些锈迹斑斑的零件。他顺风朝汽车啐了一口，“简直无法相信，而且老头子没看见这一切？如果爱护它的话，只要放到棚子底下，就能值五万多。”他突然充满了活力，昂首挺胸地从一个门槛下面有三级木板台阶的窝棚对面穿了过去，走进那个没有门扇的巨大的棚子。他后来学会了管这个棚子叫厂房或库房。

虽然光线灰暗，天气很冷，风从房顶铁皮上的窟窿眼里飕飕地往下灌，虽然他那饥肠辘辘的身体很虚弱，但是，矮小而全神贯注的他还是在长满了锈的无从捉摸的机器中间走着，还是在巨大的货架之间的窄缝中走着。货架的长方形隔板上堆满了螺丝、活塞销。千斤顶、螺帽、钻头……他决意不为自己的孤独、不为这白白地被弄得

狭小了的空間、不为那些被恼怒的苧麻绳穿着眼的工具而气馁。他在棚子的尽头停了下来，站在堆积起来的救生艇旁边，俯身去捡一张用白颜色描着机器和字母的蓝色图纸，图纸上满是泥污，硬邦邦的，沾在上头的长长的草叶已经弄不下来了。心想：“八个人的小艇，一块过滤器似的布，防腐木材，橡胶救生圈，一千比索我看都打不住。”

“败家子儿！”他大声地自言自语，感到痛苦而带着轻蔑。“如果没有用，就该归档，”他看着那张图纸，“不能扔在棚子里。这必须改变，老头儿容忍这样干，准是疯了。”

他的话连回声都没激起。风变成平缓的漩涡，从棚子的一侧如游刃一般、不慌不忙地灌进来。所有的話，包括那些脏话，那些威胁性的話和那些自豪的話，话音未落就被忘却了。从古至今直到永远，除了厂房那高高的脊角、斑斑锈迹和盲目孳生、相互缠绕的杂草以外，什么也没有——包括正站在厂房中央的他。他无可奈何而且荒唐地蠕动，仿佛是一只神话故事里、在变幻莫测的大海中、在稀里糊涂的劳作和冬天的气氛里晃动着足肢和触角的黑甲虫，总是忍气吞声，来去匆匆。

他把图纸揣进大衣兜里，竭力不把身上弄脏。他咧开一个嘴角笑了笑，宽宏大度，富有男子气，仿佛是朝着老对手们笑，这些老对手被战胜了那么多次，以致相互间的仇恨此时变得柔软可爱了。同时他又仿佛是朝着孤独而空旷的废墟在笑。他把两只手往背后一背，吐开了唾沫，倒不是啐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一切，一切能看得见的和被代表着的、一切无须语言和形象就能回忆起来的东西：胆

怯、各式各样的无知、穷困、灾难、死亡。他连头都不动地啐着，嘴皮和舌头配合得严丝合缝。他朝上面啐着，熟练而准确，以无可名状的愉快心情跟着口水划出的抛物线往前走。他没有想办公室这几个字，也没想写字台这几个字，而是想：“既然老头子已经把最大的、尚且残存着玻璃门的那间屋子留作自用了，那我就把我的安置在有电话总机那个房间里吧！”

该是下午两点了，加尔维斯和孔茨大概已经回办公室去结束盘点了，在贝尔格拉诺之家已不可能搞到午饭吃了。他猛地从救生艇堆的脊梁上跳开，移步朝厂房门口走去。原来，救生艇都朽坏了，他两手虽揣在大衣兜里，却精确地计算过自己身高多少、肩宽几何，鞋跟踩在永远是潮湿的地面上、踩在坚韧的杂草上要产生多大的压力。他朝前走着，帽子随随便便地扣在头上，因责任而疑虑重重的两只眼睛有节奏地转动着，检阅那一排排红不棱登的也许永远瘫痪了的机器，检阅那千篇一律地对称排列着的放满破烂工具的货架。货架，高高耸立，一直顶到房顶，没完没了，一直无动于衷地、肮乎乎地排列到视野之外，排列到一条可能残存的楼梯的最后一级台阶之外。

他一步一步地实现计划，凭直觉认为这个速度是恰如其分的，而心里则揣着非失败不可的苦涩预感。这种苦涩的预感使他决意要从坟墓中救出那些金属零件和巨大的机器，同时也从五年或十年前被愚笨而自信的工人和粗鲁的工头搞得乱七八糟的角落里救出那些被杂草、烂泥和潮湿包围着的其他设备。他继续走着看着，警觉，左顾右盼，绷着面孔，摆出一副长者的风度，有意掩饰着威

严气派,决心要大刀阔斧地提升和裁减。他相信一切都是他的,他要毫无保留地献身于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使他的生活具有某种意义,并把这种意义归功于他的有生之年,并归功于他整个一生。他一步一步地走着,一直走进寒冷无力的风中,走进汇集成浓雾的潮气中不见了,被蒙住了。

凉亭之二

次日中午，拉尔森走进贝尔格拉诺之家并跟加尔维斯和孔茨共进午餐的时候，他已经财迷心窍并下定决心了。他从来没有确切地知道自己到底是选择了五千还是六千比索来排在工资表上第一名的位置上。实际上，他选择这个或那个数字，仅仅跟加尔维斯有关，因为加尔维斯每月二十五号都用打字机打表格，一式几份。加尔维斯往往打着打着就停下来摇晃秃脑袋，并愤怒地咒骂着，每月二十五号他都再次发现，再次明白他陷进了定期的、固定的荒唐把戏之中。激动经常迫使他中断打字起来走动，在空荡荡的大厅里走来走去。他两手背在身后，脖子上围着一条棕色的围巾，走到孔茨的绘图桌前面就停下来，朝着孔茨默默的惨然的笑容总是突发的，一闪即逝。

于是，这五千或六千比索准时地记入了账簿。不知是五千或是六千，这要看拉尔森的迷信思想促使他选择偶数或是奇数了。他选定了工资及其他以后，每天早晨都第一个到办公室，沉思着，冻得发抖。屋子被电话总机和那些乱七八糟的黑色电话线占去一半多，总

机眼下不那么满身尘土和肮脏了,但永远是聋子和哑巴。拉尔森不承认,他在这间作为总经理室的房间里安顿下来,只不过比加尔维斯和孔茨略胜一筹而已。

“这个可怜的小胖子,这个没有葬身之地的死人,这只勤劳的小蚂蚁!”如果他能看见自己在早上八点钟走进经理室,取下帽子,脱掉大衣和摘掉手套,然后在那把千疮百孔的皮椅子上尽可能坐得舒服些,查阅那些他头天下午挑选出来如山一样堆积在写字台上的卷宗的模样时,他就可能这么说。

自从他用了一整天来清理线路之后,唤人的电铃又响起来了,或者说又重新响起来了。当时,他还用黑颜色在饰有鱼鳞斑的玻璃门上涂上了“总经理室”几个字。每到上午过去一半的时候,他放下那些总是以“我们最亲爱的先生们”开头的腻味儿的蓝色旧卷宗,放下那些记载价格、吨位、用途、报价和还价的资料,按一下写字台上两个电铃按钮中的某一个,呼唤加尔维斯或孔茨,同时,整理一下领带并独自演习一下丢眼色和微笑。他们,不管是这个或那个,听到小铃铛卖力地颤抖之后,便自我嘲弄一番,然后去敲门,请求允许进来,一面称拉尔森为“先生”。

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去领过工资,月底的时候既没领过五千比索,也没领过六千比索。但谁也不否认,当加尔维斯或孔茨推开总经理室那道镶着玻璃的木板门、他用微笑和热情的手势招呼来人落座时,总是显得意满志得。谁也不否认,他就一些冠冕堂皇的问题提问和听取回答时往往流露出一种痴呆的快活之情,其实,这些问题可能根本不着边际,诸如收支状况啦,目前锅炉的容量限度啦,等等。

他跷着两条腿，两只手的手指交叉放在嘴前，满脸专注和疑惑的神情，有时他把自己想象成老头子佩特鲁斯，驾驭其企业，掌管其利益。

在写字台的另一边，加尔维斯或孔茨中的任何一个编造的一切谎言、鬼话，以及他们说话时总是带着那种适时的职业性的微笑、点头哈腰、一口一个暗含讥讽的“总经理先生”，都使拉尔森心里热乎乎的。

“我明白，那当然啦，没错，自然是的，我也这么想。”每当他们停顿的时候，拉尔森总是高兴而慎重地说着这些字眼儿，似乎是在把钱借给一个朋友。

中午，他快打哈欠的时候，总是从旧台历上撕下一张纸，记下他刚听见的最俏皮的话。他想站起来拥抱加尔维斯或孔茨，说一句下流话，拍拍对方的肩膀。不对，出于自我控制和忧伤，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只向对方道谢并只用一个简短的手势、一种友好和赞许的微笑来表示谢意。

他等着，直到听见加尔维斯和孔茨离开办公室，然后耐心地扯碎那些写满他似懂非懂的俏皮话的纸头，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手套，从一个没有玻璃的窗户框里看着孤零零的库房，看着库房周围积满了水和杂草的地面，用鞋跟儿把空空如也的大厅那满是尘埃的地板跺得直响，从那道通向茅坑和鸡窝的用铁丝扭成的后门走进贝尔格拉诺之家。钻进自己的房间之后，就在用柳条和旧印花窗帘布做的沙发椅上晃悠，看《自由报》，对着天花板东拉西扯地念叨关于冬天的谚语，等着开午饭。

下午，在搬动、拍打和一页页地翻阅卷宗整整一天之后——卷

宗里记载着采购和加工情况,尽管他绞尽脑汁竭力想象,还是什么也看不明白,那些东西对任何人都是毫无意义的了,无非为了证实自己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然后,便锁上那些形同虚设的锁头,走到贝尔格拉诺之家去刮脸,穿上那件总是干干净净、熠熠生辉的袖口已磨破了一点儿的绸子衬衣,出门的时候如果碰见老板,就撒谎说去一个体面的地方,然后就兜大圈子,在泥土街道或人行道上踟蹰,留下始终变化无常、犹犹豫豫的脚印,留下模糊不清的、见所未见的小径,这些都是阴谋诡计和口是心非的产物。

有时早一点,有时晚一点,他敲响沉重的大钟,穿过大铁门,用嘴角向那个显然是因为压抑而变得凄然的女佣递过一个飞吻,投过去一道无可奈何的目光,引诱她对这种无可奈何产生共鸣。他跟在她后面走着,实际已经用不着让人领着走了。穿过气味浓厚的高大植物之后,走进了开阔地。此时,很快降临下来的夜幕,被一动不动的白色大理石雕像戳出好些个窟窿。

走到离大铁门五十来米的凉亭跟前时,他笑容里无可奈何的神情一扫而空。他青春焕发,他信心十足,梦想着未来,梦想建设更幸福的明天。幻想并实现幻想,他绝不会丧失信心。也许,他把手绢铺到铁椅子上坐下去之前,在延续那做作的、如痴如醉的、又惊又喜的微笑之前,就会先吻吻姑娘。那微笑在说:我盼了一整天这个时刻,现在还怀疑这是真的!也许,他们只是在听见女佣和狗叫声走远、走向水泥柱支撑着的那座房子以后才接吻。那座房子的大门,对他拉尔森一直是关着的。“只是看一看,到您住的地方去一下,到大厅、楼梯去一趟。”他这样要求过。她的脸红了,把两条腿交叉

着一并,对着地面笑了一阵,然后说不行,永远不行,应当由佩特鲁斯邀请他。)

也许,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接吻。可能拉尔森在延长他采取谨慎态度的时间,等待他发现佩特鲁斯的女儿到底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女人那个不可避免的时刻,等待用什么方式来忘掉玛丽亚和格拉迪丝,以及可以用何种勾引手段才不致使她害怕、歇斯底里,不致弄个不欢而散。“她比我能够想起来的任何一个女人都更疯狂。”拉尔森曾经躺在贝尔格拉诺之家的床上,欲火中烧地思忖过,同时还赞美她:“看得出来,她是个大家闺秀,不可多得,她从来不曾接触过男人。”

如果说,害怕失败和另一种说不准的事儿,要比促使拉尔森不耽搁就职和不失时机地建立这个唯一可以使他和女人的关系具有某种意义的基础的职业感和责任感更为强烈的话,那么应当承认:假如安赫莉卡·伊内丝·佩特鲁斯能够造出一些句子来的话,她就会说出描述凉亭里的黄昏幽会的最要紧和最风趣的话语——

“在他到来之前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就开始出汗了,坐立不安。因为我害怕他来,又害怕他不来。我搽上胭脂,洒上香水。在他提着裤腿坐下的时候,我看他的嘴。我笑的时候,举手挡住眼睛,尽情地看他,毫不觉得羞耻。在凉亭里,他拉着我的手。他有一股怪味儿,有我的味儿,有爸爸在厕所里抽雪茄烟时候的味儿,有干肥皂沫的味儿。我觉得一阵阵恶心,但没呕出来。何塞菲娜,就是黑姑娘,笑了。她什么都知道,就是不告诉我,但她不晓得我知道的这一点。我向她表示温存或者送她个小礼品,让她问我,但她从来没问过

这一点,因为她不晓得,无从想象。她生气的时候就笑,问我一些我不感兴趣的事儿,胭脂、香料什么的。我从窗户里往外瞧,或者亲迪克小狗,迪克叫了起来,想下楼去,让我陪着它走。我想起了真真假假的事情,把它们搅成了一锅粥,我总是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几乎没有猜错过,他不得不在我说‘从街口拐角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来到。

“起初,我希望他是爸爸的兄弟,但愿他的嘴巴、手和声音在一天中的各个时候都不同,只希望这些。他来了,爱上了我。应当来,因为我没有去找过他。现在他和爸爸是朋友了,我看不见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一起呆在办公室里。爸爸看着天空,脸庞消瘦,没有光泽。他不是这样。我下楼去等他,我对着迪克发笑,对着碰见的一切发笑。笑容又很快收敛起来,以便不带笑容,或者只保留他来到我跟前把手伸给我并开始瞧我的时候我想保留的笑容。那时我就笑一会儿。看他怎样坐下。他用指头拎着裤腿,轻轻拍打两下座位就坐着不动了,两条腿叉着。晚上,他不在了,我们为天主和亡魂点蜡烛的时候,我在考虑真实的事情。但在凉亭里我总是想那些骗人的事。他对我说话,我看着他的嘴,我把一只手递给他,他耐心地解释他是谁,如何如何。不过我也哭,我在床上想起那些骗人的事,觉着自己在用鞋子摩挲凉亭里的小草的时候就哭,我从来不踩坏小草,我想了解它。我想妈妈,想那些冬天的夜晚,想离得很远的死了的洛德^①,它站着睡觉,雨水打在它的脊背上,想拉尔森,他死了,离得很远。我又从头想一遍,哭了。”

① 洛德,马的名字。

窝棚之一

丑剧可能以后才会发生。不过也许应当不失时机地提醒他，免得忘记了。无论如何，应当在拉尔森再次同贫困照面之前提醒他，在贝尔格拉诺之家的老板波埃特斯收敛起笑容和几乎不同他打招呼、停止让他赊欠饭费和洗衣费之前提醒他，在肥胖、阴沉和束手无策的拉尔森跟他在接受“收尸人”这个绰号时似的重蹈二三十年前的覆辙之前提醒他。那时，他戒了马黛茶和烟，赌咒发誓地答应还钱而又不能兑现，上午靠可怜的小恩小惠从跑堂那里借个熨斗，要支香烟，要点儿开水。

出丑可能推迟甚至避免。看起来，也可以选择那天下午之前的任何一个时候发生。那天下午，安赫莉卡·伊内丝·佩特鲁斯进了拉尔森的办公室后又出来了，站在大屋子通往楼梯入口的那道门前，风就在那里缓缓地打着漩涡。她的连衣裙撕破了，耷拉在胸口上，那是她披着敞开的大衣走回那个粗糙的玻璃上涂着“总经理室”黑色字体的地方的时候，自个儿从肩膀扯到腰间的。

我们可以假定是在一个拉尔森觉得被饥饿和倒霉弄得萎靡不

振、被排斥在生活之外、没有勇气给自己提虚劲儿的时候，一个礼拜六的午后。他正在办公室里看一份七年前的二月二十三日向那艘出了故障停在罗萨里奥港的蒂芭号的船东凯松有限公司做的预算。风雨交加已经四十八小时了，暴涨起来的浑浊的河水奔腾咆哮，令人难忘。四五天以来，他就只靠在凉亭里喝茶时吃的那点儿薄饼干和果酱充饥。

他放下卷宗，慢慢抬起了头，只听见风声呼呼，加尔维斯和孔茨已经走了。他觉得饥饿也能听得见，饥饿此时已从肚子里钻进脑袋和骨头里去了。也许，七年前的三月里，装载着小麦的蒂芭号从罗萨里奥港出去的时候沉没了。也许，蒂芭号船长查德维克驾着它安全抵达了伦敦，凯松有限公司（休斯敦航线）把船弄到塔梅西斯船厂去修好了。也许，慑于权势，凯松公司或者查德维克先生经过讨价还价后接受了预算，或者接受了最后报价，那条以女人名字命名的肮脏的灰色轮船，卸货后顺流而下，到造船厂对面抛锚停下了。然而，在那个只存有一张剪报、一封来自罗萨里奥的信和另一封赫雷米阿斯·佩特鲁斯签署的信的副本、以及那个细致的薄薄的预算的卷宗里，看不出真实情况。蒂芭号的其他情况，是幸运地或是可悲地消失了，也可能在档案室里的那一堆堆卷宗和书本里。卷宗和书本在总经理室的墙根底下堆了半米高，大楼的其他地方也堆得乱七八糟。说不定下礼拜一能找到，说不定永远也找不到。不管怎么说，有上百件相似的案例，有的有结局，有的没有，可以徒劳无益地看它几个月或几年。

他合上卷宗，在封面上描出他的姓氏的缩写，表示他已经看过

了。他穿上大衣,拿起帽子,把办公室这一层楼上所有的柜子和门上的锁、把全部能关锁的、有钥匙和有插销的都锁上。

不是他饿得不想吃饭了,而是为其茕茕孑立和饥肠辘辘而悲哀,以及对一块台布的怀念——洗得干干净净,白生生的,平平整整的,有几个小小的补丁和刚弄上去的脏印儿,上面放着沙沙作响的面包、热气腾腾的盘子,同伴们高高兴兴地围在四周说粗话。

他想起了那个木板窝棚,加尔维斯住在那里,也许跟一个女人,跟孩子们住在一起,窝棚就在甘蔗地和库房中间。差不多是下午一点了,他朝那里走去,边走边准备着要说的话。“关于蒂芭号和英国佬查德维克及其凯松公司这件事,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公司是只发了一封信呢,还是我们在罗萨里奥有个代理人呢?我说罗萨里奥,是指包括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的任何一个港口。请您原谅,我在办公时间以外打搅你们了。”

然而,他们没让他说出这番心里话。就在他停下脚步,准备摘下帽子和微笑着站在那几个蹲在地上的人跟前,微微躬起身子免得烤肉的油烟沾上他的大衣的时候,他们就解除了他提问和撒谎的义务。他们决定不让他说话,从一看见他这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矮小、笨拙的人用那双套着油亮油亮的鞋子的小脚乒乒乓乓、小心翼翼地踩着铁梯板,像擎着一件武器、一个贵重的礼品和一种高贵的象征似的扶着帽檐走进风里,走进露天里,沿着楼梯走过来的时候,就心照不宣地决定了。

“来杯马黛茶吗?这是我的太太。对不起,我要弄火,它快灭了。”加尔维斯在一圈圈的烟雾里和一阵阵油脂的吱吱声中笑着说。

德国人站起来了，点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伸过胳膊来把马黛茶递给他。

“谢谢！我就待一小会儿。”拉尔森说。

他摘下帽子，把手伸向那个女人。她挺漂亮，头发乱蓬蓬的，肚子大大的，正从窝棚的宽台阶和那个用木板围着窝棚的应该叫做门厅的地方朝拉尔森走来。门厅是夏夜他们或幸福或感慨地坐在这里呼吸河面上的空气的地方。女人穿着一件男大衣和一双男鞋，走路来一摇一晃的。她身体宽阔，皮肤很白，一边走一边理着头发，并非为了枉费心机地弄出一个发型来，也不是为了因没有发型或者发型被弄乱了而表示歉意，而是为了让风别把头发吹到眼睛上。

“我很荣幸，太太。”拉尔森又快又清楚地说，觉得脸上毫不费劲地浮起了第一次接触女人时的那个昔日的微笑（神采奕奕的，保护人般的，意味深长的，没完全隐藏住老谋深算的），时光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都没使它走样。

他开始吮马黛茶，同时朝四周看了看。木板窝棚好像一个放大的狗窝的复制品，门槛下面有三级台阶，看来过去漆成过蓝色。墙角那儿有个拼得歪歪扭扭的内河船只的舵，那是从某条蒂芭号的残骸上拆下来的。

他又看了看那两条对他不信任的小狗，看了看办公楼，砖墙库房和一堆堆锈迹斑斑的朽坏了的铁板，看了看微风中波浪不兴的河面。

“这个地方不错！”他换了一种笑容说，依然笑得毫不费劲，带点有礼貌的羡慕。

狗藏到女人的大腿中间去了。女人个子高高的，稳稳当当地站着，耸了耸大衣底下的两只肩膀，冲着拉尔森露出了两排年轻的、斑斑点点的牙齿。

“他是来看看穷人是怎样过日子的。”加尔维斯站起来说道，马黛茶吸管衔在嘴里，满脸恼怒的冷笑。

“我是来看望朋友们的。”拉尔森温和地说，仿佛发现了加尔维斯可能会严肃地说话似的。滚烫苦涩的马黛茶，在他的五脏六腑中飞快地跑着，他觉得很想打架，要踢烤肉的那个家伙一脚，看着那个女人说一句下流话。

“我正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看着指甲背诵般地说，“突然想起要在这个周末写个报告。今天上午我复查了一下档案，研究了一下几年前一条在罗萨里奥港出了故障的轮船的船长做的预算。”

他想，他们让他说话是不怀好意，他们商量好了假装制造一个尊重他的安静环境，迫使他坦白他装的洋蒜、他的绝望。他藏起双手，低头去看自己的鞋尖。他的鞋尖在烧焦的杂草、被泥巴糊得硬邦邦的纸片和又潮又脏的泥泞中一会儿跷起来，一会插下去。后来，他听到在窝棚侧面伸出去的大木板门厅——他们管它叫走廊——里面，收音机开始播放探戈，也许是那时他才开始听到探戈的声音。

“那条船，蒂芭号，正在罗萨里奥港装小麦的时候，需要修理才能起锚开航。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没有记载了，档案室里的卷宗乱七八糟的，要找到其余的材料就费劲了。”他像在寻找着告辞的方式，“首先应该采取的一条措施，我冒昧地说，是整理档案和全部贸易文件。”此时他情愿发疯或者死掉，迷迷糊糊地瞧着自己的两只鞋子在

被雨水泡得黑乎乎的地面上动来动去，朝着那个宽阔的、一动不动的女人徒劳无益地发表演说。他实在说不下去了的时候，抬起头来瞧了瞧他们，一个一个地瞧，两个男人，一个女人，两只狗。他把双手揣在口袋里，气喘吁吁的，帽子压住了一只耳朵，两只眼睛返老还童了，寻根究底地看着。

“要看是哪一年的事了，”孔茨忧郁地说，“我不记得我是否参与过这个预算。”

加尔维斯依然蹲在那里看着火。

“肉生得很吗？”那个女人问。

加尔维斯闻声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把刀子，他惊奇地看着她，仿佛不理解她的问话，仿佛她的脸上或者问话里揭示了某种他过去没有看出来因而感到惭愧的东西，他朝她笑了笑，吻了吻她的前额。

“水凉了。”孔茨说，“如果礼拜一您能把卷宗给我看一看的话，也许我会知道。”

加尔维斯凑到拉尔森跟前，竭力忍住不笑出来。

“干嘛不把大衣放到屋里去呢？”他轻声地吩咐说，“您这就去拿只盘子和一副刀叉来，您是知道放在什么地方的，我们吃饭吧！”

拉尔森没有看他，迈上那三级梯子，把大衣扔在床上，摘下帽子，拿过一只搪瓷盘子和一把叉子，回过身来亲切地对着重又陷入沉默的几个人微笑，似乎是他在请他们吃饭。他转过身子去欣赏那吱吱爆响的烤肉，收音机低声唱着一支鼻音沉重的探戈曲，歌词里满含哀怨的乡愁和愤懑的仇恨。

就这样，拉尔森逐渐审慎地相信，可以用其他的幻想，用他曾发誓不再轻易使用的行骗方式来和那形同幻影的佩特鲁斯股份公司总经理这个头衔相辅相成。

也许，当他心里明白这个月底和他有生之年中的任何一个月的月底他都领不到那五千或六千比索的时候，当他不止一次面带喋喋不休的酒鬼的微笑走进柜台，而贝尔格拉诺之家的老板不是继续看报就是驱赶苍蝇的时候；当他在穿越熟悉的迷宫，沿着僵硬的大理石雕像走到凉亭之前，不得不把衬衣的袖口掩藏起来的时候，他都得硬着头皮说：“有门儿。”

不过，这一次是他自我欺骗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他毫不费劲地、绝望地保持着总经理头衔和日益寒冷的凉亭，以及加尔维斯同那个穿着男人衣服的女人、肮脏的小狗居住并在里边或外边吃饭的窝棚这三者之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除了他得到的同情时隐时现和对那个女人持之以恒的欢快秘密百思不得其解（“不是因为她无可奈何，不是因为她能得天独厚地同那个家伙睡觉，也不是因为她呆傻”）之外，使他放心不下的事情微乎其微。实际上，他得到的这种游移不定的情分，只不过是另外的加尔维斯和孔茨，另外的贫穷而幸福的女人，被忘却了姓名和面容的、曾经使他产生了坑蒙拐骗和破罐子破摔是天经地义、完全可以容忍的这种感觉的朋友们那种情分的再现；他们那样做，没有目的，没有真正当回事儿，除了相互帮衬这种下意识的冲动之外没有别的意思。加尔维斯和孔茨从第一天起，就既不是奴颜婢膝也不是毫无讥讽地忍受着拉尔森的两手把戏：拉尔森每天上午从八点到十

二点,下午从三点到六点在总经理室,吃晚饭前不知去向;谈及佩特鲁斯老头子或者拐弯抹角地提到佩特鲁斯那个女儿时,他则装聋作哑。

每餐晚饭都一直吃到很晚(现在几乎餐餐都是吃烧菜;因为天冷,只好在窝棚里做饭;它经不住烟熏火燎,没法儿烤肉),成升成升地喝着葡萄酒。听着收音机里沙哑的探戈(两只狗都睡着了。那个女人把大衣领竖起来御寒,粗嗓门儿轻轻地哼着小曲儿,笑眉笑眼的。从她哼的每个字里都流露出她那令人费解的欢乐和固有的天真),怡然自得地七聊八扯些奇闻轶事,相互讲述着故意不牵扯自己的美好的回忆。

他们不再憎恶拉尔森了,而且差不多可以肯定,他们容忍拉尔森是由于他们认为他疯了,拉尔森在他们心中搅起了一种浓厚的发了疯的同感。也许,是因为他们听着拉尔森用低沉的嗓音拖着长腔谈论一九四七年油漆船体的价钱,或者提出一些维修这条河里从来没有航行过的幻想中的轮船而赚大钱的幼稚的主意时,从中得到了一种不可言状的满足。也许,是因为他们从拉尔森同贫困搏斗的种种可能的结局里,从他那为了硬挺、干净的领口和毫无光泽的裤子以及烫平了的白手绢上,从他那为了装出体现信任、精神安宁和只有富裕才能产生的粗俗的满足、无休无止及犹豫不决的奋斗中,得到了乐趣。

凉亭之三

窝棚之二

就在那些日子中的某一天，拉尔森顺流而下，到了梅塞德斯。那是造船厂之港南边的第二个港口，他去变卖他仅剩的一点儿东西：一只镶钻石的胸针和一颗宝石。这两件东西是一个早已不知去向的女人送给他的纪念品，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们的身价一点一滴地逐渐高了起来。

他轻轻地倚在店铺的柜台上，站在那里让别人洗劫一空。变卖停当后，出于迷信，他又购回一件小首饰，以此给自己壮胆和聊以自慰。他站在市场的旁边，面对着一片片低矮的平房，身旁有卖丝绸和袜子的，有卖杂志的，有卖女鞋的。在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冷漠的土耳其商人窄窄的玻璃柜外边，拉尔森重温抚摩女人馈赠的礼品，沉湎于快感的遐想之中。那些毫无用处或用处不大的，弯弯曲曲的玩意儿，曾经同各色各样的手和眼睛飞快地建立过友谊；随着星移斗转，它们慢慢地损耗了自己的身躯，驯顺地改变了自己的含义。

“都太贵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好玩意儿。”拉尔森说了一句，但丝毫不起作用，话音消失在土耳其人那老谋深算的、忧郁的沉默里。

最后，拉尔森在讨价还价中作了让步，选中了镀金香粉盒。香粉盒上镶有一面小镜，盖子上刻着一个盾牌，一只天鹅正挑衅地从盾牌人像的鼻子和嘴唇上飞过。他买了两只，一模一样的两只。

“把它们分开包好，免得互相蹭着。”

他独自在一个陌生的饭馆里吃了午饭，然后在口袋里塞满巧克力糖果，乘第一班船回去了。

当天晚上，加尔维斯窝棚里的那几个人在惦念他，谈论关于他的笑话。拉尔森在贝尔格拉诺之家付完账并预付了两个月房租后，同老板共进了晚餐。他坐在老板对面，一直喝到第二天黎明，他们议论钟表业，议论人生的坎坷，议论一个年轻国家不可限量的未来。不知不觉中，拉尔森早就喝醉了。后来，他到柜台跟前去喝最后一杯白兰地时，暗示债权人委员会很快就会解除对佩特鲁斯的三千万比索的冻结了，而且暗示他只等这一点落实就宣布他同安赫莉卡·伊内丝的婚约。

上床睡觉时，他想起他只有两百来比索可以继续加在加尔维斯的窝棚里凑份子搭伙了；末日已经临头了，再过两个月，就会无床可睡、无饭可吃；老态已难以掩饰，而且也无所谓了；胸针已经卖掉，会带来什么厄运。想着想着，睡着了。

第二天，不知是上午八点还是九点，他在办公室里又准时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睡意蒙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醒过来。面对头一天遗留下来那一大堆记载着无头案件的卷宗，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

头。看了一阵，他耐不住了，想到大厅里去，到那张被遗弃的桌子跟前去，加尔维斯和孔茨十一点时在那里煮咖啡。他听他们走动和说话已经有一会儿。加尔维斯伏在那些巨大的账簿上，德国人则在查看描着清一色蓝线条和秘密记号的图纸。图纸硬邦邦的，每张下面都有写满计算数字的纸页。

拉尔森看着一个关于打包机的自动翻斗车的报价，忘掉了加尔维斯和孔茨。他又想起他们的时候，便慢慢地离开了正在看着的卷宗。他点燃一支香烟，尽量不移动身体。他侧耳倾听，听见了一阵毫无生气的说话声，几乎没人响应的笑声；听见了像木头开裂似的嘎吱嘎吱的风声，一声狗叫，几来自不远处的轻微声响，除此之外，四周一片沉寂。

“他们跟我一样疯癫。”拉尔森想。他把头缩回来，一动不动地停在凉飕飕的空气里。鼓起两只眼睛，轻蔑地撇着小嘴巴，嘴里仍叼着香烟。他仿佛正在干奸细的勾当，仿佛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很多年前的样子——肥肥胖胖，上午几小时几小时地呆在一个破烂得不像样子的办公室里赌钱；实际上是闲读轮船幸免于难和赚取亿万比索的惊险故事。他仿佛看见自己在三十年前一个他了如指掌的地方，在女人和朋友（他和小伙子们都灰尘满面，他和女人们都嬉闹调笑）面前开玩笑，高谈阔论他的幻想；幻想总是以吉祥的预兆、发财致富和欢欢喜喜的大团圆结局。他仿佛正在创造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拉尔森，仿佛可以用手指头指出这个不可能存在的拉尔森，指责他的迷乱和癫狂。

一刹那间，他仿佛看见自己在一个当今独一无二的地方，看见

某个年月、待在某个地点的自己和一段往事。他仿佛刚才死去了，仿佛其余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回忆、经历、诡计、淡淡的好奇心而已。

“他们和我一样虚伪。他们嘲笑老头子，嘲笑我，嘲笑那三千万比索；他们甚至不相信这里是或者曾经是一座造船厂；他们很有教养地耐着性子听老头子、我、卷宗、这座楼房和这条河流向他们讲述关于船只进厂维修、两百个工人干活儿、股东大会、欠条和在交易所黑板上标出时高时低的股票的故事。他们并不相信这一切，我看出来了。他们甚至不相信他们接触到的和正在干着的事，不相信钱币上的编号，不相信比索的数目和个头。然而他们每天都爬上铁楼梯来做七小时的上班游戏，觉得这种游戏比蜘蛛、滴灌龙头、老鼠和烂成了泡浆的木头还要真实。如果他们是疯子，那么我也一定是疯子。因为如果是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玩游戏的话，可以说是在做戏，然而如果别的人陪我一道做戏，那么游戏就是严肃的了，就要弄假成真了。我作为参加游戏的人（因为那的确是游戏）同意这种做法，也就是同意一起发疯。”

他清醒过来了，觉得疲乏、虚弱。他吐掉香烟，站了起来，走到门口去推那扇写着“总经理室”的门。他笑容可掬，两手一晃一晃地走到加尔维斯和孔茨落座的那张桌子前。那两人正在喝咖啡，同时有节奏地摇晃着悬吊着的大腿。

“有我一杯吗？”拉尔森给自己倒咖啡前问了一句。“饭前一杯，饭后一杯。这比开胃酒还来劲儿。这几公里从来没使用过的铁轨真叫我心疼！沿着铁路修一条公路的主意很好，当然啦，得经过允许。”

“至少那些枕木可以利用，”加尔维斯说，“我们烧枕木做饭、取暖。”

“总还有点儿用处。”德国人安慰他们说。

“还是太可惜了。”拉尔森说。他把杯子放到桌子上，看了看两人的脸，用手绢擦擦嘴。“今天下午我不来办公室了。我给你们留下五十比索今天晚上用，你们去买点东西，咱们来一顿。”

“您别忘了，今天不是礼拜六哇！”孔茨说。

“没关系！”加尔维斯接着说，“我们开开心心吧，没什么可担心的！你们都有好几千比索记在账本上哪！”

午饭后，拉尔森往床上一躺，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那些前面已经说到的人，他们的脸孔走马灯似的在他的脑子里转，表情是羞答答的，仿佛在询问，又像在唾弃。醒来之后，他翻了个身，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听远处的牲口哞哞地叫着报告天色已晚，听老板从窗户底下发出的声音。这时，他觉得肚子发胀，冷飕飕的，浑身发紧。他找出一支香烟，用毯子盖住双脚，看着天花板上透进来的黄昏的一丝阳光。他突然想起了在乡下度过的童年生活，他和所有的人一样，也有过一个天堂般的、有慈母关怀的、宁静的童年。这时，在袅袅的青烟底下，他闻到一股类似渔民聚集在海滩上的那种尿臊味儿。因为这里每隔七天就会有一根下水管道破裂，弄得厕所里屎尿横流。他听到老板正穿着胶靴，向两个女佣和那个男仆发号施令。

他一直等着，到天花板上的阳光移到下午六点那个地方时，便起身对着镜子摸了摸太阳穴上的毛茸茸的肉，往头发上抹些水，然后把滑石粉洒在三根指头上，按摩两颊、额头和鼻子。他打领结、穿

外套和挑出一只香粉盒时，想都不愿想一下，“镜子里瞧着我的这位先生，那个德性啊！”他走到屋外，觉得空气好像冻住了；自己也像冻住了似的直挺挺地走着，鞋跟蹭地却发不出响声来。潮湿的街道两旁的树木又高又大，他走在当中显得那么黑、那么小。

栅栏门是关着的。他看了看窗户里透出来的暗淡的灯光，听了听鸦雀无声的院内的动静，觉得有条狗在院当中，于是拉了三下门铃的绳子。“我真可以给自己一枪。”他冷漠地想到，可怜起自己来了。狗的声音听不见了，有个人划破初降的蓝色夜幕，绕过凉亭沿着砖砌小路走过来。狗一路小跑，喘着气朝着栅栏门左一下右一下地对着那些大理石雕像汪汪地叫起来。树梢上正透出一片亮光，“我也可以……”拉尔森想着，缩起了脖子，口袋里的手使劲儿握着香粉盒。

不是何塞菲娜，是安赫莉卡·伊内丝。她走近门口时停住了脚步，狗围着她跳跃。今天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腰上系着带子。

“以为您不会来了哩！”她说，“爸爸就要回来，我们把大门关上了，因为他不喜欢。何塞菲娜在厨房里。”

“我有许多事要办。”拉尔森解释说，“工作很忙。另外我还到圣玛利亚去了一趟，买点东西。您猜猜看！”

她推开大门，把狗撵走。她装着弯腰捡石头吓唬狗时，咯咯地笑起来，然后又扬起脑袋笑着，把一只胳膊伸给拉尔森。拉尔森立刻从她身上闻出一种夏季的花香。他们走近凉亭的时候，看见里面有一道黄色的亮光，这道一动不动的光芒随着天色越黑和走得越近而越发亮了起来。

他们走到烛光摇曳的光亮处。拉尔森不信任地瞅了瞅又旧又脏、沉甸甸地压在石桌上的实心烛台，蜡烛插座显示出动物和花朵的形状。“像是犹太人的物件，像是银的。”

她又笑了，伏在桌子上，烛光颤抖起来，白色的连衣裙拖到系着亮晶晶带子的鞋上，挂在脖子上和胸口上的蜡做的珍珠项链和胸链在烛光中一闪一闪地发光。拉尔森摘下帽子，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嗅了嗅潮湿而寒冷的气味儿，突然觉得那白色的连衣裙也又潮湿又寒冷。

“我冒昧地给您带来一件礼物。”他说着，往前跨了一小步，拿出香粉盒，“微不足道。不过也许能向您表表心意！”

四四方方的崭新的香粉盒炫人眼目，使黄色的烛光显得更黄了。安赫莉卡又笑了一声，跟鸟叫似的。她嘟哝了一句推辞的话后，便伸长了双臂，先是犹犹豫豫，后来鼓足勇气，一把抢了过去。狗远远地叫着，一会儿走开，一会又走过来。天突然变黑了，蜡烛燃得更欢，似乎带着报复性的欢乐。

“让您记着我！”拉尔森说，并没有走近安赫莉卡，“让您打开粉盒，照照镜子。多美的两只眼睛啊！多美的嘴啊！也许，您照镜子时，会明白——我没有你，怎么过啊？”

声音若断若续，令人感动，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当伊内丝在镜子里看自己那半开半闭的嘴唇，对着粉盒移动挤得紧绷绷的牙齿时，可能会想象——假若有天晚上拉尔森不在，假若有天晚上永远失去了拉尔森……然而，此时拉尔森正为他自己的态度、为隔在中间的距离、为发软的腿、为把帽子按在肚子上的动作而感到羞

愧；他深知自己这会儿的熊样儿，心里觉得很不受用；一边后悔无法更改自己那失败的表情，一边却又暗自赞叹刚才说得恰到好处。

“真漂亮，真漂亮！”安赫莉卡双手把香粉盒捂在胸前，好像害怕冻坏它。她挑衅性地看了看拉尔森说，“现在归我了。”

“归您吧！”拉尔森回答，“让您记着我。”他想不出别的华丽和有用的词藻了。

只好让故事这么收场——冬天，夜幕初降；七支蜡烛在冷冰冰的空气中燃烧，女人接受了香粉盒。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殷勤而忧郁地微笑着走近安赫莉卡。

“如果您知道……”他开始语无伦次。安赫莉卡往后缩了缩身子，两条腿原地未动。她上体后倾，缩着肩膀抱着香粉盒。

“别！”她叫了一声，随即又迷人地喃喃低语，跟唱歌似的，“别，别，别。”然而，当拉尔森刚碰到她的肩膀时， she 就把礼品一丢，将嘴唇凑了过去。她把头靠在烛台底座上，无怨无悔地笑着，哭着。何塞菲娜的脚步声和说话声、狗叫着跑过来的声音把他们吓了一跳，两人急忙爬了起来。

她转转眼珠，想再哭一会儿。一只袖子碰到了烛火，拉尔森伸手拉了一把，一股汗毛的焦糊味儿钻进鼻孔。她在地板上摸着找到了香粉盒。

何塞菲娜在黑暗中边向狗许诺着吃的，边走过来。拉尔森拿起了帽子，在安赫莉卡前额上吻了一下。

“在我最幸福的梦中也没有过。”他热情洋溢地信口雌黄。

夜里，拉尔森把头埋在大衣领和头巾里朝窝棚走去的时候，并没有因为胜利而感到高兴，甚至不能把他的得手想象为胜利。他觉得自己可怜巴巴的，不能吹牛，不敢相信。似乎他在闪烁摇曳的金色烛光中吻了安赫莉卡·伊内丝并非真事，或者他吻的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女人，或者吻女人的并不是他。

多年以来，利用女人为自己开路，已成为他一种必不可少的习惯，成为一项不管痛快与否都必须按时有效完成的工作。他那样做了，一次，又一次，毫无顾忌，也没遇到过问题，仿佛是老板发放工钱一样；他的办法是一方面自己承担义务，一方面促使对方俯首帖耳。不过，他总会从爱情中得到满足和感到一种隐隐的自豪，即使是在最狼狈和最难堪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就连在深夜聚会，朋友们看见拉尔森的情妇进来时纷纷装作打哈欠的情况下，他也能强装笑颜。那时，他的朋友们竭力想打破沉默，笨嘴拙舌地说出一句勉强编造或者临时想起来的话：“把拉布鲁娜牵连进来可是个麻烦问题。”

今非昔比了。此时没有自豪，也没有羞耻的感觉，空空荡荡的，回忆不起来了。造船厂后面延伸过来的砖墙从他左侧消失了的时候，他使劲啐了一口唾沫。转弯的时候，他又啐了一口，用手抹了抹脸。他看见篝火的暖烘烘的火焰，火焰照射在库房的洋铁皮上，冰凉舒适的微风送来一阵隐隐约约的音乐和一股烤肉的香味儿，火烧得很旺。

“她们都他妈的是些疯子。”他想，心里觉得轻松了一些。

他摸黑走着，摸索着踩那些七歪八扭地埋在烂泥里的砖头，他昂着头，脸上挂着那副从暗处走近小房子时越堆越满的兴高采烈和

慷慨大度的表情。他走到了会餐的地点，这餐饭是他掏的钱。

“各位晚上好！”他们发现他时他大叫了一声，然后从向他打招呼的人们跟前走过，去抚摸那两只狗的嘴巴。

晚饭后，拉尔森独自在小房子里同那个女人呆了一会儿。他带着跟抚摸那两条狗时同样忧郁和懊悔的心情，把香粉盒给了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让您记着我，打开盒子在镜子里看看吧！”

披头散发的孤僻女人变得黑咕隆咚的了。她身上那件男大衣扣得紧紧的，一颗硕大的别针把大衣一直扣到下巴。她的肚子鼓得老大，人都变形了。油乎乎、亮晶晶的脸上，透出一股不可言传的机灵劲儿。她无病呻吟地抗议着，又自我解嘲地笑了。她缓缓地、亲切地看着拉尔森，似乎他是她的父亲、兄长，觉得他有点滑稽，但骨子里是逆来顺受的好人。

“谢谢，真漂亮！”她说。她打开盒子，对着镜子仔细看了看那小巧利落的鼻子，“这对我会有用处的，……您送我这个，真有趣。不过您做得对，没关系。如果您问过我的话，我会对您说点什么。也不需要，不过我相信后来会向您要一个这样的香粉盒的。”她想听听关盒子时弹簧发出的响声，把它举到耳边合上了。接着，又把金色的盒子在亮光里晃了晃，看了看盖子上那个形状跟心脏似的盾牌，就揣进了口袋。“水大概已经可以冲咖啡了，您要什么？想让我吻您一下吗？”

她毫不掩饰地让他吻她，没有任何反感。拉尔森点燃香烟，对她神魂颠倒地轻轻一笑。过了一会儿他才相信了，绝望而克制地想

到：“这才是女人！要是她洗个澡，换件衣裳，涂上脂粉……假如我早几年碰上她。”他愈发神魂颠倒了，变得忧郁起来。

“不，谢谢。太太。我什么也不要。”

“那您就到外边聊天去吧，我给你们送咖啡去。”

拉尔森耸了耸肩膀，带着他固有的神情出了小房子。寒冷的夜空里，他第二次产生了取得一个复杂而又可望而不可即的胜利的感觉。他们围着篝火喝过咖啡后，又继续喝大肚瓶子里的葡萄酒；闲扯政治、足球、他人的好生意。女人和那两只狗已经在小房子里睡着了，加尔维斯伸了个懒腰，大声笑了一下。

“也许您不相信，”他说，又飞快地看了孔茨一眼，“在我愿意的时候，我可以把佩特鲁斯老头子送进大牢。”

拉尔森蹲下去就着一根树枝的炭火点烟，随随便便地问了一声：“干嘛您要把他抓起来呢？虽然您做得到，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些事，”德国人轻轻地说，“说来话长。”

拉尔森一动不动地坐在木头箱子上，等着他往下说；他嘴里叼着烟，脸上的表情麻木不仁。孔茨咳嗽了一声，一条狗闻声跑了出来，舔烤肉架上的油，小心翼翼地把一根骨头咬得咔嚓一声。远处，传来一声鸡叫。真正的夜晚来临了，寒气袭人。拉尔森瞟了一眼，发现加尔维斯阴森森地笑着，仰着满是笑纹的脸看着天空。

“您不会相信。”加尔维斯忧郁地说，“人家说，我这样儿‘不是笑，不是因为高兴，也不是嘲笑，生来就是这样，龇牙咧嘴的’。不过我可以把他送进大牢。”

拉尔森试图回忆不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听见谁说过这种居心不良的仇恨的话,但没想起来。……没错儿,是听见一个女人这样说过,不知是威胁他本人还是威胁一个朋友,说是要毫不留情地报复,说得玄玄乎乎的。

加尔维斯仍然仰面笑着。拉尔森吐掉了嘴里的香烟。三个人一会儿看看冬季里的黑蒙蒙的天空,一会儿看看布满白晃晃水洼的道路,一会儿又看看天上东一个西一个的坚持不肯离去的星星——它们需要有个名字。

造船厂之三

窝棚之三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孔茨敲了敲总经理室的门，鬼头鬼脑地走进来；他咧开嘴巴笑着，露出一颗金牙。（屋里光线灰暗，那是透过天上的凝聚着大雨和寒冷的厚厚的云层照进来的；变天了，冰冷的寒风嘶嘶地叫着，从大楼的各个窟窿眼儿里灌了进来！）

拉尔森从卷宗堆里抬头，不友好地打量着来人那嘲弄的、装神弄鬼的、隐含着绝望的表情。

“报告！”孔茨说着，身体往前一倾，百孔千疮的鞋跟啪的一碰。

“行政经理先生要求会见总经理先生，要求总经理先生赏光接见。行政经理先生认为他能够为某些流言的真相提供文字依据，文字依据——这是个恰当的字眼儿！”

拉尔森充满敌意但又无可奈何地咬住嘴唇，耸起肩膀盯着他，一言不发；从那条系在脖子上围了两圈儿的退了色的暗红色围巾里伸出的光头，表明他并没有喝醉，也不是寻衅；只是那眼睛里的痛苦和无以复加的木然的阴云，使他和往常判若两人。

“让他进来吧！”拉尔森傲慢地冲他把嘴一咧，“我的办公室永远是敞开的。”

德国人默默地点点头，向后转了半圈，出去了。拉尔森把藏在桌子后面的那只手里的左轮手枪放回拉开一半的抽屉里，用肚子顶着抽屉。他刚才一直在做戏；盛怒和希望的活力使他浑身颤栗，似乎又变成了年轻人。风呜咽着，吹着地上的纸片，掀起一个个小小的漩涡，把纸片送到高高的天花板上。加尔维斯敲了敲门，带着他那一成不变的笑容走进来，并没有挑衅的表情，颧骨显得很大、很老、很黄，一直走到拉尔森的办公桌跟前。

“技术经理先生通知我说……”拉尔森一字一句地说道。加尔维斯让他看了看摊开的手，脸上的笑纹更大了；他轻轻地把一张揉得皱巴巴的印着字的绿色道林纸片放到桌子上，仿佛在放一张经过千辛万苦才挣来的优胜证书。

拉尔森满腹狐疑地四下看了看空地上打转的旋风圈，随后念道：“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股份公司，获准发行，一万比索，董事长，秘书，股份归持票人所有。”

“这么说您持有一张一万比索的股票了……”

“看来奇怪，是吗？一万比索。您还记得昨天晚上我对您说过我可以把他送进大牢吧？”

这时，加尔维斯笑出声来了，笑声跟轻微的爆炸声似的，又仿佛是踏扁了一只蟑螂。

“是的。”

“明白了吗？”

“跟这有什么关系？”

“这是假的。他伪造了这张股票，这一张和不知其他多少张。至少，这两张是假的，他可签了字。你看——赫·佩特鲁斯。发行过两批，第一批和扩大资本额那一批；这一张还不是两批股票中的，而他签了字，卖了许多跟这张一样的股票。”

指着签名处的那根指头，颜色跟放得太久的干酪一样，那只手把放在桌子上的道林纸片收回去了。

“好吧！”拉尔森开心地说，觉得松了一口气，“您是明白的，您懂得这些事。他伪造股票，佩特鲁斯老头子。您可以把他关进监狱，准保要把他押几年。”

“就押几年吗？加尔维斯又笑了，拍着他放股票的那个口袋说，“他再也出不来了，他到死都还不清。”

“说来惭愧，”拉尔森看着一扇窗户说，“应当卖点儿东西买玻璃，堵一堵那些个窟窿眼儿。”

“不错，冬天可一点儿也不舒服。”加尔维斯脸上的笑容收拢了，干瘪了。他转脸看着雨濛濛的外边说，“我们每个月变卖两千比索的库房里的东西。孔茨和我，一半对一半。德国人不敢请您参加，我不希望您认为我们是因为自私才没有告诉您。”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加尔维斯继续看着玻璃窗上的三角形窟窿眼儿，满脸憔悴，一副苍老相，潮乎乎的脸上笑纹以外的地方抽搐了一下，继续说，“卖三千也是那么回事儿，够卖一两年的。”

他在思考如何过日子。

“谢谢，”拉尔森说，“好吧！真的，您可以让他蹲监狱，不过我们

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想都别想。”加尔维斯说，“要是他被逮起来了，我们就算完了，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会撵走。不是为了这个。老头子应当这样完蛋，您有所不知。”

“对，”拉尔森说，沉思起来，“我不知道。也许那样更好，也许更坏。您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谢谢，”加尔维斯脸上的笑纹又变得宽阔而细密了，“谢谢您的准许。”

拉尔森把左轮手枪别在怀里，小心翼翼，惊惊惶惶，悲悲戚戚，仿佛害怕割伤了身体一样。然后，把身体整个儿地埋进了沙发椅子。这时，冰冷的牛毛细雨从窗户的破洞里随风飘了进来，欢快地、纷纷扬扬地洒在乱七八糟地堆在桌子上的关于电镀报告的丝质纸页上。拉尔森疑疑惑惑地鼓着嘴巴，上下唇之间发出轻微的拍电报似的响声。他眯缝起眼睛，试验到底离多远才能看清纸上的字迹。“造船厂和修船厂找到了一个卓越的帮手，利用电镀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最好的防锈油漆也不能避免钢铁同任何外部媒介接触时发生的电解作用，只有镀锌才是钢铁防锈的唯一良策，因为它可以隔断金属的氧化过程。”

他半张着嘴巴，嘴唇上沾着冷冰冰的口水，觉得油乎乎的口水一直流到了下巴上，感到很不舒服。他并不担心生活把同他有关的东西卷走。实际上，他已经不关心这些事情了，因为他本能地不希望沾上那些事，从来不希望陷得那么深去运用计谋维持那些事情。“在我参与并教会这两个家伙如何能够多掏点出来而又不至于弄光

家当、不至于吃掉老本以前，至少每月都有靠得住的一千比索了，没有问题。不过，我看那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把这个物证揣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睡觉了，就跟一个小孩拿着一支上了膛的一触即发的手枪一样；他把假股票给我看时，我不由得浑身发冷，茫然不知所措，想不出一个主意来，真不知道我该选择站在哪一方。”

他慢慢地朝前面探出头去，麻木得差不多无知无觉，沉浸在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犯罪心理状态之中。他心如乱麻地在怀疑，继续当过去的拉尔森的想法，真不知道比如今正在做戏的拉尔森还要幼稚多少倍……离得更远还看得见那个报告上的字，他把肚子顶在写字台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们可以根据各种情况的需要，提供各种各样性能的材料，有高碳钢、不锈钢、青铜、磷、减摩擦巴比特金属。”

几颗雨珠打在脸颊上，他站起来侧耳听了听，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呜呜的风声。归置那份报告的纸页时，传来一阵叽叽咕咕的探戈歌声，一共只有三句歌词，唱了一遍又一遍，歌声愉快、兴高采烈而近乎狂热。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把帽子推得歪向一边儿，觉得忘记了点什么，他想笑，想抚摸一个来到跟前的真正的朋友，想犯一桩任何人也提不出诉因的暴行。

中午，拉尔森又一次觉得不可一世起来。他又开两腿，敞开大衣，独自站在空无一人的巨大的办公室里。他看了看加尔维斯和孔茨的办公桌——两张还没有变成柴火的台子，看了看那些敲得凸一块凹一块的卡片盒，又看了看那堆毫无用处的、不可思议的锈迹斑斑的机器。风把垫在地板上接从屋顶上漏下来的水珠的黄纸吹得

鼓了起来。不远的地方，一条涓涓细流从一条破破烂烂的过水道里漏出来，叮咚叮咚地流在一堆罐头盒上。他似乎兴奋起来，怎么也呆不住了。他扣紧了大衣，带着一丝报复的表情，想象五年或十年前办公室里发出的忙忙碌碌的声音。

细雨濛濛，拉尔森顺着铁梯子走了出去。几步就穿过了稀泥地，窝棚里的人谁也没看见他。他一溜小跑，仿佛周围的一切都是第一次看见：加尔维斯的窝棚，斜靠着舵，地上的杂草和水坑，锈迹斑斑的卡车架子，垃圾、锚链、铁锚和桅杆堆成的矮墙……一切的一切，都成了他早已预感到了而只有此时才在一见钟情的心醉神迷的状态中遇到的东西。他认出了只有穷人才能在雨雾迷濛的天空中区分得出那种灰色的准确色调，认出了云块之间的那条纤细的颜色跟脓水似的界线和云中透出的小里小气的玛瑙色阳光。这时，雨珠已经在他的帽檐里积成了小水洼。他孩子气地笑了，脚下仍然是一溜儿小跑，好像是想从河里和树上把最远的风声也收拢来。他昂首挺胸，夸张地摇摆着绕过那些被忘却了形态和名字的、被乱七八糟的铁丝缠裹着的铁家伙，一头钻进了阴影，钻进了黑糊糊的库房大棚，钻进了远处吹来的寒风之中。他看了看货架，抬头看了看从顶棚的窟窿里飘进来的雨线，又看了看尘埃和蜘蛛网结成的窝巢，再看了看那些继续假装高贵的锈得黑里泛红的机器。他轻手轻脚地一直走到库房的尽头，找到一只救生艇，屁股在艇边坐下。他看着顶棚的夹角，也看着从顶棚的窟窿里钻进来的欢蹦乱跳的风，看着已经开始滑稽而不妥协地沙沙作响的颜色陈旧雨滴，心不在焉地摸索着掏出香烟，点上一支。他可以列举出此时对他无关紧要的

事情：抽烟、吃饭、穿衣、他人的尊重、未来。那天中午，同加尔维斯谈话以后，他找到了某种东西，或者也许是把某种东西忘在总经理室里了，都是一回事儿。

他微笑着，想象老鼠在货架子里嚓嚓地啃咬活塞销、螺丝帽和扳钳的情景；他继续微笑着想象，这是冬天的一个上午，在佩特鲁斯家里，炉火熊熊，胖乎乎的女佣兼姘妇何塞菲娜围着桌子端菜斟酒，脸上始终带着迷人微笑的安赫莉卡·伊内丝照看着壁炉里的火，爱抚着一群数目不定的孩子，她动人地喃喃低语着，温顺的眼光看着幸福得容光焕发的拉尔森——他正看着已故的父亲兼岳父的巨大的椭圆形画像，看着老头子那坚毅而高深莫测的头部，看着他那环绕脸部的络腮胡子，那画像挂在离地面两米高的地方——他真是好样儿的，治家严谨，待人灵活。

拉尔森走到库房的后门跟前，看着急速而胆怯地飘洒着的雨点，估摸了一阵河面上升腾起来的大雾对航行可能带来的影响。雨快停了。他走过去又走过来，蹚着稀泥，乐滋滋地听着脚下发出的噗哧噗哧的声音，专心致志地思考着恐惧、怀疑、无知、贫困、堕落和死亡。他又点燃起一支烟，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不翼而飞，墙壁由木板拼成，里面有一张行军床，一只箱子。箱子上方一本书，一个搪瓷脸盆，脸盆上的搪瓷已经斑斑驳驳的了。原来，这是孔茨的住处。

“对了！我也从来没想到过问问这个德国人住在什么地方。”他走进屋子，在行军床上坐了下来，佝偻着身子，头抬得高高的，脸朝着门口，香烟贴近肚子放着，神情异常谦卑而友好，即使孔茨突然走

了进来,也无法生气。“这是一场厄运,”他想,“不是一时的晦气,而是厄运,冷酷而阴森的厄运。厄运不是来到并留下来的东西,而是另一种玩意儿,跟发生的桩桩事件毫无关系,虽然它利用各种事件加以表现。有时候,倒霉就是倒霉。这次就是倒霉了,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躲来躲去,不愿意知道是倒霉的时候到了。我用总经理的美梦,用三千万比索,用凉亭里那张不出声地发笑的嘴巴把这一厄运养肥了。现在,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让我倒霉倒得更透。唯一可以做的恰恰是这样:不管任何事情,都得一件接一件地做下去,毫无兴趣,毫无意义,就像另一个人(或者说另一些人,每件事情一个主子)付钱雇某人做这些事情一样,某人只是尽可能做得更好而已,对他所做的事情的结局漠不关心。做完一件再做另一件,这一件、另一件,都是他人之事,做好做坏都没关系,到底有什么意义也没关系。历来如此,最好是敲木驱邪,或者假装祝福;倒霉得知它已无所作为时就会开始干枯、脱落并掉下去。”

拉尔森走出库房。黑黝黝的香蕉树上飘下最后一阵雨滴。他走到加尔维斯的小窝棚跟前,敲了敲门。加尔维斯的女人给他开了门,小房子里突然一阵沉寂,只听见一阵遥远的、懒洋洋的、如怨如诉的狗叫声和收音机里的狐步舞舞曲声。他高声傲气地说了声“打扰了”,看也没看那个女人一眼就跟她一起进去了。在暖融融的窝棚里,他走到向他表示欢迎的两个男人跟前,拖过一条凳子坐了下去。他把帽子放到干燥的地板上后,对加尔维斯那过分的笑容,只报以一个短暂、轻巧和抚慰的微笑。

“吃过饭了吗?”加尔维斯的女人问道,“不可能已经吃了:想吃

点儿吗？什么也没有了，不过我可以去给您做点什么东西。”

“谢谢，如果你们吃的是杂烩，”拉尔森看过盘子说，“也许，可以给我来一碗肉汤或者清汤。”

“我可以给您烤一块牛排。”那女人说。

“那儿挂着肉哩！”孔茨说。

“不用了，谢谢。”拉尔森坚持道，“谢谢，太太。真的，您能给我弄碗热乎乎的肉汤的话，将非常感谢，那您就帮了我个大忙了。”

拉尔森想，自己表现得过分谦卑了，加尔维斯正嘲讽地留神看着他。那个女人从桌子上拿走了点儿什么，又把帽子从地上拾了起来。拉尔森感觉到那女人离他的肩膀不远，背朝着他，大概在看着剥剥作响的火苗沉思，决心不再开口说话。

“我们没有葡萄酒了，天黑前搞不到。”孔茨说，“您想来点儿甘蔗酒吗？还有好几瓶哩！太难喝了，永远也喝不完。”

“喝过清汤，或者喝过肉汤以后再喝吧！”拉尔森回答。

女人仍没有说话。

一股风刹那间围着窝棚转了两圈儿，炉子里的火苗摇曳着倒了下去。孔茨交叉双手抱着肩膀。

“您到哪儿去啦？”孔茨问，“我们觉得您去看佩特鲁斯去了。”

“去看佩特鲁斯先生，看堂赫雷米亚斯去了！”加尔维斯接着说。

拉尔森笑着抬起头来，但加尔维斯正在一只盘子里掐灭烟头。这时，风正在房顶上狂怒地搅起一个个漩涡。谁也不说话了，遥远、沉重和乌云翻滚的感觉使他们感到压抑。女人把一盘子汤放在桌子上，从拉尔森的腿下面把两只狗撵走了。

“对不起。”拉尔森说道，开始用汤匙喝汤。他的对面，是两个戒备着的男人；背后，是两只呻吟着的狗和一个带着敌意的女人。他停住不喝了，看着木板墙的墙角、闹钟和一个带着两只绿色长耳朵的缸子说：“我谢谢你们了。我想，一盘不管什么热东西都会使我觉得舒服的，因此就想到这里来敲门了。”

“我们刚才在说，您到佩特鲁斯的别墅里去过了。”孔茨飞快地说，“那个老头子，至少您没找到他。我想，他在下周之前是不会来的。”

“这个嘛，跟我們不相干。”加尔维斯笑了，“我是绝不会说谎的。我说过，您到别墅里去看谁都跟我們不相干。”

“加尔维斯！”女人在拉尔森背后警告道。

“真的，我们想过，对不起，”孔茨说，“您可能今天中午去找过老头子，让他提防点儿。”

“冒雨去的，”加尔维斯补充说，“一直走到别墅，去对老头子说我有一张他伪造的股票，结果被雨浇了个透湿。”

“加尔维斯！”女人又在拉尔森的身后迫不及待地警告说。

“这个嘛，”他继续说，“您到别墅去通知佩特鲁斯老头子或者他的女儿。我说过，我们大家都认为是可能的。”他从自己的大腿中间拿出一只大肚甘蔗酒瓶，酒瓶没碰着杯子，酒哗哗地淌着，倒满了三杯。他没有露出牙齿笑，嘴唇抿在一起，光溜溜的，没有笑容，仿佛刚刚刮过，但红扑扑的嘴唇上仍保持着那永恒的快意。

“您冒雨前去通知，而通知顶个屁用！因为佩特鲁斯老头子比我们清楚，比我们早得多就知道了。我们大家都那么说过了，先

是一个那么说,然后是另一个那么说,重复着同样的话。而我还加上这么一句,如果出现了这个情况,如果您果真到别墅去了,淋着雨去履行您的义务并发出警报,那也许还帮了我一个忙哩! 我也许好久以来一直希望有谁帮我这个忙哪! 无论如何,我每个月的二十五号都给您存入六千比索嘛!”

拉尔森把喝光了的汤盘轻轻推开,点燃一支香烟,又俯身去喝加尔维斯斟满的酒。

“您还要点儿什么吗?”那个女人问。

“谢谢,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太太。我是来要点儿热东西的,要点儿施舍。”

“我觉得您大概想出了使船厂增加盈利的另一个新办法。”孔茨说,差不多盖住了加尔维斯那款款的笑声,“比装配或修理船只还赚钱。”

“当海盗或拐卖妇女,比方说吧。”加尔维斯提议说。

孔茨举起自己的杯子,眯缝着眼睛把头往后一仰。

女人伸出肮脏的、带着伤痕的手撤走了拉尔森的盘子。两只狗不出声息,大概已经在床下睡着了。风在远处嘶叫着,忽东忽西,所有的人都听得见风在刮过去又刮过来,似乎被迫要打定主意到底往哪儿刮。

“现在的问题,是需要了解我们在罗萨里奥港是否有个代理人。”加尔维斯说,“如果有一队领航员把船带到造船厂之港来,我们的业务量可以增加一倍。那我们就可以买上礼帽,可以认真地讨论斜桅、船头、前桅、尾帆和后桅了,我们就可以在董事会会议厅里的

雪松木桌子上玩海战游戏了。”

拉尔森躺在已经开始分崩离析的柳条椅子上喝酒，露出两排暴突的大牙齿，心不在焉地瞧着被烟熏黑了的屋顶。

“开始下雨时，我们就想，”孔茨说，“今儿下午不去上班了。实际上，没什么要紧事儿。加尔维斯的账本上的账目是最近的，我是否应当把各种费用的预算拖一拖。我想您是会宽限的。我们就在这里喝酒吧，听听雨声，聊聊摩尔根^①和德雷克^②。”

“您看怎么样？”加尔维斯问。

拉尔森喝完了杯子里的甘蔗酒，伸手拿瓶子再倒一杯。他觉得脸上正在漾起一丝浅浅的笑容，他的声音可能变得恍恍惚惚了。那个女人走到他的旁边，走到桌子和加尔维斯那一侧站住了，把脸贴近潮湿的玻璃窗。她那宽阔、适中的身体微微前倾着，看着就要停了的雨。

“现在我痛快一点儿了。”拉尔森不动声色地看着那个女人的屁股、拳曲的长得老长而没有梳理过的头发，说：“现在觉得痛快一点儿了。不是因为喝了汤——多谢给我做的汤了，也不是因为喝了甘蔗酒。也许是你们让我进屋，起了一点作用。我现在痛快了，因为不大一会儿之前我觉得倒霉，倒霉好像是我包了似的，好像霉头单

① 摩尔根(1635? —1688)，英国著名海盗，1671年抢掠巴拿马城，曾担任过牙买加助理总督。

② 德雷克(1540? —1596)，英国大名鼎鼎的海盗，1570至1572年间，对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发动过数次袭击，是第一个越过麦哲伦海峡的英国人，曾参与摧毁斐迪南二世的“无敌舰队”的行动。

单触上了我，它好像钻进了我的五脏六腑，而且不知道何时是个头。现在我看见霉头在外边了，让别人沾上了。于是，一切都变得轻松了。一是生灾害病，二是惹上瘟疫。”他一口喝掉半杯酒，冲着加尔维斯朝他装出的笑脸微微一笑。加尔维斯笑得疑神疑鬼，若有所待。那个女人仍然把背冲着拉尔森，低着头，带着一股莫名的火气。

“喝喝甘蔗酒，”孔茨说，“听听下雨，躺下睡午觉，还能干什么呢？”

“是的，”拉尔森说，“现在好多了。不过始终是有事情干的，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干。可能，我今儿下午真的要到别墅去找老头子谈谈那张假股票的事儿，可能的。”

“您那么做没关系，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加尔维斯反唇相讥道。他的女人离开油迹斑斑的玻璃窗，不再看那阴沉沉的天色了。她伸出一只胳膊搂着加尔维斯，搂着那把散了架的椅子，同时把白皙的、似乎笑容可掬的脸凑到桌子跟前。

“告诉老头子或者他的女儿。”她嘟囔着说。

“告诉老头子或者他的女儿。”拉尔森说。

造船厂之四

窝棚之四

有过那么一次,的的确确有过那么一次,虽然今天谁也不能确切地知道应该是在故事中的哪个时刻了,加尔维斯有一星期拒绝到造船厂去。

加尔维斯旷工的头一天,大概是那年冬天里让拉尔森最要命的日子了,打那以后,他所受的煎熬和产生的疑虑都要容易对付得多了。

那天上午,拉尔森将近十点钟时到了造船厂。他向侧身朝着他的孔茨打了个招呼,心神不定地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孔茨正趴在桌子上翻阅一本集邮簿。拉尔森把卷宗换了一堆,打算一直看到十一点。突然下起了牛毛细雨,细丝从窗户的破玻璃边上向四面八方飞溅。“我只应当关心我自己,无其他事情可言。我,被这鬼天气,被这倒霉的命运,被这些污垢困扰着,忧愁凄惨,透心冰凉地趴在写字台上。不过,我但愿这场雨浇到其他人头上,阴一阵阳一阵地敲打他们的房顶。”他轻手轻脚地站起来,走到门口去窥探大房间里的

动静，加尔维斯没来，孔茨嘴里喝着马黛茶，眼睛盯着一扇大窗户。拉尔森心想：要是加尔维斯永远不来了，危险性就大了，那他拉尔森美梦的末日就要来临了。同前任总经理们一样，他从陌生人的手中接过了火炬，信誓旦旦地保证一直举到无从预料的结局到来那一天。假如加尔维斯决定退出这场把戏，那么孔茨也可能效仿。他们两个，加上那个大肚子的女人和那两只狗，可能不顾及周围这个世界，不顾及别人生活的这个世界。但是，他早已不在乎了。

拉尔森一直等到将近中午时分，但孔茨并没有走到总经理室的门前来。毛毛雨已经停了，一块脏里巴叽的云压到了窗户上，沉甸甸的，几乎要钻进窗户的时候又不屑一顾地退了回去。他离开卷宗，走到窗户跟前，先把一只手伸进窗外的迷雾，然后把另一只也伸进去了。“不可能。”他自言自语地重复了几遍。将要发生的事情，他情愿它发生在老早的时候，发生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他情愿怀着另一种信心去干。“不过从来不让人有所选择，只有事后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他抚摸了一下藏在胳肢窝下面的左轮手枪的扳机，同时倾听着静得可怕的四周的动静，只听见孔茨推开椅子，打了个呵欠。

拉尔森觉得经常发作的嘴巴和两颊的抽搐又开始了，他回到写字台跟前，把左轮手枪藏进拉开一半的抽屉里。“如果他嘲笑我，我就臭骂他；如果他揍我，我就宰了他。”他按了按电铃。

“来了！”孔茨叫了一声，边扣衣服边走进来。“您准备走了吗？我看这些卷宗看入神了，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了。您了解一点儿关于‘汤皮克号’这场官司的情况吗？”

“‘汤皮克号’吗？我一无所知，应该是八辈子前的事儿了。”孔茨回答着，又打了一个哈欠。

“‘汤皮克号’。”拉尔森重说了一遍，直到这时他才抬起眼皮瞧了瞧孔茨。他看见的是一张圆乎乎的脸。脸上胡子长得老长，头上的毛发又硬、又多、又黑。手也是毛茸茸的，扣完了扣子又去打领结。“当然，那不是发生在你任职期间的事情了。不过，作为老案例，是很有意思的。‘汤皮克号’进厂很仓促，没有卸货就进来了，因为主轴出了毛病。看来它装着某种易燃品，在船厂里燃烧起来了。就在这里，靠北边一点点。清单上注明，船根本没有投保，或者货物没有全部投保。”他随便翻开了一个卷宗，并假装看了起来。房顶上响起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雨下得更大了。“那么，谁付钱呢？该谁负责呢？”

拉尔森脸上漾起温厚而慈爱的笑容，仿佛在看一个小孩。

“我从来没听说过一点点关于这事的状况。”孔茨回答说，“另外，我不明白，谁知道那得多少钱哪！在河里燃烧，该是多么壮观啊！我不知道，不过造船厂不该负责。”

“您肯定吗？”

“我认为是无可争议的。”

“了解情况总是有用的。”拉尔森往后一仰，用长着亮晶晶的指甲的手指头蹭了一下抽屉边儿，盯着孔茨那两只黑色的小眼珠问道：“今儿上午加尔维斯没来吗？”

“没有，我没见着他。昨儿晚上我们到查马梅酒店去了。但他最后告别时还没有觉得不舒服。”

“他捎来病假条了吗？”

“是问他请过假没有吗？正在下雨哪！现在我就到他家里去兜一圈儿。”孔茨突然饶有兴味儿地看着拉尔森说：“要是他没来，就可能是病了。糟糕的是今儿下午我们还要等俄国人开卡车来。加尔维斯答应帮助我讨价还价的。”他举手做了个告别的动作，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来充满快意地慢慢瞅了瞅拉尔森的脸。

“出什么事了吗？”他压低嗓门问道。

“没有。”拉尔森回答。孔茨走后，他松了口气。

拉尔森没到加尔维斯的窝棚里去吃午饭。他在贝尔格拉诺之家吃了块牛肉，一声不吭，没理会老板从柜台那儿传过来的任何问题。五点钟时，他一溜一滑地趟着小水坑去看加尔维斯，此时他觉着颇有耐心，宽宏大度而心地善良。

那个女人裹着大衣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一条狗趴在她的膝盖上，另一条趴在地上，用嘴蹭着她的一只大鞋。她那被雨水弄得潮乎乎的脸，在大雾中显得心平气和。拉尔森后悔不该造访，开始感到迷惘、沉闷、唐突。他用手指碰了碰帽檐表示问候，重复了一遍他对这女人的年龄的各种猜算。一块乌云正罩在他们头上，他们觉得无话可说，满腹狐疑，想不出任何笑话来缓和气氛。

“您可以做我的女儿了。”拉尔森认可道，摘下了帽子。

这时，沉默变得更可怕了，仿佛摆脱了原来正要咬破它的边缘的那阵嘀嘀咕咕声。躺在地上的那只狗颤抖着伸长了身子，摇了摇尾巴。女人把那只趴在她膝盖上的狗推开。围在脖子上的红头巾下面，一只巨大的钩式别针别着大衣的翻领。她脸上的温柔是变幻

不定的，厚厚的苍白的嘴巴无力地向前撅着，半睁半闭的两只眼睛并没有装着在看什么。拉尔森观察了一下她脚上那双用电线系着的巨大的男鞋，鞋上沾满了泥土和树叶。

“太太！”他叫了一声。她脸上的笑容堆得更厚了，但两只眼睛仍然视而不见。此时，浓雾变成了雨点儿，洒在他们身上。“太太，事情很快就会有转机的。”

“去你的吧，”她回答说，笑得张开了嘴巴。“进去吧，开导开导他或给他讲段精彩的故事。他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躺在床上，看着墙壁，连假装睡着的样子都装不出来。也没有生病。我对他说，如果您派公司的医生来，检查出他没有病就有好瞧的了，那你们就会决定辞掉他。我对他说过了，那么我们就只有到一间木板窝棚、到一根船舵、到一个狗窝里去住了。进去吧，试试您的运气。也许他已经伸腿了，也许跟您他倒想说话。再说，还有一瓶酒呢！”

寒冷和潮湿使拉尔森觉得很不舒服。他无法找出一句话来向那女人表白他是多么喜欢她，他们仿佛是失散多年、音信杳无的兄妹，牵肠挂肚，魂牵梦绕。他戴上帽子，微微哈着腰朝那女人走去，好像是在执行一道命令，希望得到宽恕。

女人闪到一旁去了。拉尔森小心地踏上那道用车主的铁皮做的三级台阶，台阶用一条铁链子无济于事地固定在窝棚的一侧。他走进灰蒙蒙的窝棚，毫不费劲地朝放床的那一角走去。

加尔维斯脸朝木板墙躺着。听得见他在呼哧呼哧地喘气，他的两只眼睛准是大睁着的。

“怎么样了？”拉尔森过了一会儿才变声变调地说。

“干嘛您不见鬼去呢？”加尔维斯柔声柔气地建议。

拉尔森控制住了涌上来的愤怒，他认为应当感到愤怒。他用一只脚勾过一张凳子，弯腰坐下去时发现桌上放着一瓶酒。那瓶酒差不多还是满满的，商标上画着葡萄、麦穗和羽毛。他往一个铁皮罐子里倒了点，看着打补丁的干干净净的被单底下那个窄窄的脊背，坐到床边。

“您可以再撵我一次，我不走，因为需要同您谈谈。这瓶白兰地差劲透了，我可以请您的客。”

拉尔森又喝了一口，朝四周看了看。他想，窝棚也是把戏的一部分，他们修起了窝棚，把它变成住家，只是为了掩藏那些不能在造船厂里进行的勾当。

“我们快熬到头了！我有权告诉您，再过几天我们就能重新开工。我们不仅将获得法律方面的许可，而且还将获得必要的资金，千百万比索。也许有必要改改公司的名字，在佩特鲁斯的名字后面加上某个人的名字，或者用不是姓名的随便一个什么名字来代替现在的名字。我没必要对您谈欠付的薪水了，新的董事会将承认欠付的薪水并予以支付。不管是佩特鲁斯还是我，都没有同意其他的解决办法。这样，您就可以开始结账了。补发的薪水可以添置些东西，应该理所当然地过上体面的生活。但真正可观的还是未来的薪水。还有，公司将为职工修建住宅。当然不是非住在里头不可，但不用说住进去是很合适的。很快我就把图纸拿给您看。关于这一切，我已经得到了佩特鲁斯的保证。”

他并没有得到过什么保证，当然没有。他所有的只不过是那种

无聊的怪癖，那种他忍受着并扮演着的自欺欺人的把戏以及延长这种把戏的必要。在又脏又冷的窝棚里，面对无动于衷的行政经理，拉尔森一口一口地喝着酒，没让自己喝醉；只觉得灯光刺眼。除了这场他生搬硬套地当作职位接受下来的假戏之外，他面临的只有冬天、衰老、无路可走的现实，以及呜呼哀哉的可能性。假如此时加尔维斯能从床上爬起来，露出他的牙齿笑笑并抓起瓶子来喝酒，他情愿付出任何代价。

他不甘心失败，开始谈他自己，重述他在佩特鲁斯的别墅那个凉亭里背诵过的独白。他信口开河，说他会见了瓦列斯警长，说桌上放着左轮手枪，地上是叫人恶心的浓痰。加尔维斯伸了伸腿，打着哈欠翻了个身。

“干嘛您不见鬼去呢？”加尔维斯又下了一遍逐客令，“明天我就去上班。”

他们同时笑了。没有过分相互挖苦，都选择了庄重的口吻。后来，又都不吭声了，一动不动地呆了很长时间，想着各自的心事。两只狗发了疯似的叫了一阵，现在已经听不见它们的叫声了。拉尔森这个下午没有白过，此时他留下来是为了客气和装模作样。他拿过瓶子，把它放在桌子上，没有告别就走了，因为拿不准该说什么话。

夜，出奇的黑。拉尔森摸索着走下那三级台阶，一摇一摆地穿过那片空荡荡的荒地。女人和狗都不在那里。快乐的风吹散了天空的乌云，半夜的时候准能看得见星星。

圣玛利亚之二

最后一班船下午四点二十分经过造船厂之港到南边去，第二天早上将近五点钟时才能到达圣玛利亚。

跟上午的第一班船一样，船走得慢吞吞的。因为下雨，支起了船篷。路经每个码头时都要移船靠岸，卸鸡蛋、瓶子、信件和转达问候。每当靠拢岸边前，总有封把字迹模糊的信件从船上掉下去，在波浪滚滚的水面上忽沉忽浮地漂着。但是，到五点钟时，尽管天气不好，圣玛利亚城也会有灯光的，码头上也会有好奇的游人。拉尔森不希望——尤其是在他知道此行毫无目的，只是没有意义的停歇、空耗神思的行为时，不希望在港口的石头路面和小巷子的陡坡上行走时得用双眼寻找惊奇、嘲讽或仅仅是表示认识他的目光；不希望咬紧嘴唇、准备好随时发出事先排好次序的谩骂；不希望佯装把手藏在大衣下面，指头摸着左轮手枪的扳机，并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得装出怒气冲冲的样子继续摸着。

拉尔森想：“再说，也许连迪亚斯·格雷依也找不到哩！说不定他已经累死了。要不然就在科洛尼亚，提着一盏灯，等着某个决定

打胎的乡下女人或者外国野女人。他纯粹是个低能儿。我之所以恰好在今天这个倒霉的日子里去找他,那是因为他比任何人办事都性急,而我认为性急就是低能的表现。”

他在满是泥泞的街上走着,风声呼呼。他挺胸凸肚,用两根指头按着帽子,从造船厂之港一直走到贝尔格拉诺之家的客栈。他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对着镜子端详了一下自己,决定刮刮脸,换件衬衣。“那张窄小、安宁的脸孔老在眼前,想想该说什么话吧!真想去可怜可怜他,拍拍他的肩膀,叫他一声‘迪亚斯·格雷依兄弟’。”

然后,他下楼去同老板一起喝苦艾酒,倚着柜台看酒吧间里的人群。酒吧里烟雾弥漫,空气污浊。他看见了一个上了岁数的男人和两个小伙子,都穿着皮上衣,披风扣得紧紧的。他们靠近一个窗户坐着喝白葡萄酒。一个小伙子每隔一会儿就咧开嘴唇、露出两排牙齿,他用手肘擦拭窗户玻璃,擦一下就朝伙伴们和灰蒙蒙的凉风习习的黄昏笑一笑。

“在这种天气里他们能打到什么玩意儿吗?”力拉尔森悲天悯人地说。“这可没准儿,”老板说,“这要看潮流了。水一变浑,他们捞鱼都捞得不耐烦呢!?”

那只面上潦潦草草地涂着一条开胃酒广告的高高的挂钟,时针指着四点半。拉尔森拍了一下脑门,伸出手指按在柜台上。“哎哟!”老板拿着一块餐巾纸直起腰来说,“您忘记什么了吗?”

拉尔森使劲摇摇头,然后神气地笑了。

“不打紧。今儿晚上我在圣玛利亚有个十分重要的约会。最后一班船已经开走了。真的,有点儿特别重要的事儿。”

“啊！”老板说，“我知道，何塞菲娜午间来过了，她悄悄对我说，堂赫雷米阿斯今儿晚上要回圣玛利亚，半夜里到。”

“是这么回事儿，”拉尔森承认说，“可是现在已经没办法了。我们再来一小杯吗？”

“最后一班船是十六点二十分开走的。还有人在抱怨，可是以前是一礼拜一班，后来增加到两班。增加到两班船的时候，就在这儿，我们还搞了个庆祝活动哩！”老板慢腾腾地把两只杯子倒满，心里说不出的高兴。“谁知道呢。对不起。”他端起自己的杯子呷了一口，走过去跟那伙渔民坐在一起了。

拉尔森孤零零地呆在柜台跟前，扭头去看风暴和河水，看臭味儿可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眼前出现了黑洞洞的深渊，出现了溜进贝尔格拉诺之家的酒吧里来的那些死去了的回忆。他想起了生活、女人、透过冰凉的香蕉叶呼啸着吹向造船厂后面那个巨大的狗窝的风。“此时，比方说吧，一切都要开始完蛋了。凉亭里傻笑的疯子和穿着一件用别针系着的男式大衣的家伙，她们是同一个女人，一回事儿。从来就没有过许许多多的女人，而是只有一个女人在重复出现，总是以同一种方式重复出现。她们出现的方式就那么几个花样，没让我抓住过。一切，从街道舞厅里的第一场舞到现在的一切，都是顺顺当当的，跟走下坡路一样，我花费的只不过是时间和耐心而已。”

老板的大拇指上挂着喝空了的杯子，笑吟吟地回到柜台跟前来了。

“我再给您倒一杯吧？”

“不，谢谢。”拉尔森说，“我喝得差不多了。”

“您请便吧！”老板徒劳地用脏餐巾在干燥的柜台面上抹了一下。“办法还是有一点的。要是今晚您非见佩特鲁斯先生不可的话，我倒是相信的……那样走不舒服，但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伙朋友是从米格斯来的，米格斯还在恩杜罗下面，是人海口。”

“我知道。”拉尔森不痛不痒地说道，脸没转过来，香烟叼在嘴角上。

“要是您有兴趣的话……我已经同他们谈过了，他们很乐意把您捎到圣玛利亚去。他们要去跳会儿舞，不过船上没有雨篷。您看合适不？不收钱。”

拉尔森身子没动，笑了。三个汉子看着他，怯生生地点着头，拉尔森理也不理。

“是帆船吗？”

“有发动机。”老板说，“就是拉乌拉号，您一定见过它。当然，如果不需要的话，他们也不会白白浪费燃料。”

“谢谢。”拉尔森嘟哝道，“我们几点出发呢？”

“马上，他们这就要走了。”

“太好了。借给我五十比索吧，要是您拿得出，也愿意的话。礼拜一就还，礼拜一我们结账吧！”

老板打开抽屉，拿出一张绿色的票子轻轻在柜台上敲了一下。拉尔森点点头，把票子卷在两根指头上。他不慌不忙地朝渔民们走去，两手揣在大衣口袋里，掩饰着用鞋跟蹭着地面走路习惯，脸上的傲气收敛起来了，快要燃完了的香烟仍然叼在看上去善良而友好

的嘴上。渔民们站了起来，笑着，点着头。拉尔森去圣玛利亚的旅程就这样开始了。

哈根——广场拐角加油站的加油工，觉得自己认出了拉尔森，就在同一天晚上，下毛毛雨的那天晚上。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自从拉尔森在造船厂之港落脚以来，除了前一次和这一次之外，他还到圣玛利亚去过。对这一次的圣玛利亚之行，更是众说纷纭，猜测各异。

“从走路的姿势看，我觉得是他。几乎没有光线，雨也影响视力。要不是赶巧了，我也不会看见他或者觉得看见了他。都快十点了，我给那辆阿尔帕加塔斯公司的卡车加油，本来它是下午就该经过这里的。他们一直按喇叭，我从‘新意大利’酒吧出来，和司机对骂着。我对司机说，‘停一会儿吧！’拿着油管举在半空，朝拐角的地方望了一眼，觉得看见拉尔森走来了，我已经说过那时又开始掉雨点了，那盏路灯又一点儿都不亮。他浑身透湿地走来了，如果是他的话，我觉得他更老了，比过去更靠摆动胳膊来帮助走道儿，黑色的帽子朝前面耷拉着；那样一来，根本不可能瞧见他的脸了，因为大雨正好迎着他的面打下来。我猜是他，据说他住在首都。我可以肯定他不是乘下午的班船来的，假如他是乘五点七分的火车来的话，我不可能不知道。距离还不到五十米，当时灯光昏暗，又下着雨。拐角处正在拆除一边的街角，要搞一个轮胎橱窗——好像这种轮胎店还不够多似的，我看见他从拐角处走来，直到医生的轿车挡住了我的视线，也很难说他是不是躲进某个门厅避雨去了。我不会搞错

的,因为路灯的灯光反射在那块青铜牌上,虽然自从医生获得文凭以来,那块铜牌看来从来不曾擦洗过,他是从那个街口拐过来的,因此他不会是从码头,也不会是从车站来的。只有五十来米,还没有这么远。当然我是在灯光昏暗和下着雨的情况下看见他的,我已经说过了。不过,让我担保的话,我觉得是他,尤其是从那小心翼翼的细碎步——现在跳跃得不那么厉害了,从那挥动手臂的说不出来的味道和那从袖口里露出来的四分之一拳头,认得出来是他。后来我想,仅仅是随便想想,差不多肯定我看见的是他了,因为任何人在淋着雨和感到冷的情况下,都会把手缩到袖子里面走路。他,就偏不。没错,是他。”

哈根将信将疑地看见拉尔森的时候,通常正是迪亚斯·格雷依医生开始考虑如何入睡的时候,吃几片什么药,呼吸调到什么节奏,利用什么样的方法加以遐想。他刚刚吃完晚饭,晚饭吃了老半天,一边吃一边趴在那块孤零零的台布上心不在焉地看病历档案。女佣正在收拾盘子,归置档案卷,把那叠纸牌推到他面前。也许不是他,而是准时的回忆在思考,这个回忆在他身体里面,但是几年来就一直是独立存在的了。他常常无缘无故地赌一小会儿气——这使他返老还童,决心什么也不干,一动不动,魂不守舍地等待黎明,等待天亮,等待又一个夜晚。

要是没有任何病人派人来叫他,让他坐在一辆跑得跟老牛车一样慢的转卖了两三次的再也没人买了的汽车里摇晃,那个时辰正是他把圣经唱片放进留声机,开始自个儿玩纸牌的时候。对那些音

乐,他已经倒背如流,只需用不超过四分之一的听力去听,一边微微兴奋地考虑着该下王牌还是 A 牌,该吃安神药还是镇静药。

一成不变的晚间节目的每一个唱片、每一个唱片中雄心勃勃的渐强音和最后的尾音,都有明确的含义,比语言和思想能灌输给他的一切都表达得更精确。

不过,他迪亚斯·格雷依,圣玛利亚的外科医生,年近五十的老光棍儿,穷困潦倒,脑袋差不多成了不毛之地,早已习惯于对幸福感到厌烦和羞耻了。他不能把比四分之一更多的听力用于欣赏音乐——确切地说,是欣赏这种他一半为了故弄玄虚、一半为了每天晚上都能在神明保佑之下知道 he 已面临真相大白和无可避免的灭顶之灾的边缘的险恶用心而选择的音乐。有时候,他故意流里流气地在牙缝里嘘着他耳朵里听见的音乐,换一列纸牌,得意面坚决地出一张七点或十点。

那天晚上,就是哈根所说的那天晚上或任何其他一个晚上,十点钟时,迪亚斯·格雷依听见街上有人按门铃。他把纸牌在病历档案上一合,似乎想搅乱踪迹,并随手关上了留声机。“这么晚了,要是不打电话,就是出了紧急情况、绝望了,需要抓住医生,马上看着他和对他讲述,出于这种减轻病痛的迷信想法。也许是弗雷塔丝,她已经活不过一周了;那么,就给她服洋地黄毒苷,因为药方上写着这味药,然后同她的儿子们说说亚麻和牲口的事,同她的小儿子谈一匹纯种赛马的事。要是她天亮的时候死去,我就给她的儿子们看我劳累不堪、通宵不眠和耐心救治的样子,直到太阳出来。”他穿过餐厅走到诊室,经过前厅的时候,对那个拖着鞋从阁楼的楼梯上下

来的女佣吼道：“算了，我去接待。”

两米之下，在那个从不上锁的门厅里，拉尔森取下帽子抖掉雨水，微笑着同医生打招呼，一边说着表示歉意的话。

“上来吧！”迪亚斯·格雷依说。他走进诊室，让门敞着。他靠在写字台上等了一会儿，听见上楼的人脚下的湿鞋噗哧噗哧地响着，他竭力唤起对那个粗里粗气的嗓门和那个歪歪扭扭的笑容的回忆。

“您好！”拉尔森在门口取下刚才重新戴上的帽子说，“我要把您的地板弄得不像样子了。”他向前走了几步又笑了。这时笑得不同了，已经既无谦恭又无礼貌之意了；脑袋歪向一个肩膀，几道稀疏的深深的皱纹下面，露出一对圈溜溜的狡诈的小眼睛。“记得我吗？”

迪亚斯·格雷依一切都想起来了。他靠着写字台。呆若木鸡，轻轻地咬着嘴唇。他觉得浑身因回忆而逐渐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对来人的莫名其妙的同情。来人身上的雨水静静地向油毡地毯上流淌着。他握住来人的一只手，另一只手按在他那又湿又冷的肩膀上。

“干嘛不把大衣脱掉坐下呢？我有个电暖气，要我给您拿来吗！”他觉得自己俨然是个保护人，比拉尔森更强大、慷慨无私、不怕亮家底。

拉尔森说不用。他用一只绵软的手脱掉大衣，走过去把大衣和帽子放在给病人检查身体的床上。

“不过他从来没到这里来过啊！从来没带过任何妇女来，让我毫无必要地用阴道窥测器把那玩意儿扒拉开。也可能他某天下午

来过，在使用抗生素这个时代以前来过，带着一种存心不良的得意之情，求我帮个朋友之间的忙，用探针给她检查检查。可是，他好像对诊室了如指掌，好像这次访问是重复过去的多次访问一样。”

“大夫，”拉尔森沉声说道，脸上装出庄严的神气，两眼寻找着医生的眼睛。

迪亚斯·格雷依给他搬来一把镀铬椅子，自己走到写字台后面坐下了。他心里想：“屏风离他的左肩膀还远，在那张小床上他把大衣像死尸似的摊开了，帽子压在一张似乎看不见的平面脸上，藏书室里有几个书架，雨又刷刷地打在窗户上了。”

“好长时间没见到您了。”他说。

“有年头了。”拉尔森表示赞同，“抽烟吗？对，您几乎从来不抽烟的。”他点燃了香烟，差点儿就要暴跳起来。因为有点儿什么正在失去，因为他觉得孤独，坐在诊室中央的皮垫铁椅子上觉得不舒服。“首先，请谅解，我想就那时给您造成的一切麻烦表示歉意。您干得很漂亮，而且没承担义务，不留尾巴。我再次向您表示感谢。”

“别介意。”迪亚斯·格雷依缓缓说道，决心对那个晚上和那次会面探询个究竟。“我只做了当时我认为该做的事情，也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您知道伯格内尔神父死了吗？”

“我早就看到过这条消息了，把他提升了，不是吗？我记得在省会给了他另一个职位。”

“没有，他从来没离开过这里，他不愿走。他生病的时候是我看的。”

“说来您也不相信，但是事情发生以后，我确信神父是个大好

人。他站在他那边，我站在我这边。”

“等一等，”医生站起来说，“淋雨以后，喝一杯对您有好处。”

他走到厨房，取回来一瓶甘蔗酒和两只杯子。倒酒的时候，倾听着细细的雨丝打在窗户上的声音，倾听着屋外静悄悄的田野里的动静。他觉得一阵寒意袭来。他想笑，仿佛儿时有人在给他讲故事。

“走私来的。”拉尔森举起瓶子说。

“是的，可能是走私来的，船上捎来的。”医生重新坐到写字台后面，又满怀信心，觉得能够靠无动于衷来保护自己，觉得拉尔森跟来看病的病人没有什么不一样。“等等。”他又说。拉尔森正在喝酒。他走到放器械的玻璃柜那个角落，拔掉电话插头，回到写字台后面坐下了。

“好酒，是白酒。”拉尔森说。

“您自个儿倒吧，您想起了这个，想起了神父。我想过，也仍然相信，他和您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这种相似说来话长。再说这一切都是陈年旧账了。您来看我，一定是无事不登门的。我不知道您在圣玛利亚。”

“不，大夫。”拉尔森一边给两只杯子倒满酒，一边说，“幸好，身体还不坏。我没住在圣玛利亚。相信我吧，要不是想看看您，我决不会再踏上圣玛利亚的地皮。我这就讲给您听。”他把眼皮一抬，微笑的时候一本正经地模仿了一下过去用嘴巴扮鬼脸的动作。“我住在造船厂之港，在佩特鲁斯的工厂里，他让我干总经理，我就留在那里了。”

“啊。”迪亚斯·格雷依小心翼翼地应道。他担心对方打住话头，心里直感谢那天晚上给他带来的奇遇。他将信将疑，呷了一口酒，微微一笑，好像理解并赞同一切。“对，我认识佩特鲁斯老头子，认识他的女儿。我在造船厂之港有主顾和朋友。”

为了掩饰他的高兴，他又喝了一口酒，甚至还朝拉尔森要了一支烟，虽然他的写字台上放了满满一包。他不想取笑任何人，他不觉得任何一个人可笑。他突然感到一阵快意，一种不习惯的、热烈的、卑谦的、幸福而使他感激的感情，使他颤栗。因为人们的生活仍然是荒唐而无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白白地继续给他派来使者，确认其生活是荒唐和无益的。

“是个责任重大的职位，”医生淡淡地说，“尤其是在目前公司处于困难之中的时候。佩特鲁斯老早就认识您吗？”

“不，他对过去一无所知。造船厂之港谁也不知道。可能是一次幸会，大夫。我斗胆说出了您的大名做旁证。”

“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他又喝了一口，听着室外的雨声，觉得内心产生了一种不慌不忙的、稳稳当当的好奇心。他不再瞧着拉尔森，闭口不谈了，看着架子上的书籍。沉默中，拉尔森清了清嗓子。

“简单说来，有两件事，我想请教您，大夫。我知道不妨同您谈谈。”

“这个变老了的家伙，‘收尸人’，患有高血压症，快要秃光了的脑门上的皮肤泛着和气的色泽，圆圆的肚子快要遮住大腿了。”

“谈到佩特鲁斯，”迪亚斯·格雷依说，“他此时正在这条街的街口睡觉，他住在广场旅馆里。我同他谈过话，不久之前，就是今儿

下午。”

“这我知道，大夫。”拉尔森笑了，“谁告诉您我不是为此而来的呢？”

“这个三十年来靠那些肮脏的女人心甘情愿地给他的肮脏钱过日子的人，巧妙地立身处世，用背叛取代生活，没有来龙去脉，心狠手毒。他原来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他生来不是为了死去，而是为了赚钱和出人头地。就在这个时刻他还在把生活想象成一个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必须前进并捞取好处。”

“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好了。等一会儿。”医生走进餐厅，打开了留声机。他把门只留了一条缝，传来的音乐声并不比雨声更响。

“首先是公司，大夫。您觉得怎么样？您应当知道。我说，佩特鲁斯有可能渡过难关吗？”

“五年多以前圣玛利亚就在谈论这件事了，在旅馆里，在俱乐部里，喝开胃酒的时候都在谈。这方面我有材料。但您在那里，您是总经理啊！”

拉尔森撇了撇嘴，看着自己的指甲。两人又互相找着对方的眼睛，雨声已经听不见了，合唱声充斥了整个诊室，河里传来一声短短的、懒洋洋的汽笛鸣。

“跟在教堂里忏悔一样。”拉尔森温和而毕恭毕敬地点着头说，“我把一切都抖搂给您吧！我不负责行政事务，现在我正在做的是进行综合研究，熟悉情况，研究成本。”他耸了耸肩膀表示歉意，“可是那简直是一片废墟。”

“正是这个直到死时都应该待在离这里至少一百公里远的地方

的家伙，不得不回来把那已经僵硬了的爪子伸到佩特鲁斯老头子的蜘蛛网上继续编织。”

“据我所知，”迪亚斯·格雷依说，“一丁点儿希望也没有。还没有对公司进行清点，因为清点对谁都没有好处。主要股东们早就把这事当作蚀本生意，而且把这事都忘记了。”

“您能肯定吗？佩特鲁斯说还值三千万啊！”

“对，我知道，我今儿下午也听说过这个数。佩特鲁斯疯了，或者是企图继续相信值这个数免得发疯。如果清点的话，他能收回十万比索，而我知道他个人就欠了一百多万比索。不过在没清点以前，他还能继续提交书面材料，走访各个部。再说，他已经很老了。您领工资吗？”

“就眼下说，没有真正领到工资。”

“这就是了。”迪亚斯·格雷依甜蜜蜜地说，“我见识过佩特鲁斯的其他经理，很多人在等船的时候就在圣玛利亚分道扬镳了。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而且没有两个是相像的。好像佩特鲁斯老头总是挑选或委任不同的人，希望有朝一日找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甚至可以靠丧气和挨饿发胖而且永远不走的人。”

“也许是这样，大夫。”

“我见过他们。”

（三年当中，可能有五个或者六个从流放地点逃回来，路过圣玛利亚的人，做了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股份公司的总经理、行政经理或者技术经理。流放地点使他们觉得不仅仅是远离了熟悉的地方，那些地点甚至也不是可以叫得出名字或者搞得清楚位置的地

方。经过这一切之后,他们已经变得大同小异了:穷困潦倒,穿着不配套的破烂的衣服,几乎衣不蔽体。而且都有点藏不胜藏的垂头丧气,有一种佩特鲁斯老头子的传染性疯傻培养出来的共同气质。这种气质就像那支小队伍的制服似的。还有更多的人,也许是这个人数的两倍,没看见他们在圣玛利亚同这个敌视、背时然而可以相信和碰运气的世界建立过新的联系。有的人在造船厂之港上了船,向四面八方溜之大吉了。有的人还带着一种可能和自豪混为一谈的、使他们变得不可捉摸和无影无踪的恐惧从城里走了。他们的区别不大。另外还有一种眼神使他们形同兄弟,那眼神不是空虚而是空旷;以前有过的和坦白过的东西,他们逃跑之时踏上的第一块陆地上的人们眼睛里仍然保存着的東西,如今都已荡然无存了。

(实际上,正如所有跟他们谈过话的人所了解的那样,正如他们自己承认的那样,他们从那儿返回来的造船厂之港是河边上一个随便选定的地点,四周是德国人的农场和混血儿的茅屋,紧靠着河岸的就是佩特鲁斯股份公司的大楼——一幢墙皮已经剥落的灰色方形水泥建筑,以及一堆无人问津的锈迹斑斑的废铁。他们是打那个从圣玛利亚乘船只要几十分钟就能到的地方回来的,一个下定决心或铤而走险的人,穿过别墅和长满柳树的山坡步行,两个小时多一点儿就能走到。他们的眼睛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悲伤,使好心的人们因他们的返回而激动的神情一扫而空,使其他的大大小的经理们和将来可能去的经理们,曾经偷偷地穿过城市围拢过去,又永远地散开了。那眼睛,那眼神,都出奇的冷峻,然而又兴高采烈。经理们回来了,他们感激在那里用来取过暖的木头,感激握过的那些

手,感激他们抚摩过的玻璃窗,感激向他们提过问题的那些嘴巴,感激那些向他们发出的笑声,感激对他们的同情和惊奇。

(然而,他们眼睛里的这种兴高采烈并非是那种流放归来的兴高采烈,或者至少不仅仅是。他们左看右看,仿佛是刚刚死而复生,仿佛是对那刚刚逃脱的死亡的回忆——一种无法表达的、用语言和沉默都无法说明的回忆,这些已经永远地变成了他们的灵魂的一种特性了。从他们的眼睛看,他们不是从某个确切的地方回来的。他们是从一个从来没有呆过的地方,从一种绝对的、自欺欺人的、充满种种象征的孤独中回来的。这些象征是:野心,安全,时间,权势。他们从来不是神志清醒、真正如释重负地从那个佩特鲁斯老头子用愚昧制造的特殊的地狱里回来的。)

留声机里正在播放着一支表达友爱和安慰的曲子。拉尔森歪着脑袋,双手抓着酒杯垂在膝盖上听着,对会见不抱任何信心,确信只要拖下去就是胜利。

“不过说来您也不信,大夫。我们不会饿死的。我已经把人们、把剩下的高级职员组织起来了,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也不想走。”

“对,也许您就是佩特鲁斯需要的那个人,干那个活的适当的人。一点也不滑稽,一点也不假,尽管如果是换了一个人来对我说这一切,我准得笑起来。这儿谁也不知道任何消息,真奇怪。”

“造船厂之港死了,大夫。几乎没有船在那里停靠,谁也不在那里下船,谁也不在那里上船。就说今天吧,为了来您这里,我只好搭了一条渔船。”他装模作样、含着歉意说道。新唱片正在令人信服地颂扬这荒谬的希望。

“这么说您住在那里了？”迪亚斯·格雷依突然高兴地说，“一切都不坏，一切都井井有条。请让我说下去，我几乎从不喝酒，只在下午七点钟时到旅馆酒吧去喝那点配给的份额。而且总是，几乎总是那几个人谈同样的事儿——您和佩特鲁斯。也许您预言过，我有所觉察并感到惭愧。您知道，生活中没有什么意外。出乎我们意料的一切，恰恰就是证明生活的意义的东西。不过，我们被教坏了，我们也要求别人被教坏。也许您不是这样，佩特鲁斯也不是。”他亲切地笑了笑，把拉尔森放在写字台上的酒杯倒满，然后又慢悠悠地把自己的酒杯也倒满了，脸上始终堆着宽厚的笑容。宁静中，他听见留声机啪的响了一下。唱片只剩下一面没放完了，雨停了，风也住了。

“最后一杯了，大夫。”拉尔森说，“今儿晚上我还有几件事要办，而且非常重要。看见您，同您呆这么一会儿，真不知道有多高兴。我一直这么想，也这么说，迪亚斯·格雷依大夫是人类的精华。干杯！生活中没有意外，您说得对。至少对老实人来说是这样。我们对生活了如指掌，请允许我这么说，就跟了解一个女人一样。至于生活的意义，请别以为我是说空话，多少我还懂一点。一个人做事，除了他所做的以外就无能为力了。或者说，不一样，并不是永远都能选择。但是其他人……”

“其他人也一样。相信我吧！”医生耐心地说。他习惯说得清楚明了，那是医学系里为了造福于穷苦的病人而对他谆谆教导过的。“您和他们都一样，大家都明白我们生活的方式是一幕喜剧，都可以承认这一点，但不能都承认。因为，另外的每个人都需要保护一幕个人的喜剧。当然啰，我也如此。佩特鲁斯委任您当总经理的时

候,他就是个喜剧演员,而您接受这个职务的时候,就是另一个演员。这是一场把戏,而且您和他都知道对方在做戏,然而你们都心照不宣,假装不知道。佩特鲁斯需要一个经理以便做手脚,证明造船厂并没有停业。您想积攒工资,希望有朝一日奇迹出现,时来运转,可以让人付这笔钱。我猜是这样。”

最后一次换唱片了,唱的是关于规劝采用一种神乎其神的表示赞同方式的歌曲,这种方式从来不可能自发地在人身上产生。“我没有必要让他明白,我觉得我再也不会见着他了。我可以对他说话,不是针对他说,不说他知道的,而是说他对我具有的意义。”

“您赢了,大夫。关于这一点,不幸被您言中了。不过还有一点。”拉尔森笑了,仿佛在添上一句公开的祝贺和掩饰另外一点最宝贵的部分:他的癫疯,关于电镀的计算,其余也许此时翻扣着躺在海底的轮船的船壳维修预算,独自一人在衰微破败的库房里的胡思乱想,以及他对一切家什、对他没经历过的事情的回忆和对那些住在造船厂里的可怜人的那种情不自禁的男性的眷恋。

“可能会有有的。要是您没有别的事的话,您准是已经在旅馆里跟佩特鲁斯在一块儿了。您说,拉尔森,一个人不见得永远是自己所做事情的主宰,这可能是对的。我在想过去的事,想生活的意义。错误在于我们思考的是生活中的同一样东西,不是生活的所做所为。但这是假的,其实正是这个,这个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和心里有数的东西……”他没敢再说下去,只是想:而这是个具有明确的意义,具有生活从来没有试图隐藏过的意义,人们一开始就愚蠢地唧唧喳喳、心急火燎地反对的意义。一切可能性中最难令人置信的,

就是我们自身死亡的可能性。这对生活来说简直是司空见惯，一个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的事件而已，转眼之间就完结了。这证明了人们接受生活的意义是何等重要。

留声机的唱针无声地划了几圈，嚓的一声，再也不响了。迪亚斯·格雷依觉得空虚和腻烦，莫名其妙地感到内疚起来。

“您说的可能是对的，大夫。不过我，从我本身来说，从来不自找麻烦。有另一回事，正如传说纷纷的那样。”他看了看因潮湿而失去了光亮的皮鞋，拽了拽袜子。

“您认识佩特鲁斯的女儿吗？安赫莉卡·伊内丝。我们订婚了。”

真是欲笑不能，迪亚斯·格雷依坐着往后挪了挪，从写字台上拖过一支香烟，心里玩味着：这次会见是一场梦，或者至少是一个可以想象得出的人导演的一幕喜剧，让他今儿晚上快乐几个钟头。

“安赫莉卡·伊内丝·佩特鲁斯。”医生低声说道，“我刚才说过了，老实说，把握不大。您和佩特鲁斯。我认为好极了，第二步的一切都好极了。”

“谢谢，大夫。现在有个问题，您会明白的。”拉尔森这么说只是单纯的友好表示，既不抱使对方相信的希望，也没有这个意图。他不再看着鞋子了，抬起眼睛，以其五十岁的人能装出的最无辜、最诚恳的忐忑不安和最真诚的表情看着医生。

迪亚斯·格雷依觉得，拉尔森脸上出现的这种令人恶心的、无意打动对方的表情是一句话，他颤栗着等待对方说下去。“我们彼此相爱。那当然，一切都几乎是从零开始的，跟常常发生的情况一

样。然而这是认真的一步。我此行——冒着倾盆大雨坐渔船而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同您谈谈这个问题。可能会生儿育女，结婚可能对她有害。”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迪亚斯·格雷依热烈地问。

“这个，您知道我不能让她虚度光阴。我想了解，从您的职业秘密这个角度说……”

“好吧！”迪亚斯·格雷依把身体凑近写字台，连连打了个哈欠，然后眼里饱含泪水，乐滋滋地说，“她很怪，非同一般。她疯傻了，但很可能永远再也不会疯得比现在厉害了。生儿育女——不可能。她的母亲是因痴呆而死的，虽然具体死因是脑溢血。至于佩特鲁斯老头子，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他装疯卖傻，以便不完全变疯。这么说是残酷的。但最好是别有孩子。至于跟她一块儿过日子，您了解她，我想，那您会忍受得了的。”

他站了起来，又打开了哈欠。拉尔森猛然一改忧心忡忡的、无辜的脸色，走过去从小床上拿大衣和帽子，膝关节咯吱响了一下。

现在，为了不完全地再现当夜的情景，尝试一下赋予它一定的重要性或历史意义，做个缩短冬天不眠之夜的无害游戏，把这一切谁也不感兴趣而且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事情归纳、综合、加工一下，就该轮到广场酒吧的男招待作证了。

他承认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天下着雨，有一个男人走到柜台跟前，问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先生是否在旅馆“歇脚”，他的模样，跟他听到的许许多多某种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关于拉尔森的模样

的描绘——因为各人说话的情绪不同——相符。

“那是个老字眼儿,因此我不再想‘西蒙斯菲茨’^①了,一连看了他两遍。差不多所有的人现在都说‘住’或者‘在’了,只有科洛尼亚的人,成年人,也许不是在当地出生的才说‘路过’。那一位却说‘歇脚’,两只手没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来,帽子也没摘,没有问晚上好,或者我没听见。那个老字眼儿,大概也由于那个嗓门,使我想起了年轻时候那个时代,想起了街道拐角处那些咖啡馆,想起了许多事情。那个家伙说话的时候,我正好没事可干,酒吧间差不多全空了,柜台跟前一个人也没有,我拿着一块餐巾擦拭着杯子——尽管那不是我的事儿,而且杯子都总是干干净净的。我正在想黑人查利·西蒙斯,想着他制造并命名的带气儿饮料菲茨,想着显然他向我传授的配方是假的。因为我一向向他讨配方他就告诉了我,但是配出来的那种饮料,颜色很好看,但简直没法儿喝,而且实际上我从来没看见他配过。查利当时在‘里基饮料店’——后来改为‘诺内姆饮料店’里,在那里呆了不久,后来就不知上哪儿去了。我心不在焉地想着这些和以前的另一件事,这时,那个家伙来了,也许就是您说的那个人,尽管在此之前,他住在圣玛利亚时我从来没见过他。可能更老了,一定更老了,发胖了,快变成老头儿了。但还对时光的流逝不大在乎。我大概叫他到管理员托维亚斯那儿去打听,他管住宿登记,带着钥匙。然而那句话,是否在旅馆‘歇脚’,也许是‘歇脚’这个字眼,把我说服了,我回答了他。我对他说对,并告诉了他佩特鲁斯住在

① 一种带气泡的饮料,倒出来时嘶嘶作响。

几号房间。我们大家都知道，也议论这件事：生病或者装病的佩特鲁斯老头子，从上午一直呆在二十五号房间。那套房间有起居室，是留给新婚夫妇的。除了一瓶矿泉水外，他整天没要过别的东西。谁也不知道，尽管说法很多，法国人到底没敢把账单送给他，这一天的和那些拖欠的，足足有好几千比索。看着他不是在账单上，而是在一张有底色的支票上签字，支票是以某家我无法想象的银行——干嘛无法想象呢？可能是叫作佩特鲁斯公司或者叫作佩特鲁斯的某个名义为抬头的，如此而已。那家伙对我点点头算是对我表示感谢，然后朝电梯的方向走去。我本来想嘘他一声，告诉他先用内线电话通报一下。但我又站住了，他继续朝前走。他正像您对我说的：行动本来就笨拙，但还在故意做作，穿一身黑衣服，拖着鞋后跟，嚷嚷着在空荡荡的静悄悄的酒吧间里行走，走上过道的地毯后，脚下没声了。他弓着脊背，仿佛胸口上坠着个什么东西，怪可怜的。我原先想着的另一件事情，谁都会那么想的。我想起了查利·西蒙斯，我见到过的衣着最华丽的人。有一次，有那么一次，他用一把长勺子搅着一杯杜松子酒调‘菲茨’饮料，他认为那样做可以改善处境或者随便改变一下剂量或配料，不加任何新的或更好的配料就可能一举成名。这是我不明白并仍百思不得其解的。”

当时，门没有上锁。在半明半暗的小客厅里拐弯抹角地走了几步后，拉尔森进了佩特鲁斯那个亮着灯的房间，看见老头子仰面朝天蜷缩在一张双人床上，只占了四分之一的地方。他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和一个黑色的小本子。小本子是带镀铬金属夹的，搁在膝头上。他把小窄脸转向拉尔森，既不惊奇也不害怕，除了淡淡的询问

之外，脸上没有别的表情。

“晚上好，请原谅。”拉尔森说。他把双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小心地把帽子放在假壁炉的托架上。

“是您啊，先生！”老头子说。脸都没有转一下，顺手把铅笔和黑本子塞到枕头下面。

“我们在这里见面了，先生。不管怎么说，我深恐……”拉尔森疾步走上前去，伸出手来，一直等到佩特鲁斯把他那极小的干巴巴的手放上去。

“对！”佩特鲁斯说，“请坐，先生。搬把椅子过来。”他看着拉尔森，盘算着，点了点头，仿佛相中了。“我希望造船厂里诸事顺利。我们到了成功的边缘了，几天之内的事情。在现阶段，比较惨淡，应当把法律手续称之为成功。我得到了一位部长的许诺。跟职员相处中有什么困难吗？”

拉尔森在床上坐了下来，为了博得天使们的好感，他笑了笑。他想起了足足有一个营的职工幽灵，想起了也许是职工们留下的那些痕迹——那些痕迹无论如何此时不能说明问题了，想起了加尔维斯和孔茨，想起了那两只狗——它们朝那个穿男人大衣的大肚子女人跳跃着，还想起了某个水坑、像窗户似的破洞、螺丝掉了一大半却仍然挂着的合叶。

“一点儿困难也没有，先生。起初，有过一点反抗，荒唐！不过现在，我可以向您保证，一切都像一台机器一样运转。”

佩特鲁斯笑了，说那正是他期待的，他确信他挑选人才并委之以重任的时候没有选错。“我是个领导者，这是一个领导者的首要

素质。”外面，夜已深了，万籁俱寂，世界的广袤可以令人怀疑。

这里，只有一个盖在毯子下面的佝偻着的身体，一个靠在竖着的大枕头上的含笑的黄白黄白的脑袋。只有老头子和他的赌博。

“我很高兴。”拉尔森装出相信的样子淡淡说道，“我总是这么想，当我负责造船厂的问题和监督职工的工效的时候，我是在后方。而您……”他喘了口气，似乎志得意满了，但又感到潮湿的大衣里有一股寒气刺入肌肤。

“在火线上，先生。正是这样。”老头子笑着说，“风险更大，也更光荣。不过后方如果失利的话……”

“这正是给我劲头的想法。”

“这一切都是我的杰作。”佩特鲁斯说着，伸出一只手去碰了一下枕头下面的小本子，“在看到一切都运转起来之前我不死。这不可能。不过您的任务，先生，跟我的一样重大。如果造船厂哪怕只要停工一个小时，我还能在那些个办事员、那些个靠裙带关系爬上来的暴发户的接待室里捍卫什么玩意儿呢？我非常感谢您。”

拉尔森扮了个快活、羞涩、感激的鬼脸，点了点头。佩特鲁斯老头飞快地收敛了笑容，绷紧了络腮胡子中间的消瘦的脸，沉思着露出礼貌而严厉的期待表情。

一男一女高声大嗓地交谈着从门前走过，男的在轻蔑而十分耐心地否认着某件事情。

“那个已经准备好了，我向您保证，就等您下命令了。”拉尔森费力地说道。然而，不管是门外的还是对着床脚发出的声音，都没有使靠在枕头上那颗没有重量的猴子木乃伊的脑袋改变询问的神态。

“他挤出的这片分布得很均匀的皱纹，不是笑容。他对任何人的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而我也不是我，连今儿晚上占据着造船厂那个横竖都一样的总经理位置的第三十或第四十个身体也不是，我充其量不过是个怀疑。甚至他并不怕我，我没敲门就进来了，而且在这么晚，他并没有通知我他今儿晚上会在圣玛利亚。他想知道我为什么撒谎，我有什么计划和希望。他急着想知道，但同时又在开心。他天生就是干这种赌博的，而且自从我出世那天起他就在干了，占了二十来年的大优势。我不是一个人，而他脸上显出的复杂表情也并不是笑容。那是一块银幕和一道命令，一种争取时间的方式，是等着别人亮牌和下赌注的缓兵之计。大夫有点儿疯疯癫癫的，跟平常一样，可是他说得对。我们不少人在玩同一种赌博。现在，一切都看怎么个赌法了。这个老头儿和我都爱钱，爱钱如命，而且，从骨子里说，在爱钱的毛病方面我们很相像，因为的确都有爱钱的癖好，这是衡量一个人的尺度。可是他赌博的赌法不同，不仅是赌博的规模和牌的多少不一样。首先他不像我那么绝望，虽然他剩下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而且他也知道这一点。其次，坦率地说，他胜过我的另一个优势是，他唯一关心的是赌博，而不是可能赚到的东西。我也是在赌博。他是我的兄长，我的父亲，我祝福他。不过有时使我感到恐惧，不由自主地要合计合计。”

从过道里走过的那一男一女，在远远的地方冷冰冰地低声嘀咕着，破坏了四周的静谧。后来，他们咔嚓一声插上了门上的插销。雨夜变成了一口快活地呻吟着的大锅，一口不比回忆更现实的大锅，在拉上的窗帘外边，扣在广场上。

虚靠在差不多竖着的枕头上的那颗差不多已经麻木的脑袋，深知越来越白的冰雪般的两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念及于此，不由焦躁起来。拉尔森把握不大地装出悚然动容的样子，俯身把脸凑了过去，脸上久久地保持着神秘的表情。“在这些窗户下面，我曾经度过了无数个夜晚，一只手握着左轮手枪或者放在左轮手枪附近，使劲儿踩着地面，既冒冒失失又满不在乎地挑衅着，总是一无所获。”

他听见河里传来一声沙哑、微弱的似像非像的汽笛声，一连响了三下。他摸了摸香烟，没有力气把裹在身上那件潮湿的大衣脱下来。大衣散发出一种悲凉、怯懦的气味儿，散发出一种淤泥和非常陈旧的洗发剂的香味儿，使他心荡神驰。不知道多少年以前，在那些挂着一排排镜子的理发店里，理发师们曾经给他的头发涂过这种洗发剂。说到底，这些都已难以置信了。突然，他对大家或迟或早都会明白的事情产生了怀疑：佩特鲁斯是那个幽灵世界里的唯一一个活人，不可能同他取得联系，甚至连想都别想，他既叫人可怜又叫人憎恶，唯一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和应当给他的只是宽容的厌恶和半尊重半作乐的耍弄。

“对，先生。”佩特鲁斯平静地说，说话的也许只是佩特鲁斯的声音。这时，拉尔森道着歉打断了佩特鲁斯的话，三言两语地表白说他完全是凭着忠诚老实，凭着不可遏制的对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及其远大抱负的拥护而行动。他没有一一列举，而是概要地说了说，以一个预感有余而了解不足的外行的谦虚口气说了说假股票的潜在危险性。他装出满脸深谋远虑和担惊受怕的神色说，有一次，加尔维斯无缘无故地同他争吵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把假股票亮出来

了。毫无疑问，加尔维斯会继续玩假股票这张牌的，丝毫不知进退，毫不负责地玩，任何心血来潮的时候都可能让大家完蛋。

也许已经为时太晚。当然也可以采用暴力手段，显然他拉尔森保证了他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然而，难道那张四周有环形图案的、号码重复的，右下角有佩特鲁斯那不容辩驳的潦草的畏首畏尾的签名的绿纸头，只是唯一一张在那些它不应该去却又在那里折腾的假股票吗？在这种情况下，暴力就是无能为力、无济于事的了，先生。

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闭着眼睛听着，他也许是在拉尔森讲述到某个适当的时候把眼睛闭上了。到底是什么时候闭上的，拉尔森不知道，他对此深感遗憾。佩特鲁斯仍然一动不动地靠在枕头上，露出来的只有那颗现出寡廉鲜耻的神色的小脑袋。儿童般的胸腔，佝偻着的双腿，包括那两只用旧铁丝和旧纸做成的手，都平平地摊在毯子下面，只露着那颗闭着眼睛的麻木不仁的脑袋，那副搁在枕头上的预备吓人一跳的面具。风不愿意吹到跟前，它吹净了河面的上空，带着嗜痂成癖的恒心，如诉如泣的呜咽，脱离了树木、树叶的愿望，散开去又收拢来。

“就是这么回事儿。”最后，拉尔森恼怒地说，“也许不要紧，我说错了。不过加尔维斯肯定那张股票是伪造的，肯定他在被肝疼醒来的任何一天都可能被投入监牢。您瞧瞧，我在总经理室里工作，在考虑电镀金属的时候，那个家伙却把那张旧不拉叽的绿色道林纸头当作救命符一样给我看。我没怎么睬他，向他表示不相信。但我不得不租了一条渔船马上来看您并向您报告。”

佩特鲁斯眨了眨眼皮，闭着眼睛又说了一声“对，先生”，然后睁开眼睛看着拉尔森，表示他理解了，并示意他没必要露出牙齿和费力地、有条不紊地挤动脸上的皱纹来装个笑容。然而，拉尔森知道那颗冷眼旁观的脑袋在笑，而且那个看不见的但却毫无疑问的笑容是贪婪的、嘲讽的，佩特鲁斯在把他拉尔森本人同加尔维斯、股票、危险、股份公司和人们的结局视为一路货色。

现在，佩特鲁斯的眼睛睁开了，漆黑的眉毛下面，两只细小的眼睛泪水汪汪地闪着光亮。他有气无力地解释说，在那次伪造股票的小小冒险开始之初，就有一张股票被偷走了。伪造是微不足道的，但若同他称之为公司并命名为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股份公司的冒险联系起来看，又是非常必要的。他筋疲力尽地承认说，把假股票交到法院就可能造成障碍，在离胜利或办理法律手续就差那么几天或者几个礼拜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格外可惜。就差一张股票，只有这一张是个危险。拉尔森忠诚地守卫后方，并十万火急地坐着渔船在风雨交加的河里航行，十二万分地强调了他同公司的问题和危险息息相关了。必须设法让假股票到不了圣玛利亚法院。一切手段都是正确的，都将得到报偿。佩特鲁斯又把眼睛闭上了，显然在撵拉尔森走，而且假股票交不交到法院确实与他无关痛痒。他现在可能是以这种方式取乐，而且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取乐。从许多年以前开始，他就不相信赌博能赚钱了；直到死，他都将强烈而乐滋滋地相信赌博，相信他记着的谎话，相信忘却。

拉尔森因嫉妒而感到有点儿狂怒，因模模糊糊的敬佩而觉得自愧不如。他踮起脚尖走到用灰浆做的壁炉跟前拿起被雨水浇变了

形的帽子,用两根指头把它按习惯的角度歪扣在头上,然后依然踮着脚尖回到床前面,仔仔细细、从头到脚把佩特鲁斯看了一遍,然后直起腰,把双手插进口袋里。那个白里泛黄的光秃秃的脑袋上的两道黑眉毛,差不多和毯子形成了一个直角。佩特鲁斯似乎睡着了,细小干瘪的嘴巴轻轻地闭着。“像他这样的人剩下不多了。要我干掉加尔维斯,干掉那个怀孕的女人,干掉那两只孪生狗。他自己也知道这没有鸟用。我要告辞了,如果他醒过来并睁开眼睛看我,我就吐他一脸唾沫。”

拉尔森没有弯曲膝盖,只是俯下身子去吻佩特鲁斯的前额。那张脸仍然一动不动,莫测高深,黄黄的。拉尔森直着身子,用一根指头在帽檐上擦了擦,摇摆着,无声无息地穿过黑洞洞的起居室,走到门口,拉开了门。虽然风声呼呼,又隔着几道木板门和一段距离,还是听得见过道尽头那个房间里,不大一会儿之前聊着走过的那一男一女正在激烈地争吵。

圣玛利亚之三

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亲自见过拉尔森并以为自己了解他的行踪的人们的意见和预见，一切都表明，同佩特鲁斯会见后他就设法并如愿以偿地通过最快的途径回到了造船厂。

现在他需要——或者说他仅仅以其残存的全部不太高的、时断时续的热情苟同了这种需要——搞到那张假股票，并不动声色、隐隐约约、野心勃勃和充满好奇心地把它奉献出来，犹如在作出一种牺牲似的。没有取得任何优势，而只是曲曲折折地得到了透露出来的某些情况，他觉得没有达到目的。然而，尽管理智和证据都使我们相信，那天晚上拉尔森唯一关心的是如何尽早回到造船厂，阻止他刚刚假想出来的敌人搞任何阴谋诡计，并实地筹划委托给他的夺回假股票的战斗。但是，在这个历史时期，谁也没有急事或者对他人的急事漠不关心，也是实话。

于是，斜穿广场之后，拉尔森只好顶风冒雨，走走停停。他惊奇、厌倦而又带着无法克制的亢奋，发现造船厂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街头彻尾地隔绝并自成一统的世界。但是并不

能排除还存在另外的世界,存在这个他此时踩着的、他本人曾经住过几次的之外的世界。左拐弯以后,他沿着河边大步流星地走开了。他估摸着他能认得出来那些水淋淋的街口和建筑物的背面,认得出间隔很远的每盏路灯的独特的灯光。毛毛雨渐渐小了,拉尔森摇摇摆摆地走着。

走过阴森森的明晃晃的海关大楼后,他下了河岸,沿着恩杜罗公路往前走。雨已经停了,风开始一阵一阵地往城里刮,吹过一排苹果树,又吹过一排苹果树。“如果我必须旧地重游的话,干嘛要在这么个晚上回来?我又干嘛要往那最脏最穷的地方跑呢?”他把一只手藏在大衣襟里,缩着脑袋,免得风把帽子刮走。每扑哧走一步,就觉得袜子里灌满了水。

他发现咖啡馆的黄色灯光时,已经闻得着死鱼的臭味儿了。又走了五十来米,听得见音乐了,吉他在弹着快速的华尔兹。他推开门,又伸手从背后把门关上了,一边看着屋里腾腾的烟雾,看着那些黑糊糊的脑袋,看着那穷困潦倒的景象,看着那转瞬即逝的安慰,看着那不关痛痒的怨恨,脸上始终带着对这似曾相识的一切的惊讶。他带着一丝算计好了的挑衅神色朝柜台走去,掩饰着自己的激动,直到明白产生这种激动的原因。

“不问朋友们好吗?我叫瓦雷罗,还记得吗?”

柜台里面那个年轻的汉子笑了,把那件肮脏的白上衣一直扣到脖子。他没刮脸,满面倦容而又精神抖擞。

“瓦雷罗,怎么不记得呢!”拉尔森说道,并不知道在跟谁说话,他伸出手去,拍了拍对方的手,然手又把它握住了。他们寒暄了几

句天气，拉尔森要了杯甘蔗酒。他虚靠着柜台，半转身朝着屋中央。拉尔森平静地、潦潦草草地、轻而易举地使对方满意地看了看：在这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他度过了一段已经死去了的、被埋葬了的时间的世界里，哪些是他的同辈人？弹吉他的人叉开两腿坐在屋中间，稀稀疏疏的山羊胡子下面，一张嘴不知疲倦地笑着。这时，风声小了，屋里那些被重物压弯了腰的人们期待而又毫不礼貌地沉默下来。拉尔森认出来了，那些睡眼惺忪、疲惫不堪的混血儿，都是农场的短工或长工，他们都是被佩特鲁斯老头子的随便哪个工业神话骗到恩杜罗来的。那几个女人，穿得破破烂烂，满嘴粗言秽语，是些贱货。弹吉他的人翻了翻白眼，开始弹另一支华尔兹舞曲。在那个被一块铁丝帘子、几块木板广告牌、横放着的罐头堆、一根看不见头的铁钩子、一个装着叫不出名字的干东西的痰盂和一只睡着了的黑猫隔开的角落里，一男一女紧紧攥着拳头，把手放在桌子上。

“现在人们又在说工厂要关门了。”瓦雷罗说，“但是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关。鱼有的是，用不完。这些奥妙我搞不清楚，更不用说那些幻想靠二三十比索的工资来发财致富的可怜虫了。上面那个人才知道，关门他赚，开张他也赚。虽然说来也怪。您回来是扎下不走了吗？我不过是瞎打听打听。”

“没什么。路过这里，没别的事儿，我在北边有几笔买卖。”

“买卖?!”瓦雷罗重复了一句，没敢笑出来。

拉尔森看着一张张桌子，复习着探戈的歌词，对那些胡乱弹奏吉他和拖长面部表情的人、对出现的一阵阵沉默和那一张张在酒杯上面挤成一堆的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面孔毫不在意。他打了一个

冷颤，又要了一杯甘蔗酒。在角落里的那张桌子边坐着的那个男人，低垂着头，他肩膀宽阔，穿一件花衬衣，脖子上系着一条黑手绢儿，结子系在侧面，十分显眼。那个女人的头发油乎乎的，梳向前面压着两只眼睛；反复挤出表示不同意的怪相，已经变成了第二张脸了，变成了一个始终动来动去的面具，也许只有在睡梦中才把它摘掉。拉尔森凭经验，加上已经表明是正确的知觉所能回忆和再现出来的一切，都不能使他相信：在那些表示温柔、拒绝、谦虚和动人的自我欣赏的笨拙的标志底下——它们像光泽似的从抽搐的皮肤里流露出来，是否真有那女人的第一张脸，那张父母给她的而不是为她装扮和帮助她装扮的脸。

“这第一张脸，如果她有的话，那么也从来没有谁见到过。因为她可以只在独自一人和周围没有一面镜子或一块肮脏的玻璃可以窥见她的时候，她才使用这张脸，她才把它裸露出来。可是最糟糕的是，如果她——我考虑的不仅仅是她一个，假如因为奇迹、意外或她不小心，有人能够看见那张她从十三岁起就隐藏起来的脸孔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无法喜欢她，甚至无法认出她来。不过这一个，至少可以得天独厚地在差不多还算年轻的时候死去，不管好赖，在皱纹给她做成一副最终的、比现在这副更难摘掉的面具之前死去。那时，她的脸将是安详的，一扫活着的时候那惨然多变的忧伤。也许还有幸让两个老太婆给她脱光衣服，对她品头论足一番，然后给她擦洗身子，穿好衣服。也不能排除，到这破房子里来喝甘蔗酒的男人中的某一个，会僵手僵脚地摇晃她一番，为了还愿而给她的前额上放一根浸湿了的小树枝，并在摇曳的蜡烛光下端详她那噙着泪花

的变得奇形怪状了的眼睛——当然，不超过一分钟。于是，如果发生了这一切的话，某个人就会终于看见她的脸了，她也没白活一世。可以这么说。”

穿花衬衣的男人一边劝说一边央求，凑得离那个坑坑洼洼的面具越来越近了。外边，风不管躲在家里的人们受得了受不了，呼啸着敲打刚栽上的秧苗，敲打树木，敲打在夜晚中油光闪亮的牛屁股。弹吉他的男人又开始调音了，一边躬起腰来感谢给他倒了一杯酒的人。瓦雷罗看见了拉尔森的视线。

“谁想得到她是什么人呢？”瓦雷罗不无骄傲又不无厌恶地说，“她能一直讨价还价到天亮。‘北方姑娘’，人们这么叫她。也许她是从您现在住的那个地方来的。在职业上，她不好对付。不过，说来您也不会相信，她很够朋友。”

风争先恐后地在空中打着旋涡，顽皮似的吹过咖啡馆的房顶，吹过笔直的泥路街道，吹过罐头厂的楼房，刮到冬小麦地；刮到科洛尼亚，刮到吭哧吭哧地在黑咕隆咚的平川上驰向城市的另一边的牛奶列车的时候，旋风更猛了。

“什么时候有上水船？”拉尔森转向柜台问道，一边在口袋里搜寻着，装出想付钱的样子。

“这不成问题，赏我个脸吧！”瓦雷罗说，“六点钟前没有班船，不过也许会有条货轮要走，愿意捎您。”

那个男人把方方正正的厚实的脊背靠在椅背上了，价格已经谈妥，女人不再摇晃她的脸了，除了一种不怀好意的责备和因快乐的隐秘而沾沾自喜的笑容外，脸上没有别的表情。那种笑容她可以毫

不费劲地保持很久,直到天亮。为了庆贺买卖成功,那个男人要了两杯酒。

这样看来,这个世界,这个仍然是其他人的世界,没有发生变化,没有因他溜之乎也而受到影响。拉尔森敷衍了事,但心安理得地朝那个自称瓦雷罗的小伙子打了个招呼。走出了咖啡馆。出于谨慎,他模仿着他很久很久以前在那另一个星球上长期生活时走过许多咖啡馆肮里肮脏的地板的那种他厌烦了的摇摇摆摆的姿势。

第一个可以信赖的通知,拉尔森是在船上得到的。他蜷缩着身体,耷拉着脑袋,把攥着船票的拳头探向使船头高高翘起并摇摆不定的浪花。初升的太阳,贴着地平线射出了冷漠的光芒。“可爱的早晨,美丽、冰凉的冬天的早晨。”为了驱除寒意,拉尔森这么想道。然后,根据没有忘却就没有勇气的道理,他又想:“在一个无风的日子,我投进这冬天的阳光里,它漠不关心地、冷冰冰地照着我、看着我。我,当然了,将同这照耀着我的白色阳光一样冷峻,干完第一个行动,接着是第二个行动、第三个行动,直到我因为满足或疲乏而停下手来,并且承认,某件不可理解的事情,也许对另一个人有用的事情,已经在我的参与下做完了。”

又走了一海里远后,拉尔森打了个哈欠,又把他用来遮风遮雨遮太阳的黑帽子举了起来。他察看了一下跟他坐在船上的同一条马掌形长板凳上的人们,他们睡意蒙眬,身体一摇一晃的。他眨了眨眼睛,火辣辣地瞅着刚开始的一天,它跟瞎子似的,不可遏制。就是它,曾经把阳光洒在惊慌失措的长满鳞甲的巨大的鱼背上。还是它,现在又以其同样不可预料的准确性,把阳光洒在又一次在无人

照看的情况下出生的其他动物群上。

正当船头转向那个叫做“葡萄牙”的破码头时，拉尔森如同那种摸着伤处试验疼痛程度的人那样，决心体会一下何为恐惧，何为背叛，何为毛骨悚然；这种情感是可以减弱、可以忍受的，因为它是人性恶的结果。他想：“这个身体，两条腿，两只胳膊，一个阳物，肠肠肚肚，就是可以同人和事建立友情的一切。脑袋就是我，因此对我来说脑袋不存在。但胸腔在，它已经不是空的了，装满了残骸、刨花、锉屑、灰尘，装满了一切与我有过关联的东西、一切让我在另一个世界里幸福或者不幸的东西的残渣余孽。我非常心甘情愿而且时刻准备着进去，要是我曾经让我或可能让我留在那里的话。”

圣玛利亚之四

太阳变成红彤彤的颜色之后，便离开河面已经很高了。这当儿，正是迪亚斯·格雷依大夫醒来并摸索着去取第一支香烟的时候。他闭着眼睛，尽可能记住在刚刚逝去的梦中看见的情景，巩固其中的怀旧和缠绵的情节：母亲，矜持的女友，对着他的枕头和冲着他那更逼真、更纯洁、如睡梦中所想象得到的那样更年轻一点的脸的微笑——或者任何一声娇啼婉转的告别。

点燃香烟后，他扫了几眼若明若暗的房间，试图猜测一下刚刚开始的新的一天的气温。他考虑了一下要出去给哪些病人诊断，有哪些病人要来就诊，考虑了一下孤独的利弊，又考虑了一下昨天晚上同拉尔森的谈话，想起了佩特鲁斯的女儿，他最近只看见过她两次。

佩特鲁斯一家在圣玛利亚、在造船厂之港和欧洲任何一个城市住了好多年。每个地方只呆几个月。佩特鲁斯老头子不在家的时间，比家里其余那些乘船出走的人总要短些。实际上，他只领着妻子、女儿、一个保姆、一个小姨子或者妹妹，把她们安顿妥当、舒服，

替她们仔仔细细地计划好在一段时间里的生活，然后无牵无挂、心安理得地将她们忘掉。有人看见过他：矮小、干瘦，行动起来敏捷准确；络腮胡子当时还是黑色的，又粗又硬；戴一顶圆帽子，穿一身战后流行的那种紧身短摆衣服，那种款式似乎是专门为他那种讲究排场的人发明的。现在定做衣服时要做那种款式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哩！与其说他是丈夫和父亲，不如说更像雇员、管家、家庭顾问。他寻求的天伦之乐只是对其自身的干练的良好感觉，别人对他感激与否他都无所谓。妻子（女儿还没出生或还没有女儿）和那个每次旅行都焕然一新的女亲戚始终是同一个人，和他在关于舒适、声望、健康和环境美等观念方面的意见是否一致，他毫不关心。

他致力于追求组织才能方面那些小小的成功，并不完全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他的虚荣心大概从来不需要从外界得到营养，而是因为在那个生意、买卖无一例外只能是坑蒙拐骗的时期，他认为他的成功是以其能量小试锋芒，磨磨刀而已。那些小小的、有益的、微不足道的成功，是靠乘车加扒车，买票加赖票，查看公路交通图，在导游和好心人的指引下取得的。

最后，三十年代的危机爆发那一年，佩特鲁斯一家在造船厂之港定居下来了。佩特鲁斯太太永久地定居了，被埋进了科洛尼亚公墓，埋葬之前还打了一场历时二十四小时之久的口头官司：佩特鲁斯企图把尸体、蛆虫、骷髅和骨灰都留在自己的花园中，放进一个用砖头、大理石和铁条修成的一座屋顶两面排水的小房子里。小房子是建筑师费拉里赶着设计的，他甚至还领到了一部分酬金。对着家属，一个神父和掘墓人发过誓愿和许下措词强硬夸张的诺言——其

原因几乎肯定是由于对抗官员和市政府的命令时受了挫折——之后，佩特鲁斯同意把妻子埋进科洛尼亚公墓。另外，他还给省长发了封电报，电文足有三行，措词极为蛮横，简直应该签上“我，佩特鲁斯”；只得到了一封明褒暗贬的唁函算是回答，而且唁函是大雨浇了佩特鲁斯太太的坟墓整整一个星期才到的。（佩特鲁斯太太是冬天里死的，安赫莉卡·伊内丝不会忘记。）

掩埋之前，佩特鲁斯用德文念了一篇誓词。在这关键时刻，他把送葬队伍中寥寥无几的土著人排斥在外。“我向上帝发誓，你的身体将在祖国安息。”大写字母正好该重读。他做了个难以理解的动作。所有的目击者都认为佩特鲁斯跟感情虚假的人是格格不入的，他直挺挺地站着，举起一只胳膊伸向墓穴上方，发出几声带喉音的咆哮，下面的誓词就再也没有念完。他又弯下身子，接过递给他的一撮泥土，正好撒在拴棺材的紫色带子上的三个联在一起的字母上。

在这以前，在灵堂里，在人死后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建筑师费拉里殷勤地用各种颜色的铅笔在白色道林纸上画来画去，一边竭力准确无误地计算着利润，大理石和铸铁的价格和运费，泥工和石工的工钱。为创作和表演而奋斗的艺术家的快乐和忧虑使他微微颤栗。另一个，失去妻子的佩特鲁斯，在费拉里背后来来回回地走着，固执地、反反复复地查对着账目里的细枝末节，不同意费拉里的计算。

也许，佩特鲁斯和他的女儿决定在造船厂之港的这座房子里住一辈子了。他请人整修了房间，拉来雕塑放在花园里，运送家具、餐

具和装饰品箱子的船挣了好几个礼拜的运费。

住进这座矗立在水泥柱子之上的房屋——水泥柱子是用来防止河里涨大水的，但至今没有像担心的那样发过那么大的水——之前，佩特鲁斯曾经试图买下拉托雷^①那座宫殿。宫殿在一个小岛上，离圣玛利亚很近。佩特鲁斯老头子同英雄的后代会见的情形真值得回忆和描绘一番。英雄的后代们一个个肥头大耳，懒懒散散，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佩特鲁斯东求西告，连蒙带骗，看来搞到了足够签一个原则协议用的钱。于是，他就可能把那座呈玫瑰色的、始终潮乎乎的墙壁、有一百道带铁栅的窗户和当时确实还难以令人置信的一座可以旋转的塔楼式的宫殿作为住宅了。宫殿在那个进出港湾的船只应当向它鸣笛致敬、远远地围着它转一圈的小岛上。

也许这么一来，佩特鲁斯住到了小岛上的话，他的历史和他的历史就都要改变了。也许命运——命运的千奇百怪、无穷威力和惊心动魄决定成全他，同意有必要让故事的结尾更动人或者更和谐：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成了圣玛利亚、恩杜罗和造船厂之港的皇帝，成了我们的主人；在宫殿的塔楼里，他为我们、为我们的衣食住行和我们的工钱彻夜不眠。佩特鲁斯可能下令在塔楼上挂一盏灯，或者晴天的晚上，我们在河滩上散步时看看那些可以同天上的星星鱼目混珠的亮晶晶的窗户，窗户后面，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

① 拉托雷(1840—1916)，乌拉圭军事家、政治家，曾于1876至1878年和1879至1880年任乌拉圭总统，后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正在彻夜不眠地统治着我们,就足以使我们更加心甘情愿和热情倍增地对他俯首帖耳了。然而,当英雄的孙子们又是开心又是厌恶地见识了佩特鲁斯的企盼、掩藏和忘记对他的轻蔑的本事以后,见识了在每次会见结束时他都表现出来的讨价还价的本事——声音优美、脸色虔诚——以后,在听完关于讨论和他们大而化之地接受了条件的钉是钉铆是铆的纪要以后,懒洋洋地摇了摇头说:所记不差。但天公不作美,政府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宣布拉托雷宫为历史文物,把它收归国有,并出资聘请一位国内历史候补教授住在里面,定期写出关于漏水、杂草孳生和潮涨潮落与水泥的坚固性之间的关系报告。教授名叫——虽然此时他还名不见经传——阿朗苏鲁,据说曾经当过律师,当时已经没事儿干了。

迪亚斯·格雷依只在近处看见过佩特鲁斯的女儿两次。第一次是他们在造船厂之港的这所房子里刚安顿下来、女儿的母亲去世以前。当时约摸有五岁的女儿的一条大腿被鱼钩钩住了,如果佩特鲁斯在家,肯定会用自己的汽车把她送到科洛尼亚医院去看,那要穿过圣玛利亚,情愿让小孩多流点儿血,而忘掉在新建的广场对面挂出了一块医生的招牌,并且对所有试图提醒他的人的话充耳不闻。然而,老头子,当时的佩特鲁斯——跟现在的佩特鲁斯是同一个人,只不过络腮胡子是黑的,又粗又硬——大概正在省会里,正在同未来可能的股东们的会议上算着账,或者正在欧洲购买机器,招聘技术人员。因此,女儿的母亲或那个当值的姑姑或者姨妈就必须处理这件事。各种可能性都有:死亡,变癩,佩特鲁斯疯狂的报复……“而且,大夫,一想到她父亲一直禁止她到钓鱼码头上

去……”老头子把那个当时还只是在一道土墙上支了个篷子的地方叫做码头(虽然那时早已经开始用石头在河两岸修建码头了),最大的可能是,他用铅笔勾描第一张草图时就把那个地方写成码头了,或者当他带着满脸瞧不起的神色走近岸边去察看和购买地皮时就把那个地方想成码头了。谈到渔民嘛,当时只有波埃特斯一个,后来他成了贝尔格拉诺之家的老板,那时他独自住在靠近河边的茅屋里,因为跟他父亲赌气或吵架,也说不定他用作借口的这两件事都有。

午睡的时候,除了围着一动不动的波埃特斯、怀着各式各样的渴望心情为他助兴的小女孩、小女佣和那条狗以外,没有更好的娱乐了。波埃特斯挥动了一下钓鱼竿,听见一声奇怪的叫喊。那叫声与其说是因为疼痛,不如说是为了通知。他几乎没有弯下腰去看小女孩的大腿——他知道自己不敢。他让小女佣去向家里报告,自己剪断了连着鱼钩的线,拿起鱼竿、鱼饵筒、用树枝做的极为原始的鱼竿架、坠子、铁丝和软木,脚底抹油溜了。

大家找到小女孩时,她一动不动地坐着,没有哭,狗正伸出可怕的舌头在舔她。母亲、那个姑妈或姨妈、女佣、花匠和在家里帮着修房子(房子完工已经两年了,但总在改建)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人,以及另外一些胆量更小的人——泥瓦匠,也许还是木匠,他们正在修建造船厂的大楼,当时正在横七竖八地堆着的大梁和砖垛上吃午饭——谁也不敢去拔掉扎在小孩的后大腿靠近屁股的地方的那个鱼钩。

一张张脸轮流凑上去说些“当心”、“动动”之类的话,倒把小孩

吓坏了。镇静下来后,安赫莉卡·伊内丝又笑了,思想重新到自己的神秘世界里休息去了。她大约结结实实的,被太阳晒黑了,两只又大又亮的呆板的眼睛眨个不停。这是一个没刮风的下午,她的两根绳子似的又硬又牢的辫子却晃个不停。抢救女孩的最初几个动作弄出的水渍快要干了,但在正午的阳光下仍闪闪发亮。迪亚斯·格雷依后来这么推想:被那个细细的鱼钩钩住的地方,鲜红的血流个不停;形状像半边铁锚的银色的鱼钩,已经连在小孩的肉体和灵魂上了,不能拔下来了,而实际上一拔就下来。

呼喊和预言声中,母亲或姑妈(姨妈)深知自己的责任,想着佩特鲁斯将把两道黑眉毛拧在一起,疯狂地咒骂或者一声不响时,不由得一阵发抖。于是,她听天由命了,作出了选择。人们用一块丝头巾捆住小女孩的大腿,负责修建造船厂的工头开车,母亲和姑妈(姨妈)陪着小女孩走过那段长长的、软绵绵的泥路到了圣玛利亚。

迪亚斯·格雷依刚刚开业,对佩特鲁斯这个名字日益增高的声望无知无觉。人们反反复复地对他念叨着这个名字,仿佛在谈一位显贵,谈一粒神奇的芝麻和一场大祸。那天,拥进他诊室的人们那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歇斯底里,把他吓了一跳。后来,在科洛尼亚开业几个月以后,这种歇斯底里对他来说就是正常的歇斯底里了,就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可以预见得到的歇斯底里了。

小女孩躺在小床上,天真地笑着,圆圆的脸蛋朝着房顶,兴高采烈地指着鱼钩。一个又一个女人,穿得乱七八糟,脚上蹬着没有后跟的大鞋,乳房高耸,头发漂亮而浓密,跟纯种牲口似的。她们对自

己一无所知，只知道世界上那一丁点儿与己有关的事情。这时她们一个接一个地唉声叹气，压着哭声震耳欲聋地诉说着，要不就一声不响地倒退着离开小床，把宽大的后背和滚圆的屁股撞在墙壁上。在那里喘息一阵，自言自语评论一番后，又围到小床跟前去了。英国工头简洁地摇了一下头，拒绝坐到那个小候诊室里去，他靠着门，没有说话，浑身冒汗，表现得无比忠诚。

上过麻药后，迪亚斯·格雷依在女孩的大腿上割了个口子，把那个S形的鱼钩送给母亲或姑妈（姨妈）作纪念。他那两只灰色的玻璃球似的眼珠，盯着微微闪亮的镊子，两手忙个不停，没有停一会儿。因为他把刀子扎进去很深，割的口子很大，用纱布厚厚地把大腿包了起来。他一句话也没说。小女孩躺在床上，头压着扎得紧紧的羊角辫，黑乎乎的圆脸从来没有沮丧过，只露出等待旁人行动或者等待不可避免地产生原先的感觉的习惯表情。姑妈或姨妈的女儿死了，害死她的凶手就是这么手脚不停，一刻也没停过。在第一次躺在这种小床上很久之前，她就不懂得、永远不懂得死是怎么回事。

第二次已经是在迪亚斯·格雷依平平静静地知道了佩特鲁斯这个名字的含义以后了。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个回忆了，或者说，那个经历过的时刻已经忘了，想不起来了，被对一幅医生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谁画过的图画的回忆取代了。

这幅图画纹丝不动，准确无误，颜色涂得稀奇古怪。图画若有若无，那个情景在一百年以前曾经发生过或者被记载过的感觉，说不定是因为照着它的黄色灯光过于昏暗的缘故。

佩特鲁斯老头子站在中央，直挺挺的，听任他的络腮胡子由灰转白。他没有笑，但表现出久经沙场和颇有涵养，证明他能够笑，两只眼睛冷静专注，青春活力不减当年，左手拿着一支刚点着的哈瓦那雪茄，贴在背心上，雪茄的香味儿，跟地形图离不开时深时浅的黄颜色一样离不开那幅图画。照着图画的灯光，跟地形图上的黄颜色一模一样。

似乎一个小孩可以把佩特鲁斯老头子的画像剪下来贴在本子里：当时所有的人都以为老头子在摆姿势让人画像。他一个人在那里，没有别的布景，只有沙发椅子的拱形靠背，佩特鲁斯装模作样地把右手撑在椅子背上；还有竖着挂在墙上的盘子和放在壁炉上的啤酒坛子。佩特鲁斯的右边，进入光线的只有压发帽的一角和半边圆的面颊；两个粗大结实的膝盖，那是女儿的母亲或姑妈（姨妈）。迪亚斯·格雷依忘了佩特鲁斯丧偶的日期了。在佩特鲁斯的左后边，两个黝黑的女人，虚情假意的脸上显得很激动，围着一把巨大的、不舒服的沙发椅子。椅子上，安赫莉卡·伊内丝大汗淋漓，无缘无故地笑着，她的两条腿都裹在皮褥子里，过分宽大的正方形下巴无精打采地、犹犹豫豫地向上仰着。佩特鲁斯的背后，壁炉的火苗静静地闪着。那是秋天的一个宁静、暖和的下午，当然也是图画上的。

女孩子大约有十五岁光景，吃午饭的时候，晕过去了，因为在梨里发现了一条虫。这时正坐在沙发椅子上朝两边的扶手摇过来晃过去，神秘的宽脸是恬静的，淌着口水，嘴边沁出一圈汗珠。这年，她的两条辫子更粗了，辫子尾巴已经支棱不起来了。

佩特鲁斯突然地对迪亚斯·格雷依说，那辆到圣玛利亚去接他的汽车正在听候吩咐送他回去。在台阶上，佩特鲁斯抓着医生的一只大胳膊——既不友好，又没使劲儿。脚下的花园仿佛睡着了，花园的两边是对称的，有点儿零乱，绿油油的花草很是丰茂。那时已经开始在花园里摆放白色雕像了。佩特鲁斯停住脚步，带着同样的自豪感看了看下午的天色和造船厂的大楼，仿佛二者都是他创造的。

“我将把酬金给您送去，大夫。”迪亚斯·格雷依知道，出于对医生的微妙感觉和为了把女儿的健康同关于钱的想法分开，佩特鲁斯在那个时候是不会付给他钱的；许下付钱的诺言也是为了让迪亚斯·格雷依别忘了，他的时间和才智都是佩特鲁斯可以花钱买的。“我的女儿，大夫，是完全正常的。我可以把欧洲第一流的医生签署的诊断书给您瞧，他们都是教授。”

“用不着。”迪亚斯·格雷依说，轻轻地把那只抓着自己的胳膊的手推开。“我是因为出了这个小事故才来给她检查的，这个小事故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是这样。”佩特鲁斯表示赞同，“正常的，完完全全正常的，对您和整个城市来说都是这样，对全世界来说也是这样。”

迪亚斯·格雷依摸了摸正在闻他的鞋子的狗，下了一级台阶。

“当然，”他回过身子说，“不仅在欧洲医生们获得学位的时候才举行宣誓仪式，也不光是教授们才宣誓。”

佩特鲁斯拿开搁在胸前那只捏着古巴雪茄的手，深深地鞠了个躬，双腿并得紧紧的。

“我将把酬金给您送去，大夫。”他又说了一遍。

两次见面的情形就是这样。还从远处看见过几次，是在圣玛利亚教堂门口，那时，自从在梨里看见虫子晕过去那天下午开始，她就像个成熟的女人一样大了。她在城里几条街上买东西，起初是由一个姑妈(姨妈)陪着，后来就由女佣何塞菲娜陪着了；自从在造船厂之港完全定居下来开始，何塞菲娜就专门伺候她了。

从远处看，姑娘似乎能印证佩特鲁斯老头子收集的全部诊断书。姑娘高高的，圆乎乎的，胸部丰满，屁股很大；那条穿了多年的宽大的深色喇叭形短裙子，都无法按那位裁剪裙子的单身女亲戚的心愿使它显得小些。她的皮肤雪白，如果没有那个转动缓慢的粗脖子帮助，那双明亮的灰眼睛似乎不能左顾右盼。她一直留着辫子，最近几年把辫子盘到了头上。

有人说，姑娘会无缘无故地突然爆发大笑，笑起来很难止住。但迪亚斯·格雷依从来没有听见她笑过。因此，当姑娘被她的亲戚、被某个不常见的女友或女佣拽着穿过城里的狭窄的街道的时候，她那沉重的身体能体现并告诉医生的一切，唯一能引起他那睡意蒙眬的职业好奇心的一切只是她走得很慢，很费劲。假装悠闲自在。

迪亚斯·格雷依从来没能确切地知道，安赫莉卡·伊内丝走路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她的两只脚谨慎地向前挪动着，前脚掌没完全落地以前后脚绝不离开地面，脚尖微微向上跷起，也许是仅仅给人一种跷起的印象。她一直挺胸凸肚，全身向后仰着，这样，胸部和肚子便显得更圆了。好像她始终走的是下坡路，要把身子朝后仰着以

便像模像样地下坡而不用小跑，起初迪亚斯·格雷依这么想。然而，不完全是这样，或者有点儿别的原因。一天下午，他发现了“迎圣游行”这几个字，比较接近实际。她迈的正是迎圣游行的步子，或者说从那以后她迈的就是这种步子了；姑娘移动着她那几乎不摇不摆的沉重的身体，步履艰难，既要保持宗教游行的缓慢，又好像负载着一个看不见的重物——十字架、大蜡烛或者华盖旗杆。

造船厂之五

码头上，拉尔森带着对寒冷的狂怒，决定什么也不想，径直往船厂的大楼走去。

这是个晴朗的早晨，又灰又蓝，柔和的光线恬静、专注，一点儿也不急躁。稀泥地上的水坑面上结了一层冰霜，亮晶晶的照得见人影。远处，农场里的稀稀疏疏的几棵树苍翠欲滴。拉尔森停住了脚步，企图弄明白眼前风景的含义，他侧耳细听，四周一片沉寂。“这是害怕！”然而他已经不担心了，仿佛是轻微的疼痛，是慢性病的熟人和同伴。实际上，人是不会因为那种慢性病而死的，而只可能跟它一块儿死去。

他回头看了看肮脏的、风平浪静的河水，然后使劲把钥匙弄得丁当乱响。钥匙串儿把屁股上那个口袋都挤变形了，上面可笑地、孩子气地挂满了钥匙。这些钥匙象征重要、统治和占有。他把门一道道打开，只看一眼就挑出一把合适的钥匙，精确地翻动着手腕。大门是铁的，难以转动；通往各个经理室的那道楼梯的门，几乎跟真有那么回事儿似的，过了这道门后，已经到了楼上，到了他的办公室

那道破破烂烂的、龌里龌龊的、冷冰冰的门前了。那些没有玻璃或者没有木板的门上面安着装样子的锁头，实不堪轻轻的一击或者风冷不丁的一吹。加尔维斯毫无目的地齧着牙齿，愉快而顽强地在每天黄昏设法把门关上，每天早晨又设法打开。

此时拉尔森已经在总经理室里了。他坐在自己的写字台前面，把肩膀贴着椅子的弹簧靠背靠在墙上养神，不是因为过了风雨交加的一夜，也不是因为在夜里做了那件事，而是因为对那些还不清楚的即将动手干的事情和行动感到疲乏。将要一件接一件地干了，毫无热情，仿佛光动手不动脑。他双手托住后颈，黑帽子压在一只眼睛上，一桩桩一件件地回忆着那年冬天里完成的每一个小任务。似乎为了说服一个冷眼旁观的见证人：这个支离破碎的房间可以同同一个资财巨万的生气勃勃的公司的总经理室相媲美。门上挂着铰链，涂着字迹，窗台上放着纸箱子，油毡地毯千疮百孔，卷宗按字母顺序排列着，写字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呼唤其他职员电铃百按百灵。除了看得见指得出的以外，尽管并非不同需要，还有工作的时间和在办公室里进行的贪得无厌的盘算，以及他那假设出成百上千工人和职员的幽灵的持之以恒的意志。

“也可以利用表面上进行辟谣的办法。”在无聊的、漫无边际的遐想中，拉尔森这么想道。黄昏时分，一辆卡车停在尽头，两个动作缓慢、从职业角度看是令人反感和不可相信的汉子朝办公楼和库房中间正对着加尔维斯一家的窝棚那块空地走来，同正在等候他们的加尔维斯和孔茨会合。有时，他们也同他拉尔森本人会合，当他参加会见时，总带着一副固执的责备和轻视的表情听那有条不紊的讨

价还价，仿佛他是法官而不是同谋。

四只或者五只手举到太阳穴，互相问候，然后一伙人踩着稀泥，一直走到库房门前，一声不吭地钻进阴影中。客人们冷淡地挑选着，不让谁为他们指指点点。孔茨把一件东西拖到从屋顶的破洞里漏进来的光线底下，它并不是被选中的，而仅仅是被一种质问和蔑视的口气点了名。乘卡车来的两个汉子走近一两步去看看，脸皱成了一团，一个朝另一个几乎是不忍心地示意——话都省掉了，好多地方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他们要找的和向他们提供的不是一码事儿！

加尔维斯坐在随便哪堆废铁上，对着空气龇牙咧嘴地听他们说话，点着头。

当来人装着挑完了他们需要修配的东西的无穷无尽的清单上列的品种时，孔茨用一只手按住那件东西，解释它的优点、它的钢材的质量、它技术上的可取之处以及为什么它能适合客人们的需要、适合世界上任何一种需要和兴趣。拉尔森总是居于二线，待在以那件东西为中心的圆圈外面一米左右的地方，看着孔茨那麻木不仁的脸庞，听着他用那单调枯燥的外国口音把谎言传布到库房里的静止的、灰蒙蒙的空气中，仿佛在不厌其烦地历数着显而易见的特征，好像在一座工业学校里讲课，除了让人听懂之外，没有别的兴趣，不抱别的希望。讲演结束了，孔茨把按在那件东西上的手收拢回来，做个告别的姿势，然后离开那件东西，离开那个圈子，离开交易。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沉默，有时候这种沉默会被狗叫声或风声打破。乘卡车来的两个汉子无言地相互看了看，交换了一个惋惜的笑

容,摇了摇头表示拒绝。

这时,加尔维斯出场的时候到了,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虽然不愿瞧他。加尔维斯同意做沉默的主人,并让沉默延长下去。两个汉子一副高人一等的神气,站在离东西一米远的地方,跟东西一样一动不动,硬邦邦的。孔茨靠在贴墙的货架上,不见了,好像脱离那个场面已经年深日久,离开十万八千里了。也许,拉尔森冷眉冷眼地躲在阴影里,穿着那件黑色的厚大衣,嘴抽搐着,成了一种固定的姿势,化成了耐心。谁也没动一下,东西不再是圆圈的中心了,被加尔维斯的秃头和笑容取代了。终于,他蹲在地上开了口:

“请先说说你们感不感兴趣吧,东西就是这个样子,跟你们说的那样毫无用处。你们要一台钻机,钻机就在这里了。这不是没用过的,但是也不咬人。在清点时,扣除了折旧费等等一切之后,它还值五千六百。请说要还是不要吧,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哪!你们说给多少吧,就是说出来让我们开开心也好嘛!”

两个汉子一个说,另一个则表示赞同。加尔维斯那两排长长的牙齿全露出来了,仿佛那是他的脸,或者至少是他脸上唯一表示出某种意思和能够理解别人的那一块儿,他等着那个总是在一句结结巴巴的话结尾时沉重地、以敲定了的语气抛出来的飘浮在空中的数字。那时,他就笑出声来。按他决定收取的价格加上百分之二十报出最后价格,然后冷冷地听着买主们提高独白的声音,抱怨着、平淡无奇地咒骂着起初的报价,一直数落到考虑好了的极限。这阶段,客人说话的时候不互相看了,只看着那件东西,仿佛讨价还价是在

他们中间进行的。

价格终于谈妥了。加尔维斯拿着一个收据本和一支铅笔站了起来，打着哈欠走近那件东西，它在屋顶漏进来的光线底下闪着肮脏的光亮。

“我从来不节外生枝，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运费算买主的。”

然后三人把钞票分了，再也不提那件事。这种情形每个月发生一次或两次，不过他拉尔森从来没有牵连进对佩特鲁斯或者对股份公司的盗窃中去，他只拿他的一份，在举行千篇一律的盗卖仪式的时候，他只是一声不响地、仇恨地观察那两个买主，总是拒绝搭手帮助他们把刚买到的东西装上卡车。

这是个晴天的寒冷上午，九点钟时，拉尔森听见孔茨和加尔维斯来了，便摘下帽子，脱掉大衣，等着他们弄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又安静下来以后，他使用不容混淆的铃声呼唤他们。首先是谁也没叫，然后还是谁也没叫；首先叫技术经理，然后叫行政经理。他没有请他们坐下，故意慢条斯理地对他们说，佩特鲁斯在圣玛利亚，法官已经解除了对造船厂的干预，以前宣布过的或者预感到的壮大和成功的日子已经开始了。说话的时候，他闪射着故弄玄虚的眼色，故意装得热情洋溢，有意拖长语句间的停顿。他知道他们不相信他的话，但没予以理会，也许这正是他寻求的。将近中午时分，他拿着一个显眼的卷宗到库房里去了，偷了一个安培计。回旅馆的时候，他同加尔维斯的女人打了个招呼。她正在窝棚周围捡树枝当柴火，听到拉尔森对她说话时站了起来，笑了，她依然穿着那件男大衣。正午，天空凝重湛蓝，她的肚子鼓得快要爆炸了。贝尔格拉诺之家的

老板波埃特斯的一个朋友对安培计有兴趣，拉尔森收到四百比索，留下两百比索清了账。他在那里吃了午饭，望着咖啡杯筹划到佩特鲁斯的别墅里去作一次访问，天黑的时候会见安赫莉卡·伊内丝，先在凉亭里，后在他从来没有进去过的屋子里，闯进屋子去的结局就是订婚，由佩特鲁斯老头子祝福，他在天黑之前就会乘船或汽车到了。

可是，她，安赫莉卡·伊内丝没给他时间。下午四点或五点时，拉尔森在经理室里查阅一份潮迹斑斑的用打字机打出的报告，报告是一个看不出名字的前任总经理签署的，建议卖掉股份公司的全部财产，用剩下的钱建立一支小小的渔船队。这时，技术经理孔茨轻轻地敲了敲门，带着猜疑、嘲讽和一丝不能没有的忧郁笑容走了进来。

“请原谅，有位小姐想见您，而且不管您说见还是不见都没用，因为她无论如何要找到您。加尔维斯想拦住她，不过我看拦不住。我是让她进来呢还是让加尔维斯拦住她呢？”

孔茨靠着写字台站着，脸上只剩下忧郁的笑容了，脸周围全是银色的胡子茬。门一下子被推开，那个女人已经站在办公室里了。她停住脚步，喘了口气，放声笑了，刚一笑又停住。

故事里的这一段是出于对一个幽灵的忠诚而写的，没有证据说明它是真实的，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都表明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孔茨肯定地说他看见了，听见了。好几个月后，女佣只是承认说，“小姐有点儿不合适”。那时，孔茨关好总经理室的门，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去了，留下姑娘和拉尔森关在屋里。孔茨的一只眼睛朝加尔维斯

挤了一下，坐下看他的集邮簿去了。加尔维斯的两个手肘压在两本账簿上，那是他从铁架子上搬到写字台上来的，他连打都没打开，此时，他正从一个窟窿眼里看着蓝色的天空。

他们说，他们还没来得及做多少事，就听见隔壁乱开了。在喊声响起来之前，听见了拉尔森的声音，他以规劝的口气痛苦地为自己辩白。他的语调低沉，显然是想使对方相信，好像不光是在同姑娘谈话。不难想象得出，他站着，五个指尖触着写字台，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表现出无比的宽容，他列举了一打加尔维斯和一打孔茨，说明耐心带来的好处，懂得信赖和等待的人才能得到报偿。孔茨心里想，在佩特鲁斯老头子用欺骗的手段召集的某次股东大会上，那些哈欠连天的股东情愿为建立公司付出任何代价，但求饶了他们。

但是，拉尔森需要喘喘气，或者寻找一些那个姑娘能听得懂的理由。这时，总经理室里一片沉寂，除了孔茨想象他听见的加尔维斯咬指甲的细小的声音以外，没有一点响动，而且咬指甲的声音也不比冬天黄昏的空气在河流和田野上空的平缓而剧烈的震动的声音更响。后来，喊叫声响起来了，一个和另一个的叫声响起来了。姑娘的叫声跟唱歌似的，声音出奇的纯正。拉尔森则反复说：

“我凭最神圣的上帝对你起誓。”

姑娘的声音好像是争吵的一个缘由，就像一条银色的鱼跳在空中打个滚儿似的。孔茨听见了，或发誓说他听见了：

“跟这个脏东西，这个脏女人。”

然后,她对着门叫喊并把门打开了。

“别碰我,您瞧。”

肯定,拉尔森只是想挽留她,或者以温柔来在那场冲突中取胜,或者掩饰那场争吵。因为按孔茨那无可比拟的说法,他把加尔维斯从目击者里排除了,因为加尔维斯荒唐地“在整个这段时间里都看着窗户上的破洞,咬着指甲,没露出听见和知道发生的事情的表情来”;那个姑娘,就是安赫莉卡·伊内丝,快步——没有跑——走出总经理室,昂首挺胸,身子向后仰着,一个肩膀撞着灰粉脱落的墙壁,从放着不多几件家具和蜷缩着两个人的空旷极了的大厅里一穿而过。两个人待过的那两个方块,油污少点儿,原来那里的几米薄木板的护墙,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了。

“她穿过整个破破烂烂的大厅的时候,都没瞧它一眼,就跟来的时候一样。母亲、姑妈(姨妈),总是习惯把她打扮成小姑娘。今天下午却打扮成妇人了,身上穿着一件长长的黑色连衣裙,里边的内衣、衬裙或其他东西都透出来了,脚下蹬着一双后跟高极了的鞋子,也许是人家借给她的,也许是刚刚穿上的,肯定不再扭脚了。因为她,她们,是从别墅走到船厂来的。那双鞋,对任何没看见过她穿不带后跟的鞋走路的人来说,都会认为她只能那样怪里怪气地走路,像肥胖的女人、怀孕的女人似的趑趄趑趄地走。不过,有趣的是,我费了点儿时间去看——如果我能不嫌恶心地去看的话,将多看一会儿的是:她的连衣裙的前襟耷拉下来了,没有扯脱,但是掉在那里了,让我接着说吧。她摇摇晃晃,踩着霉烂了的木地板,踩着一摊摊污痕,踩着蓝色的图纸,踩着业务信函,踩着雨水和时间留下的污

迹。她在冬天发霉的空气里走着，高昂着梳着辫子的油光闪亮的头，不是为了挑衅，只是因为无知。她的脸上带着淡淡的、令人迷惑不解的微笑，没有看见我们，没有闻见老鼠和失败的气味儿。她背后，一个小丑，一个肮脏、年老、肥胖和急疯了的男人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招了几下手，但是又没有胆量出来，没有吭声，怕我和那个加利西亚人听见。这一切，要知道，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事情，说来话长着哪！所以我刚才说了老半天。然而，对一个不在场，没有亲眼看见那个情形，不知道她和他是谁，造船厂是怎么回事儿，不知道我是谁——我是在本国出生的，但拿的是有效的欧洲护照，当时住在那里，用那种手段谋生——的人来说，解释也没用，或者几乎没用。您要是能够的话，想想看吧，这不难想见，一个年轻健壮的女人，飞快地从一间没完没了的差不多空空如也的办公室的一侧穿过，但是没有跑，两个罕见的美妙的大乳房挺在空中，连衣裙的前胸襟不是被拉尔森那个可怕的魔鬼扯下来的，而是她自己拽开的，没有拽掉一颗扣子，也没扯断一根纱线。她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我不再摇头了。女佣抱着大衣站在那里等她，踮起脚尖把大衣给她披在肩膀上。我相信她打了女佣一个嘴巴，好像是女佣唆使她、给她穿了那件衣服和带着她来的。现在，女佣又平静地伸出胳膊搀着她走了，母亲般的对刚才的丑剧又是痛心又是愤恨。而那个女人，姑娘喊叫着说的那个肮脏的女人，据我所知道的一切来看，不可能是别人，现在说出来不碍事了，就是加尔维斯的女人，当时她怀孕已经九个来月了。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这就是孔茨的说法，至少是他的说法的基本内容。他对法维里

神父和对迪亚斯·格雷依大夫都说过,两次所说的没有什么大的出入。然而,您别相信这种说法,他的这种怀疑仅仅是建立在他对安赫莉卡·伊内丝的了解的基础上的。而这种了解,是他几年以后才获得的。也别以为孔茨——也许他活着,也许会看到这本书哩——是有意造谣。可能孔茨把安赫莉卡·伊内丝的造船厂之行看成纯粹的桃色事件了,可能他的独身生活和同加尔维斯那个当时可望而不可即的女人的频繁接触使他事先就形成了这种看法,也可能他看见女佣用大衣把姑娘裹起来时对先前发生的事情产生了错觉——他当时想象,那是给她遮羞,而不是单纯的防寒。

窝棚之五

拉尔森的堕落,说到底,是他的品质的堕落,而不是品质的改变。前些年,他可能以更大的活力、更狡猾的手段去缠那两个女人,他在心里把那两个女人分别叫做“小疯子”和“怀孕妇人”。但他不可能做出其他事情。即使是个年轻的拉尔森,他也不可能不能在不能保证把搞出来的假股票放在佩特鲁斯老头子的写字台上或者手心里的时候去见他。可以肯定,年轻的拉尔森——谁也不能精确地想象出他的模样了,跟现在这个一样,只是在那个摆着雕像的花园里,在那个冷风无情地吹、犬无情地吠的凉亭里,在那一阵阵他打定主意一言不发的无法打破的沉默里拐弯抹角地取得并保持一种滑稽的、不正当的优势。这同一个拉尔森更为容光焕发、更主动,没有那么虚伪,绝对没那么讨厌——可能会帮助穿大衣的女人,就是加尔维斯的女人,她挑水、烧火、洗肉和削土豆,还养着两只肥壮多毛的狗。

终于,他脱掉了合身的大衣,摘下了帽子,头顶并不像人家以为的那么秃,一缕灰色的头发搭在那伸向雾气腾腾的几口锅的前额

上,在缓慢而熟练地操刀切菜。在要紧的地方,两个拉尔森一模一样,那个拉尔森可以是这个拉尔森的儿子。年轻的拉尔森只是比这个拉尔森更性急,而这个在小窝棚的一个被叫做厨房的角落里新奇地切着菜的拉尔森则比另一个拉尔森更会装蒜。

这样的日子没有多久。拉尔森帮着做饭,跟狗一起玩耍,劈木柴。他那肥大、溜圆的屁股永远选定了那个地方——充满烟味儿的暖烘烘的那个角落。他坚韧不拔地削着土豆。并提出关于加什么作料的建议。他看着那个女人的大肚子,用恶心来避免产生任何形式的心猿意马。他从来没单独向她说过一句她丈夫拈花惹草的话。那段时间,他变得愉快和健谈了,时而大惊小怪,装出基督心肠,显得易动感情,时而表现出一副槁木死灰的样子,装得老态龙钟。

据传,他没有等待多久,尽管他拉尔森做好了等待一百年或至少不去想他在等待的思想准备。他虽然肥胖,却很利索、殷勤,随时准备表示出同情的样子来,毫不吝惜地卖弄着他那多年剥削女人和同女人厮混时毫不费力地潜移默化来的令人作呕的种种虚假情意,因为他以后再不会需要她了。

这是七月底的事情了,当时人们已经对冬天^①习惯了,知道从它那隔绝和催化万事万物的神秘的、轻柔的刺激中寻找乐趣。距离仇恨冬天的日子,距离生长出第一批看不见的蓓蕾——它们使我们急不可待,它们对冰霜和沉重的云块深恶痛绝,它们是漫长的春天的那些被流放了了的、怀乡病缠身的儿子——的日子还早着哪!

① 南半球的季节和北半球相反,七月是最冷的时候。

晚上,女人和拉尔森差不多总是单独在一起。因为加尔维斯一吃完晚饭就离开小窝棚,或者不在小窝棚里吃饭,他现在几乎不笑了。没有笑容,他的脸好像不是他的了,死了。摘除了那白色的面具,他的脸上袒露出孤独、沉思和放浪形骸的表情,厚颜无耻的样子叫人无法忍受。不多的几个晚上,孔茨待到老晚,不让两条狗打盹儿,想教它们用两条腿走路。不过他是个什么事都干的家伙,总是从中占便宜,从那些还没发生的行动中占便宜。寒冷刀子似的刮着他那微微发红的皮肤,使他的外国口音更浓重了。

拉尔森和女人已经扯到假股票上头了。

“我不能向加尔维斯要。您知道,太太,我不是说他的坏话,他听不进道理,就是这样。随便哪一天他心血来潮就会把它交出去。也许他是为了开心,但还不确实。不过我感到紧张的是,这太冒险了。打比方说吧,他把它交出去了,佩特鲁斯老头子呢,被抓起来了。您知道股东委员会是怎么回事吗?一群乌合之众,简单一句话就是这样。不过是十五或二十来个人,一群乌合之众,如此而已。他们现在让我们有口饭吃,因为他们把我们、把造船厂、把蚀本买卖和埋进土里的钱忘了。可是,当法官签署逮捕令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来了。他们光这样说还不会感到满足,‘佩特鲁斯把我们拖进一件倒霉事里去了,不过忍耐点儿吧,他自己原先也相信那是好事儿,而且确实尽了力的,比我们搭进去的多得多,因为他今天算是完了’;他们还会说,‘这个老强盗和老骗子,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偷我们,现在有好几百万存在欧洲的某个银行里哪’。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我这么说,我是懂得一点的。那么以后会怎样呢?我好像看见

了这个情形一样,您也会明白的,我们的朋友孔茨也会明白的,他们就会像狗一样劈头盖脸地朝我们扑来,把我们洗劫一空,企图从投资的每一百比索中至少捞回一个生太伏^①来。他们当中最无事可干的那个人,某个闲着没事的亲戚,或者任何一个按医生的建议到乡下过一个冬天的人,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从班船上下来,把几张纸摔到我们脸上——如果他不嫌费事的话。那么就完了。完蛋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个家伙就会在下午陪着俄国人走到库房去,同他们讨论价格,收钱,看着他们在两周里把那些货架搬空。因为到那个时候,十五天一次的出让就会变成冬末的大拍卖了。现在您想想吧,假如加尔维斯这么干了,我们大家只好去捡破烂。我们现在也不是很阔绰,但还过得下去。当然,我们有过更好的跟现在没法相比的时候。咱们还是不谈我吧,但是人们第一眼就会认出您来。现在,您在这里有个遮雨的地方,我们每天还有两顿饭吃。而且您的身子也重了,上帝不允许阵痛开始的时候您没有房子,没有这个您不无道理地称之为狗窝的小窝棚。这就是不幸的开头部分,最要命的部分,如果您愿意这么说的话,我不反对。不过,另外您想想看,我们现在处在就要时来运转的时刻,佩特鲁斯老头子就要搞到资金让造船厂重新开工了。不但如此,而且政府还要帮忙,还有由国家担保的向造船厂提供的贷款,还有铁路和其他一切佩特鲁斯脑袋里还没想起来的事情。总之,考虑到您就要临产了,而且现在加尔维斯把股票还藏在口袋里,我建议增加卖货的次数,把钱给您存

^① 一百个生太伏相当于一比索。

起来。说来说去,小孩是无辜的啊!”

她说,是的,但跟她没有关系。加尔维斯那失去了笑容的残忍性,似乎藏到她的眼睛里,藏到她那驯顺的脸蛋上,藏到她一边看着火盆和两条狗的脑袋或空旷的野外,一边吸着香烟的默不作声的贪婪的表情里去了。

“您不明白。”一天晚上,她带着一种奇特的遗憾对拉尔森说。他们单独在一起,她试图修好收音机的一根电线,拒绝让拉尔森去帮她的忙。“举个例子来说吧,您可以热爱或咒骂上帝,但上帝的意志照样实现。而您又是怎样来看待这个的呢?您只有根据按上帝的意志发生的事情得知这一切。跟这个是一回事儿,明白吗?拿他就跟拿上帝一样没办法。好多年前就是这样,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他可以把佩特鲁斯关进大牢,可以烧掉那张股票。但要命的是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不知道他将做哪种选择。我从来不想问他,现在更不想问了,现在我们弄到了这步田地,比这一辈子中任何时候都要糟糕。我这么说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我们现在无路可走了。他一决定某件事情我就知道了,就晓得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就是这样,我知道只能是这样。我们的儿子的遭遇就是这样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您不明白的:您不了解他。我肯定他永远不会用这张股票来把佩特鲁斯关进大牢里去。他相信过佩特鲁斯,相信过他的朋友,相信过他对他编造的关于财产的故事。佩特鲁斯预付给了他钱,替我们出了路费并邀请我们吃了顿饭——其实没有必要,当时我们已经决定动身了。他不光请了他,而且还请我和他一起来。

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也去住贝尔格拉诺之家,这个肮脏的洞

子,照佩特鲁斯的说法,是‘一个摩登旅馆,我的造船厂里的很多高级职员都住在那里’。第二天,加尔维斯就去担任他的职务去了,行政部经理,您知道,因为他自己的功绩,他直到今天还继续担任这个职务。请听着:那天早晨,他问我打什么领带,穿什么衬衣。外衣没有可选择了的,因为他只剩下两件了,只好选择了那件薄的。他去了,比通知的进厂时间早得多就去了。结果见到的就是这个猪圈,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破烂;见到了成百上千,或者成千上万,或者上百万个工人和职员,他们正在享受还没被最先进的法律承认的福利。这些职工是由老鼠、臭虫、跳蚤,也许还有个把蝙蝠以及那个名叫孔茨的英国佬组成的。孔茨被忘记在一个角落里了,他在那里描图纸或者玩邮票。加尔维斯中午回贝尔格拉诺的时候只是对我说,账目很老了,需要加班加点。当时我想,他不是疯了,而是想自杀或者开始自杀。自杀进行得这么缓慢,一直拖到今天。这么看来,他绝不会把股票拿去交给法官。他保存股票不是为了报复佩特鲁斯,仅仅是为了相信,有朝一日,当他愿意的时候,他可以报复。他只是为了觉得自己强大,能够比佩特鲁斯更卑鄙。”

不过,这是发生在拉尔森刚开始勾引那个女人时的事情,离他在圣玛利亚会晤迪亚斯·格雷依、佩特鲁斯和巴连托斯那天晚上不久。加尔维斯仍然在离窝棚很远的地方过夜。拉尔森再三再四地说服那个女人,为了大家的幸福,把那张股票偷来交给他。很快,他的谈话带上了柔情蜜意的口气。他把一只手肘撑在桌子上,心不在焉地伸出另一只手让狗舔着。紧绷绷的黑色帽子戴在头上御寒,嘴里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又红又浓的葡萄酒;他耐心而百折不挠地模

仿着过去勾搭女人的那些卓有成效的独白，慷慨激昂、但又不明说的推辞，不着边际地漫天许愿，夹杂着某些让自己也大吃一惊的威胁，他甚至认为做得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一阵女人变得沉默寡言和满腹牢骚，加尔维斯吃过晚饭站起来，在毛衣外套上一件他的身体撑不起来的蓝色海魂衫时，她瞧也不瞧他一眼，对他那沙哑的问候也不予回答，似乎对他那踩着冻得硬邦邦的泥土发出的响声也听而不闻。她眯缝着因被叼在嘴里的香烟熏得睁不开的眼睛洗盘子，一边洗一边递给拉尔森擦干。

“她是那么美，可又那么憔悴！”拉尔森心里想，“要是她洗一洗，梳梳头就好看了。不过就算是这样，即使让她每天下午都呆在美容店并在巴黎给她穿戴打扮起来，即使我再年轻十岁或二十岁，她又愿意跟我呆在一起的话，也是白搭。她全完蛋了，就像在冬天被烧过的田野一样焦糊和干燥，比我的祖母还要老朽，我敢打赌，她肚子里的那个家伙不可能活着。”

后来，女人把细颈大肚瓶葡萄酒瓶子拖了出来，两人靠着桌子坐下了，谁也不看谁一眼。他们不慌不忙地喝着，抽着。风围着窝棚呜咽着，直往里面灌，把窝棚越吹越凉。夜，静得跟凝固了似的。他们想象，狗摊开四肢朝着一动不动的白云当空的天上，一只只贴近岸边的小船在风平浪静的河面上飘荡；也想象从窝棚这面的木板走到那面的木板的距离，包括在刮风的情况下。然而，拉尔森从来也没猜到，女人纹丝不动是在回忆往事。她躲在大衣的前襟中间吸烟，头发满是油垢，侧着脑袋冲着门口。她住在那里，如此而已，不知道过去的身世，胎儿已经压到了大腿上，再没法朝前拱了。她原

来话就很少,奇怪的是现在差不多只是动动脸上的肌肉,摇摇头算作回答,使对她提出的问题变得索然无味儿。

“父母把我生出来了,我现在就住在这里。”

然而,她的气恼,就连她的沉默,似乎都不是因为一贫如洗,因为眼看就要临盆,因为加尔维斯在查玛梅酒店彻夜不归而产生的,实在没有具体原因。说不定她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盛着好奇心、一个期望的容器罢了。她嘴里在哼着探戈曲,但不能肯定她一直在听;不知道她的微笑,或至少是她那微微咧开的嘴角,是跟拉尔森那缓慢的、戏剧性的演说有关呢,还是跟她对将来的假设有关。“仿佛被遗弃的旧习俗和愚昧无知使她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会发生、现在就要发生、合理的及其千百种难以数计的相反的情况就要发生似的。”拉尔森当下在心里编了这句话。

不过这也不确实,至少不完全确实,而且也不能用来判断和理解,拉尔森这么想。于是,他又喝了一口;起初,把杯子送到嘴边的时候,动作很猛,但随即又用舌头挡住晃动不已的葡萄酒,湿了湿嘴唇,最后只喝了这么一点点,一小口。然后他转脸看着大肚子女人,声音变得更痛苦、更急迫了,然而还加上了一种暗示他决心继续一夜又一夜地等着,直到她理解和让步为止的语气。他已经不提股票这两个字了。此时他想出了种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暗示,提到他希望的目标时,仿佛是在涉及他心神荡漾时追求女人身上最宝贵的那一部分,仿佛他恳求她交出股票就意味着让她不仅仅是象征性地交出她所能交出的一切。

一夜,又一夜,刚开始的时候总还有点儿担惊受怕,后来就渐渐

地放心了,因为她暗示他、让他相信,她的沉默不语,她用头发遮住耳朵但又没有完全遮住——不听,还有那若有若无的微笑,不是别的,而是她用来安排热乎乎、静悄悄的调情手段。有一天晚上,拉尔森肯定,他不小心说出的股票那两个字——也许是文件——也许是这张纸头,使那女人的朝着他的面颊,总是同一边的面颊,左边的面颊,轻轻地红了一下。

“您想让我把那张纸从他那儿偷来交给您,这样就一切都解决了,我们继续卖机器,混饭吃。可是他,要是现在发现没有这个文件了,将会感到更加孤独,比我死了还要伤心。实质上,他不爱我,他爱那张绿色的道林纸,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把它放在心口上。我不是说他真爱那张纸,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比需要我更需要它。我不会吃一张道林纸的醋,也不会因为他为报复而另有所爱而吃醋。”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查玛梅酒店倒真有,虽然拉尔森从来没有把这个龌龊的地方用来加强他的独白的说服力。

刚修起来的时候,那个地方可能是用来放工具、农具和袋子的,用来遮蔽散发出的木柴的烟味儿,鸡笼和陈年油脂的气味儿的。这种气味儿比朽木、烂果和牲口的气味儿还要难闻得多。这种小棚子只有一面或两面用砖头砌起来的墙,墙似乎从来就是旧的。业余泥瓦匠砌的这些墙,跟仿造的废墟一样。其他的如椽子、顶棚、隔板等,都是毫无建筑学知识的人单凭耐心安装的。这个废弃了的小房子孤零零的,在一块土地的边沿上,显然它原来并不是任何住宅的配房。

查玛梅酒店离造船厂有五六个街区,坐落在一条宽阔的马路

上,那时军队就沿着这条马路出操。现在,自从把塔布拉达港迁走以后,这条路就没用了,泥路地面上一个马蹄印儿也没有了,偶尔只有一个单个儿骑兵或一辆单座两轮马车摇摇晃晃、吱吱嘎嘎地经过这条一边是河岸、一边是衰微破败的小农场的路,或者有个把——差不多总有个把因健康原因,因患某种巫医堂阿尔维斯无法医治的毫无神秘之处的疾病必须乘船到圣玛利亚去的人从那儿经过。从那条路上经过的人没有一个是去买东西或者卖东西的,没有一个是带着钱的,一个都没有,甚至连想花钱的人也没有。

在牲口贩子活跃的那段时间,查玛梅——那时还没有名字,也不需要名字——挂起了两盏灯,一盏挂在门口上方,另一盏挂在一根椽子上。那个唯一的店门用粗麻布帘子挡着,里面支上了一个柜台,柜台是用马鞍架支起来的几块凹巴巴的木板,柜台上放着一瓶甘蔗酒、几瓶杜松子酒,一个长得像印第安人的、喋喋不休的老头,腰里露出个刀把——也许只是个刀把,总是穿着衬衣和马裤,左手拿着一个碍手碍脚的马鞭子,其实,他肯定在许多年前就是靠双脚走路的了。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堆牛皮,灯光几乎没有照到它。

这就是当时的查玛梅的一切,这样也就够了。当挂上“查玛梅酒店”的招牌和一块写着“店主易人,大为改观”的小牌子——字是写在一块木板上的,木板歪歪扭扭地钉在一棵长在拐弯的地方试图划分出马路和便道的界限的矮小的芭蕉树上——的时候,没有增添多少东西,除了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和几个瓶子之外,在那过去堆牛皮的角落又挂了一盏灯,又放了一个乐师们坐的矮木头台子,在一条吊着的绳子上挂着另一块牌子:“禁止携带和使用武器”,字体又

大又醒目,其实毫无必要,挂在那里是为了讨好长官的。长官是个佩着班长军阶的大兵,每天晚上都把他的马拴在拐角处的那棵小树上。

老头儿甚至不必动用他腰里的刀把,他只是从柜台挪到任何一张不撵他走的桌子边上去呆着,在那里来回乱动,口若悬河,但是话题不外乎酒店命名以前他本人经营的那些东西:木板、灯、瓶子。他狡猾,跟夜猫子似的,从天一黑到第二天凌晨,一直等待着插进一句“这使我想起了……”的适当时机——而且他从来没弄错过,讲几段他那信口瞎编的陈谷子烂芝麻故事。他跟那位班长一同分享着喝醉不付钱、至少不用钱来付账和从泥地板上拖一条草绳垫子睡觉的特权。拖垫子的时候,一个是堂而皇之地拖,另一个则似乎是亲亲热热地拖。

用不着再补充其他东西,实际上,在争论的时候唯一可以作为价码来辩护的,除了架子上的酒能更快地使人醉倒之外,就是那些乐师、吉他和手风琴了,当然还有其自然而然的结果:桌子贴到了两边的墙壁上,中间的几米尘土飞扬的空地洒上了水,可以跳舞。用不着增添任何其他东西了,因为其余的东西——也就是说,是查玛梅本身——是到此光顾的人每天晚上捎来的。他们,无论男女,每个人都带来七巧板的一个部分,凑成了查玛梅;甚至他们的偶然缺席也为凑成查玛梅作出了贡献,更有甚者,有的还花钱来争取这样做的权利。

从来没能弄清楚他们是从哪儿弄到钱的。佩特鲁斯股份公司几年前就停业了,那个地区的农场又太穷,雇不起长工。也许有个

别人在码头上干活,但超不过三两个人;因为造船厂之港现在只是一个停靠码头,停靠的都是短途小型船只。离得最近的工厂——那些鱼罐头厂,也还在很南边,在圣玛利亚和恩杜罗之间。有一个常客是贝尔格拉诺之家的跑堂;另一个叫玛青,自称是一条船的老板,把船租到恩杜罗去了。其余人则都是无名无姓的,有十二个或者十五个,礼拜六晚上可以多到两打,他们的老婆穿的衣服和涂的脂粉都不可思议,那是一群没有区别的女人,是一堆移动着的颜色、香料和孔洞。她们穿着后跟高得出奇的鞋子或者草鞋,有的穿着舞衣,有的穿着沾着呕吐物和婴儿尿的靴子。

推测他们从什么地方弄钱是荒唐的,任何给他们喝的饮料都是每小杯一比索,每大杯两比索。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本身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谁也不知道这些常客在从乐师们拒绝再次重复演奏并把乐器装入套子的时候起,到第二天晚上那个腰里别着刀的老头子颤颤巍巍地爬上一把椅子去点燃那盏挂在外面的、悄没声儿地向世界宣布查玛梅又准时复苏了灯的时候止,是在什么洞坑里、在哪棵树上、在哪块石头底下藏身的。

拉尔森在一个礼拜六同孔茨一起进去过,没有离开柜台。他又是惊恐又是过瘾地瞧着那些女人,甚至想到,如果有上帝,那他应当用单间小地狱来取代那个想象出来的火焰熊熊的大地狱,根据圣明的判决和每个人的功德,每人分给一间。同时,他又想,这个查玛梅酒店,如果礼拜六的半夜里没有音乐、没有那些直到黎明方才停止演奏、跨在马上要牛排的要命乐师,那就是人们从一开始就给他安排好了的地狱,或者说是他逐渐挣来的地狱,这要看从哪个角度

说了。

无论如何,他无法忍受了,没有接受第二杯酒,也没同意孔茨关于多待一会儿的建议,忍住没往那已经是尘土飞扬的跳舞场地上吐痰;他把痰含在口里,看着别着刀的老头子站在那里,被灌满水的喷壶压弯了腰,正在向乐师们打手势,叫他们别再奏华尔兹舞曲了,痰越积越多,直到走到外边才吐了出去,以免任何人把他那只不过是恶心和有点无可名状的害怕的动作当成挑衅。

然而,加尔维斯近来每天晚上都去。他和那个取代老头子站在柜台后面消瘦的、长发披肩的汉子你我相称。那个汉子几乎一声不吭地照管着每张桌子,动作十分准确,嘴里总是嚼着一片叶子,在烟雾中,在喧闹声和臭味儿里来回走着,眼光明亮而心不在焉,暗藏仇恨。

加尔维斯保守而又略带厚颜无耻地同值勤班长讨论世界的最近前景,说他去过更美好的地方。谈到关于遏制堕落和道德观念的混乱时,他变得大胆多了。他从容不迫地抚摸任何一个没主或其主人是朋友的女人,音乐完的时候就走了,差不多总是酩酊大醉。有时候,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黎明,班长在值勤中没有做出什么重大创举时,他们就一起回造船厂去,在路上把他们喜爱的话题说了个遍,兴致勃勃地重复着旧话,班长东倒西歪地坐在马背上,加尔维斯抓住马镫的皮带,以便互相帮助。

只有在查玛梅酒店,才能看得见加尔维斯时而容光焕发时而冷若冰霜的假笑,才能看得见他那暴突的仿佛是用来呼吸的宽大牙

齿。加尔维斯和那个年轻的、长发披肩的、嘴里嚼古柯叶的老板都不知道,前者的笑容和后者的眼光颇为相似。“这样我就不抽烟也不喝酒了。”老板把他的决定向加尔维斯交了底,但没有说这样做的目的——为了从那些幽灵、从那些组成查玛梅的顾客的为数不多的坟墓里的人身上抠出一万个比索来,一个一个地抠,不管需要多长时间。

由于某种不知道的原因,拉尔森在示意那个女人偷那张假股票或告诉她怎样可以偷到的整个这段时间里,从来没提到过加尔维斯在查玛梅里过夜这件事。

凉亭之四

窝棚之六

在这段时间里，自从闹出笑话那天开始，拉尔森每天下午从六点到七点，礼拜六和礼拜天则从五点到七点去访问佩特鲁斯的别墅凉亭。

他不知道佩特鲁斯在不在家里，当然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对他在凉亭里的约会一无所知。无论如何，那高高的房子在天黑时早早就射出的懒洋洋的遥远的黄色灯光，意味着佩特鲁斯的存在。尽管有时候他对在圣玛利亚旅馆里的会见这个事实产生了怀疑，但一点也不能动摇他曾受命弄回股票的信念，一点也不能动摇他关于有个默契和报偿的信念。他不愿问及佩特鲁斯的旅行，怕每个字都会泄露他的失败或至少是延误。另外，他更隐隐约约地觉得，询问可能意味着猜疑，猜疑佩特鲁斯，猜疑他自己实践诺言的能力；而且，如果笼统地询问便意味着怀疑，怀疑是那些日子里他唯一不能容忍的东西。

女佣何塞菲娜毫不耽搁地给他打开大门，不回答他那些友好和

保证参半的话,走在前面给他带路,有时候独自一人,有时候带着狗。他越来越泄气,仿佛在重温旧梦。最后,每天下午都好像在听讲同一个梦,一个没完没了的、使人头昏脑涨的声音在用相同的话说同一个梦。

现在,在林阴大道上的漫步仅仅是体力上的勉为其难而已。行进的时候,拉尔森惴惴不安,仿佛是怕把一只鞋子踩进污水坑。他想着那口钟,那道栅栏门和在苍茫的暮色中的短暂等待;想着那个黝黑而含着敌意的女佣,有时候她还带着狗,但不管带没带狗都听得见那只狗呆板的金属般的叫声;想着那个荒芜的花园里浓阴盖地的树木,白亮白亮的石像;想着朝凉亭走去时那仿佛被凝重的空气阻挡而变得缓慢、异常缓慢的步履,那个女人表示欢迎的神经质的笑声;想着那十分不可思议的从房子的顶层静静地射出去,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直达天空的高高的黄色灯光。然后又想到她,想到她那疲乏的、永恒的谜,想到他不得不举行圣礼似的向她灌的迷魂汤。

一个又一个黄昏,他在贝尔格拉诺之家房间里对着穿衣镜最后检查自己的外貌时,都觉得凉亭仿佛是一条船,将载着他在水上晃荡一个小时,节假日则是两个小时;她只是询问或倾听,得到他的回答后仅仅报以笑声或沉思。

她是个女人,毫无疑问,而且是个漂亮而难弄到手的女人。在某个地方,这样一种前景正在等待着他拉尔森:他将得到既可保护她又可使她堕落的特权。但现在不是抱有希望的时候,他只能等待。因为寒冷,拉尔森的脸皱成了一团。他把一只手肘撑在石头桌

子上,免得跌下去,几乎对有没有一个佩特鲁斯在房子的顶层、淋浴在黄铜色的灯光和可能是暖烘烘的空气里并陶醉于自己的业绩中都无所谓。他嗓音深沉,侃侃而谈。起初,他遵照先后顺序叙述,没出逻辑和交谈的大格儿。他从他的朋友们谈起,谈了他十年来的生活,某个女人,一个令人生厌的曲里拐弯的家庭礼拜堂,里面的台球房、金银花和分布得很协调的家谱。

因为她听得莫名其妙,只是粗鲁地哼呀哈地回答,半张着嘴——凉亭出口的光亮使她的嘴巴显得不那么难看了。拉尔森很快就不理睬听者了,给自己讲述起那些设法使自个儿产生兴趣的回忆来,讲了一个又一个下午。他兴致勃勃地复述那些不容怀疑的情形,它们依然显得异常新鲜,因为即使是现在,还是没发现驱使他搅和进去的动机。

就这样,在黄昏冰冷的阴影中,拉尔森向似听非听的她,向她那时断时续的、粗鲁的、歇斯底里的笑声,向她那高高耸起的跟两轮圆月似的乳房,毫无目的地讲述着自己的历史。他自言自语是为了争取时间。羞耻和空虚使他的叙述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他信口雌黄地讲着一切的一切,反正她也听不懂。很快,八月二十二日到了。这个日期既无吉兆,又无凶兆,一直把秘密保守到最后。那一天,天空起初有点阴云,但中午前就晴朗了,这样便同前几天的晴空连在一起了,这是那轮懒洋洋的圆月支配的结果。空中没有风,月光冰冷地直泻水面、造船厂和过冬的农田上。

那一天像往常一样,尽管拉尔森后来想起当时曾有过预感、有过一再出现、毋庸置疑的种种迹象,可是他却没有觉察。

六点整，拉尔森离开办公室，先到贝尔格拉诺之家再次刮脸，于七点准时来到佩特鲁斯家的大门前。佩特鲁斯的女儿这一天梦见许多马，或者说编造了一个马群的梦。这段时间以来，拉尔森把安赫莉卡·伊内丝的梦、把她声音娇嗔的只言片语理解为挑衅、理解为强加于人的话题。他确信那笔财产会到手，只要选择合适的故事而不必担心什么，他面带微笑，耐心地倾听姑娘那杂乱无章的叙述。

这一回她讲的是“那匹马把我给舔醒了，它还告诉我，临死之前会有危险”。他等着她讲完，然后他想说说他如何爱马、如何热爱存在于前世的许多事物。他第一次感到这回要失败了。这是个爱情的故事，可他不得不丢下那书里的英雄，很想消失在凉亭的阴影里，强迫自己不为任何人消磨这一个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他谈起自己如何爱马，那是一匹正在换毛又改了名字的马；虽然因为有人出卖，它跑输了，可那是一匹无敌于天下的良马，看看它那四肢、那骨架、那脑袋、那雄姿勃勃的神气，它一下子就成了良种马中的最大骄傲。谈情说爱总是个难题，他无法解释这个现象；如果谈的是听者或读者从来不知道的爱情，那就更难；如果讲述者脑海里只留下构成爱情的简单事实，那就难上加难。

他说起一个冬天的下午，太阳照在跑马场上，观众们狂热地连喊三分钟。他也许看清了一些什么，几匹赛马仿佛永无休止地狂奔；人群从预测到抗议，嗓子喊哑了的朋友们口袋里装着已经分文不值的跑马彩票。他不知道她能否区分、是否明白这些彩票。他不想给她解释诸如此类的用语：看台、名次、跑直线、跑弯道、五十九

分、分红、有限股份。但是无论如何他知道,他是在转弯抹角地谈他如何爱马,谈他如何热爱生活,谈他对往日生活的热爱。八点整,谈话结束了。在凉亭的入口处,他回身给予并接受那嘴唇紧闭的轻轻一吻。

他又重新意识到冬天已经到来,意识到自己的老态,意识到应当得到这艰难与疯狂生活的报偿。他重新踏上通往造船厂的道路,迈着碎步极力绕过积水和泥泞。最后,窝棚里昏黄的灯光终于给他指明了道路。他登上那三层木制台阶,由于蒙在大衣里他没看见窝棚里的女人便跨了进去。那几只狗纷纷跑来闻着他身上的寒气,他一脚一个把它们踢开,很想踹到一个个狗嘴上,最后才把脸贴到墙上挂着的年历上。于是在无意中他才知道落日的时间是十八点二十六分,这天正是月圆时,又是圣母怀胎日。

窝棚里的女人从室外进来,直到踏上地板走了一半的距离,方才听到她的脚步声。拉尔森转身望见她便脱帽致意。他刚明白这一天是圣母玛利亚怀胎日,也许因为这个他的心情才完全变了样;也许是因为这女人的脸庞、双眼和微笑使他变了样。

“晚安,太太。”拉尔森微微颌首道。仿佛有股寒风吹过,他感到一阵心悸。“我从这里经过,进来看看您,听听有什么消息。我可以到贝尔格拉诺之家弄点吃的来。要不然,您鼓起勇气,咱们去饭店吃晚餐,那可就太好了。当然,我还要陪您回来。万一加尔维斯回来,咱们可以留个条子,写上两行字。天上还有月亮呢,看上去就像白天。咱们可以走慢点,那样就不会累了。头上蒙点什么,免得让露水打湿。”

那女人进屋时没有关门。拉尔森望着她那浓密的头发、望着她那双眼睛和笑脸，有礼貌地跟这张细白的面孔说个不停。他是在争取时间，可时间对他毫无用处。

他心中的恐惧是无法如实向任何一位重归于好的朋友解释的，无法向任何一位亡友或被忘却的熟人说明的。“往往有这样一个时刻，某种毫无意义的东西使我们清醒过来，使我们看到事情的本相。”这是闹剧中的恐惧，现在这闹剧已经开场，报幕之后就在担心，这出戏会身不由己，会摆脱佩特鲁斯的控制，会摆脱所有参加演出的人，这出戏不是说停就可以停的了。

那女人背靠餐桌，身躯微倾，头部挺直。那几只狗围在她身边，对着那鼓起的腹部无精打采地跳跃着。拉尔森双手拿着帽子一面退向挂有年历的木板墙，脸上依然显得亲切和满不在乎，一面感到忧伤和自惭形秽。他心里想，唯一可能的安慰就是通过屈服和出丑去寻找。

“太太，像今天这种夜晚可是太冷了。明天一清早外面会蒙上一层白霜。可是咱们早就知道今天晚上会有月亮。”

他摇摇头叹息一声，掏出手帕擦脸之前，手腕碰到了腰间的左轮手枪。

“晚上会有月亮。”

这时那几只狗已经卧倒在地上，只是扬起嘴巴，期望地看着女主人的身体。拉尔森再次望望她，那女人同开始一样，仿佛既没有听见他说话也没有看见他这个人。她脸上依然还有笑意，但是依然显得迷茫和痛苦，而且似乎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因为她的双眼早已

失去嘲讽、指责和好奇的神情。或者说，她的双眼只是在木然地注视，毫无表情，只是一种机械的动作和本能。她看到的一切，拉尔森、房间、昏黄的灯光、食物里冒出的热气，只不过是视线所及的着眼点，只证实这些东西的确存在。

“现在该开始了。”拉尔森心里想。他再次俯身，几乎是苦笑着说：“现在开始吧。”

于是她点点头，举起一只手，请他稍候片刻。接着，猛然将他的头搂在怀中。远处传来一阵阵游丝般的音乐声，近处一辆摩托车沉闷而怪诞地从特洛巴大街驶过。后来她慢慢转过身来，脸上不再那样吓人，露出孩童般的神情，双眼由于含泪而变得细长了。

“你发誓，今天晚上别丢下我一个人。你想了解什么我都告诉你。你发誓，别丢下我一个人，只要我不说，你就别走。”

“好吧。”拉尔森举手发誓道。

她神情沮丧地望着他，有些犹豫地说：

“这就好。我要你发誓是因为我想试试你。”

她弯腰找到一条板凳，坐了下来。拉尔森背靠年历，看着她的侧影，看着她前额上的冷汗，她仿佛在倾听什么，仿佛心惊胆战地听到了什么，仿佛聚精会神地在用牙齿品尝着什么。她的样子丑陋，披头散发，满脸蜡黄。拉尔森觉得她从来没有这样可怕过，从来没有这副神秘莫测、凛然不可犯的神情。拉尔森想：“今天晚上折磨着她的正是她心甘情愿去做的事，不管是肚子原因，或者忌妒的原因，或者是月光突然使她现出真相的原因。折磨她的是这个，给她甜头的也是这个。也许月光使她想起她也是个人，而她对于我则是

个女人。她意识到自己住在狗窝里，意识到她并非一个人，而是还有一个男人、一个生人在看着她、在打扰她，因为这个男人已经不再爱她了。不，恰恰相反，她是个女人，他是个生人，因为她已经不再爱他了。也许这男人外出是为生活所需，他无意中看到这里，看见了这些铁皮和木板，看见了用铁丝拧在一起的这三级木制台阶。月光下，万物都显得清新而陌生。她不得不考虑家中的贫困、自己的年龄、丢掉的时光以及所剩无几的消费品。”

那女人开口道：“我要你走的时候，你就快走，不要对别人说什么。假如你遇见了加尔维斯，不要告诉他你曾经跟我在一起。”

她用衣袖擦擦脸颊，然后十分镇定地抬起头，油光的面部好像显得年轻了几岁。她的眼神和笑容包含着愿做同谋的许诺。

她低声说：“现在还不到时候。我心里有数。不过没关系，反正我要兑现。他还在喝白兰地。加尔维斯总是醉醺醺地回来，不过在家里从来不喝酒。他是尊重我的。”她一字一顿地又重复一遍：“他是尊重我的。”同时在捉摸这话里的含义，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眼睛一面望着户外的夜色。“还是把门关上好。给我一支烟。证券已经不在这里。我想加尔维斯手里也没有。本来，我下了决心要把它偷出来送给你。可是他突然发了疯，非要那张破纸头不可，好像那是什么要紧玩意儿。我看他除了那张纸以外一切都是无所谓的。那是一张绿色的道林纸。我敢肯定，要是没了它，他简直没法活下去了。”

拉尔森给她点燃香烟，迈着弧形的快步跑去关上房门，又去找酒瓶。床下有一瓶酒，已经开了瓶塞。他找到一听罐头，拿来放在

桌上,又拖过一只木箱,然后弯身坐下。他把帽子放在膝盖上,给自己也点燃一支烟,但是并不想吸,只是望着它在指间燃烧,望着那几个光亮肥胖的指头,而不想看那女人一眼。

“对了,你是不喝酒的。”他呷了一口,脸上显出沉思的神情。“这么说证券是不在这里啰。加尔维斯手里也没有,那么孔茨那里呢?”

“这事跟那个德国人有什么关系?”她依然弯着腰,可是脸上开朗了许多,而且十分平静。“事情发生在今天下午。当时我毫无办法,我猜想他是想干点什么。加尔维斯下午三点钟从造船厂回来,他坐了一会儿,一句话不说,只是偷偷望着我。我问他是不是需要什么东西,他摇摇头说不要。他就坐在床上一动不动,我有些害怕,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是喜洋洋的,这副样子还是头一次。他像个毛头小伙子一样地看着我。我懒得再问他,就到外面洗东西去了。等我晾衣服的时候,他从我身后过来,只是摸摸我的脸。他刚刚刮过脸。没向我伸手自己就换好了一件干净衬衫。他说:‘这一回,什么都可以解决了。’我知道,他是在想他自己的事。我问他:‘怎么解决?’他只是哈哈一笑,摸摸我的下颏,好像一切都已经解决了似的。看着他那副高兴劲我很激动,我没再问他什么,任他随意抚摸和亲吻。也许他是在告别,可是连这个我也没问。过了一会儿,他走了,不是去造船厂,而是踏上通往库房后面那条路。我呆呆地望着他,他好像显得年轻了,因为他走得飞快,浑身带劲。就在他的身影快看不见的时候,他站住了,又转身往回走。我一动不动地等着他。他离我越来越近,可我知道他并没有后悔。他告诉我,他要去圣玛

利亚,把证券交给法院。我想他是要上告。他把这事告诉我,好像这对我关系很大,好像他这样做是为了我,好像他这些话是最动听的,是我正希望听到的事。后来他真的走了,我接着晾我的衣裳,再也没有看他走路的样子。”

拉尔森装出愤慨的样子,装出感兴趣的神情。

“奇怪的是我没有看见他,也不知道这件事。他大概不会在造船厂之港上船。既然他三点钟到这里,又耽搁了一段时间,那可能来不及起诉。法院是五点钟关门。估计旅途用去一小时……

“晾完衣服之后,我觉得浑身疼痛,就回到屋里躺在床上等着疼痛过去。可是疼痛还没过去,我就忘记了痛,因为我忽然想起一点事,这想法就像心里有个声音在呼喊一样。我跳下床,在衣柜里翻腾起来。柜子里没有什么衣服了,只剩下一摞剪报,那是他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因为上面写的都是造船厂和打官司的事。我找到了我们用来存钱的陶罐。这个罐子是长颈小口,往外掏钱是很费事的。我们原来想,等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把罐子打破。我用打毛线的长针往外掏钱。可他在离家以前就早已下手了。我甚至连里面究竟存了多少钱也没有个数。这时我才明白他是真的出走了。我当时并不想哭,既没有生气也没有伤心,只是感到吃惊。我刚才跟你说过,我看见他远去的身影觉得他更年轻了。后来我想,他比我认识他那一天更显得年轻。那是一个刚刚当兵回来的加尔维斯,他走在我前头,大步流星地穿过两旁长着荨麻的小路。这是另一个加尔维斯,他不会回来了,他同我毫无关系了,跟你也没关系了。你打算怎么办?现在你毫无办法,只好等人家同意的时候再去。”

她说罢微微一笑,似乎这“毫无办法”以及她所讲的一切只不过是玩笑而已,只不过是瞎编的开心话而已,为的是把他拉尔森留在身旁调情而已。拉尔森说:“既然是这样,那么我告诉你,加尔维斯的所作所为对我们大家就意味着灭亡。正当问题就要得到解决的时候,他竟然想起干这种发疯的事。太太,这对所有的人都是个遗憾。”

但是,她很冷漠,坐在板凳上不动声色,只是凝视着小窗外的月色。

“也许他没有去圣玛利亚。既然他把钱带走了,就有可能发现他醉倒在酒店里。我去同他谈谈。”拉尔森心里想,可是直到这时他也没有感到生气或者着急。于是,他俩就这样心平气和地静坐着。拉尔森一面用罐头盒小口喝酒,一面用眼角窥视着那女人。而后者此时脸上露出嘲讽和惊奇的神情,似乎在追忆刚做过的一场梦。他俩就这样长时间地僵坐着,互相之间离得很远。她浑身在发抖,牙齿也碰得咯咯响。

“现在你可以走了,”她眼睛望着窗外说道,“我并不是轰你走,可你留在这里已经没用了。”

拉尔森等着她站起来,接着也起身,伸手把帽子放在桌上。他一面向她走去一面望着那凸起的腹部,那被绷得紧紧的大衣纽扣,那锁住领口的扣针。他没有干那种事的欲望,也找不到可以代替这种欲望的企图。他望着她那张泛光的黄脸盘,望着她那双曾经审视过他的勇敢的眼睛。他小心谨慎地贴紧那女人腹部,双手勉强搂住她的肩膀,一面亲吻她的嘴唇,一面用手指抚摸那粗糙的大衣呢料。

她张开双唇，任他亲吻，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只是在拉尔森亲她的这段时间里，一直气喘吁吁。最后她退到桌子旁，毫不掩饰地慢慢举起手，照着拉尔森的面颊和耳朵扇了一巴掌。这一巴掌比接吻更有滋味，使他觉得更有希望、更有办法。

“太太，”他低声道，两人互相对视一下，脸上都露出倦意，既感到一丝快慰，又感到一点热辣辣的仇恨，仿佛真的成了一对男女。

“你走吧，”她说。她把双手已经藏进大衣口袋里。她已经平静下来，睡意蒙眬，嘴角露出温柔、愉快的表情。

拉尔森拿起帽子，然后向门口走去，他极力不弄出任何声响。

“你和我……”她开口了。

拉尔森听见她在轻轻地笑，听见她那懒洋洋的低音。他等她说完，然后转过身，他并非想看她，而是让她看看他这副愁容，他并非要人家理解，而是希望得到尊重。

“咱俩之间也曾经有过那样一段时间，可以互相了解。”他说，“正如你说的那样，总可以发生在跟他之前。”

“你走吧。”那女人又说了一遍。

在踏上那三级台阶之前，在看到月亮之前，在面对那可忍受的孤独之前，拉尔森好像表示歉意似的低声说：

“人人都会发生这样的事。”

造船厂之六

那天晚上以及随后几天的夜里，拉尔森都未能找到加尔维斯。他已查明加尔维斯并没有去圣玛利亚法院告状。可是加尔维斯也没有回窝棚，没去造船厂。在那间冰窖似的大房间里，只会发单音节、神情冷漠的孔茨接待了拉尔森。孔茨一面品着马黛茶，一面漫不经心地展开那些从来没有动工的工程设备图纸；要不然，他就摆弄集邮簿上那些邮票。

孔茨已经不再去总经理办公室了，拉尔森便无法了解卷宗里的内容。如同病人一样，他知道末日临近了。外部的征兆，他已经看清，但是他更相信身体内部发出的信息，更相信精神厌倦和意志丧失所包含的意义。

拉尔森抱着怀疑的态度利用早晨那一点点精力，这样总能够消磨几个小时的光阴，他并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在乎这一切对他是否重要，只想着企业振兴、修复、债务和诉讼的计划。窗外寒冷、阴暗的光线使他决心编造那些死人的故事。他翕动着嘴唇，吐出一个个音节，耳边则传来唾液在嘴角的“啧啧”声。

他坐上一两个钟点,直到中午时分。有时他还能拍拍孔茨的肩膀,随后望着孔茨走下铁制扶梯;还能装出挺胸凸肚的样子,露出沉思的神情,但是无论如何,他的精神已经崩溃了。

现在孔茨常常下厨房了。他既不事先声明也不同妻子协商,一天清晨他生起炉火,一把夺过妻子正在洗涤的青菜。拉尔森和孔茨夫妇常常谈论天气,谈论那几只狗,谈论新闻,谈论天气对捕鱼和农作物的利弊。

但是,到了下午,拉尔森再也不能埋头于卷宗之中了,也不能吐出一个个无声的音节了。每天下午,孤独与失败的情绪浓浓地弥漫在冰冷的空气里。拉尔森完全处于麻木的状态中。他曾经有过一线振作和自救的希望,但是被放过去了,因为他仇恨加尔维斯,在仇恨中寻得的是灭亡,在决心报复的行动中寻得的是灭亡。

每天下午,冬天的天空,无论是阴霾四布还是晴空万里,都会从那扇破窗俯视着一个自暴自弃的老人,他垂头丧气地呆坐着,脑海里翻腾着种种往事的回忆,翻腾着支离破碎的念头,翻腾着一个个模糊的人影。从两点钟到六点钟,寒冷的空气刺激着一张苍老的面孔,他微张着嘴巴;由于呼吸,上唇在颤抖;枯瘦的躯干支撑一颗头发花白、几乎全秃的脑袋;孤零零的一缕头发垂在他的前额上;细长、弯曲的鼻梁傲然地突出于那张衰老的面孔上。没有血色的嘴唇均衡地向面颊两侧下垂,并且逐渐在缩小。这是个神情呆滞、流着口水、拇指勾在外套上的老人,他坐在书桌前,不停地摇晃着身体;仿佛乘着一辆汽车在崎岖的道路上狂奔一样。

万事都有个终结。一些人发现顺水的驳船开始卸下北方和沿

海岛屿收获的柑橘,另一些则发现,正午的阳光开始暖洋洋地照在禽鸟饮用的水面上,他们还发现阳光招引来无数的猫、狗和蚊蝇。还有一些人则发现,有些树叶正在发芽,到夜晚又被冷空气冻得萎缩起来。很可能这封信同那些神秘的现象有关系。

那天是星期四。一艘驳船在午饭时分带来了这封信。贝尔格拉诺之家的老板波埃特斯派用人把信送到造船厂。那用人多次紧按电铃,由于毫无结果便登上管理处的大房间。孔茨正在那里专心地描绘一张模糊不清的图纸。这是十年前设计的钻孔机,每分钟可钻孔一百个。孔茨知道国外正在出售每分钟可钻孔五百个的机器。他每天工作七小时,因为他确信只要疏通一条被堵塞的铁管,他是能够改进这个旧设计图的。他坚信只要做一些修改,钻孔机就可以在理论上达到每分钟钻孔一百五十个的能力。

他满怀敌意地接待了送信的用人。信封上的字样使他为之一震。

“这封信是给拉尔森先生的。”用人提醒说。

“我已经看到了。”孔茨回答道,“你要是等着拿小费,那最好等年底再来。如果你盼着别的什么,我可是不会给你的。”

那用人低声骂了一句,转身走了。孔茨一动不动地站在大房间的中央,慢慢从惊讶和狐疑中清醒过来,他怀着敬意、迷信和不安的心情望着那用打字机书写的常规信封以及上面那张被折坏的玫瑰色邮票。造船厂之港佩特鲁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先生亲启。

由于慌乱,孔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觉得自己不配这样想,同时把那封信看个仔细。这是因为起初佩特鲁斯任命他为技术部经

理的时候,还经常有信件、通知、机械制造商或出口商的商品目录、银行的传票,以及利息办理处从首都债权联合会转来的函件。但是,造船厂对外界、对除去那几位幻影式的经理之外的某些抱有希望的人尚且存在的最后证明,数月后也就不再寄来了。在各界普遍怀疑的影响下,孔茨逐渐丧失了最初的信念。破败的大楼变成了逃避没落教会的寺院。老佩特鲁斯和拉尔森经常不断地吟唱的那些复兴企业的高调,并没有能够使他重新快活起来。

现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一封从外界寄给造船厂的信就在他手里,这是毋庸置疑的,如同一个结束了一场神学论战的铁的证据一样,如同宣告上帝的存在与正确的奇迹一样,而他孔茨曾经亵渎过这位神明。孔茨怀着点燃别人的信念、同时也重振自己的信心的愿望,没有敲门就跨进了总经理的办公室。他看见那老人惊愕地在书桌后面晃动着身体,两只无力的手放在乱七八糟的卷宗上,两只眼睛睁得老大,但是没有发问。孔茨并没有留神这一切,他把信放在书桌那拉尔森伸手可取的地方,他认为只要说上这么一句话,便可表达明白:

“您瞧,一封信。”

拉尔森从万物皆空转回到为人为物都不可能减轻的孤独状态。接着,他笑了,仔细看起信封来。随后立刻注意起孔茨所忽略的东西:审视邮戳上的字样,他读出了那个半圆圈里的字母:圣玛利亚。他一面小心地剪开信封,心中颇为冷淡地想到佩特鲁斯其人。出于谨慎,孔茨已经走到通风的窗口,在一旁装烟斗。拉尔森冒出的第一句话使他立刻转过身来。拉尔森陡然站起身,气愤地把信递给他

看。孔茨越来越慢地读着信,对自己原来的猜想感到难为情。

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先生:

我尊敬的先生,我冒昧地打搅您是因为我要通知阁下,我辞去行政部经理之职。我在您的企业里担任此职不知有多长时间了。在此期间我得到了国内有生力量的普遍支持。我还放弃了那部分迟迟未发的我应得的工资,由于疏忽我一直没有领取。此外,我还放弃了在您命令下从仓库盗窃的大约三分之一的赃物。我还要告诉您的是,今天上午,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刚一走下木筏,当局便将其逮捕投入监狱了,因为前几天我对他伪造证券一事已提出控告,而在此之前我曾及时向您禀报过。当时我同警官正守候在码头上,而佩特鲁斯则佯装不见。对此,我认为无法忍受这种黑心的忘恩负义的态度。据圣玛利亚市的人说,您在该城是不受欢迎的人。对于这种情况,我感到遗憾,因为我原希望您会前来向我证明我是犯了一个错误,会向我详细说明今后我们的美妙前景。假若您这样做了,也许我们会皆大欢喜。

阿·加尔维斯

“这个婊子养的!”拉尔森吃惊地低声道,随即陷入了沉思。

孔茨放下信纸,弯腰捡起拉尔森扔到地下的信封,然后缓慢地回到大房间,回到刚才他正在描绘的蓝色图纸旁边。

拉尔森立刻想到他该采取什么行动。也许早在这封信寄来之

前他就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说，至少是像种子那样孕育着现在可以预料并且注定要完成的行动。似乎这样一个说法是真的了：人的一切活动产生于行事之前、先于找到执行者之前。他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但是不必追究为什么。另外，他还知道，行动或者拒绝行动是同样危险的。因为在他预见到这一行动之后如果拒绝执行，这个行动便失去了所需要的空间和生命，于是就会在他心中发疯似的剧烈膨胀，直到将他毁灭为止。如果他同意这一行动（不仅同意而且已经开始着手），那么行动本身就会耗尽他最后一点力量。

他习惯于用装假来支撑自己。他是那样地绝望，甚至连证人也不需要了。他挑战式地一笑，随后露出虔诚的表情。脱掉大衣和外套，他对着败了色的衬衣腋衬看了片刻。接着，他把左轮手枪放在书桌上，退出里面的子弹。

他坐在那里苦思冥想，一面装出顽强工作的样子，努力卸下撞击装置，直到冬天的太阳开始西下方才罢手。他一次又一次扣住扳机，一次又一次蹲下去。

四周万籁俱寂，只有狗、牛和飘荡在河面上的汽笛声偶尔响起。将近六点时，冻得浑身麻木的拉尔森把子弹重新装入弹仓，然后把左轮手枪插入腰间。他穿好衣服，按了一下电铃，准备叫技术部经理进来。孔茨立刻出现在房门口，脸上挂着那种已经完成每日工作后平静而疲乏的表情，他看到拉尔森垂头丧气地在窗户与电话交换机之间踱来踱去，他看到拉尔森歪斜着肩膀，双手背在身后，然后用手指梳理着一缕耷拉到前额的头发。孔茨由于宗教信仰的破灭对拉尔森也逐渐怠慢起来。他点燃烟斗，准备静静地等候，他已经不

那么轻信了。拉尔森脑袋在距离孔茨肩膀不远的地方停下来，并且慢慢扬起来。孔茨看到他那张面孔比往常更加阴沉然而更加生机勃勃。面对着那锐利的目光和嘴角上冷酷而衰老的皱纹，他开始警觉起来。

拉尔森说：“应该马上把那些俄国买主叫来，告诉他们我们愿意出售。应该让他们明白，我们不会讨价还价的。不过，必须今天就来，几点钟都可以。清楚吗？我亲自接待他们。”

“我可以叫他们来。可是今天来恐怕很困难。也许明天早晨……”

“马上叫他们来！我希望您也在场。我们要卖东西。只要弄到去圣玛利亚的钱就行了。一定要找到那个母狗养的。另外，还要给佩特鲁斯请到律师。我不知道是否要请您陪我一道去，也许厂里有必要留一个人。”

孔茨摇摇头，他现在与世无争，什么诸神什么人伦他都不感兴趣；他同尘世的联系就是那架未来的钻孔机。

“就算您找到了加尔维斯，又能得到什么呢？”他想知道个究竟，“就算您骂他、打他、杀了他，佩特鲁斯仍然蹲在监狱里，人家还会派人把咱们轰走。”

“以前我还担心这个。可是自从寄来这封信以后，自从他这封信一写好以后，一切的一切可就改变了，一切的一切都结束了，或者说正在结束。现在唯一能够做的事就是选择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结束这一切。”

“随您的便吧。”孔茨回答说，“我去叫那些俄国人来。”

这样，当天晚上，让贝尔格拉诺之家的用人给佩特鲁斯公馆送

去一封信函之后，拉尔森静坐在房间里，面对着穿衣镜，望着镜中那张陌生的面孔、望着那张仿佛某个亡友似的无情脸庞，望着那张并不惊人的长相闷闷地思索着。随后，他傲然地快步陪同两位买主向船坞走去。远处的汽车灯光照耀着这座仓房。孔茨提着马灯走在前面，他把灯挂好之后便退回门口，不愿意介入此事。

拉尔森斜靠在木箱上，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装出主持这桩生意的样子。他很少开口，面带怒容，决心不讨价还价。两位买主在仓房里走来走去，不时地拿过一盏灯，在某个昏暗的角落里翻找着什么，随后，便抬来一件东西，放置在拉尔森头上另一盏灯能够照到的地方。两人后退一步，不约而同地后悔起来。拉尔森怒气冲冲地点着头说：

“朋友，这东西是长锈了，的确没法使用。如果要你们一比索那也许是敲竹杠。你们给多少钱？”

拉尔森听着对方的价钱，点头表示同意，嘴里骂了一声，仅仅一声。他估计需要一千比索，当东西卖到这个钱数时，他站起身，掏出香烟来。

“对不起。不过事情办完了。请交钱装货吧。这里没有收据，本公司不接收支票。”

孔茨进来取走那两盏灯，然后穿过荒草地，一手提着一盏白晃晃的灯，微微拱腰缩肩，渐渐走远了。这时南风乍起，寒气袭人。拉尔森站在装货的卡车旁，纹丝不动，心中十分恼火。卡车开动了，经过窝棚附近时，车灯熄灭了。

圣玛利亚之五

于是拉尔森开始了他最后一次圣玛利亚之行。这个晦气的市镇！大概他在途中就预感到他是来告别的，追捕加尔维斯只不过是必须提出的借口，一种伪装。我们当时看见他的人，还能够认出他来，觉得他更衰老了，觉得他神情狼狈，意志消沉。但是，他身上还有某种不寻常的东西，不是新东西而是旧有的、被忘却的什么；那就是冷漠、勇敢、诙谐，属于从前那个拉尔森身上的东西，属于五六年前怀着希望与某个鬼迷心窍的念头来到圣玛利亚的拉尔森。

当时的拉尔森曾经露过面（我们有人看见了），他有些装假，衣衫破旧，并没有因为在造船厂生活就已经改邪归正。他的外观显得更加苍老，前额上那缕头发更加稀疏，歪嘴缩肩的动作更加频繁。但是，我们现在确信，当时我们大概不很费力就感觉出他的举止行动和言谈笑语中还有青年人的成分。我们这些凡是有条件做比较的人大概都明白，当他正午和黄昏时分慢悠悠地踏着碎石地面穿过新广场的时候，当他跨上广场酒吧间的高凳、带着一种既非露在脸上也并非表现在谈吐中的傲慢态度故意懒洋洋地饮酒时，当他在大

街上有礼貌地向行人打听城市变化的时候,当他懒洋洋地坐在贝尔纳酒家的餐桌旁,让老板证明已不记得他这个人的时候,当他坐在那里用不很好奇却十分自信的目光望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拉尔森已经把我们这些人从他的意识里抹掉了;我们还应该明白,如果他回顾五年以前,可以做到很容易不痛苦地同过去告别。他坐的那个地方视野不佳,看不清我们是些什么人,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总而言之,不知人们所云。

人们看见他,或者说我们看见他,有两个晚上他在城里的咖啡馆、饭店和酒家里度过的;我们看见他一直向海岸走去;看见他走遍棚户区同吉他手在一起,找个借口便热闹一番;我们看见他滔滔不绝、从容不迫、慷慨解囊和少见的胸怀大度。我们听见他打听加尔维斯,打听一个面带笑容、秃顶但还年轻、容易辨认、很难忘却的人。可是没有谁看见这样一个人,或者说没有人可以肯定见过这样的人,或者说没有人愿意为他领路。

这样一来,据人们推测,拉尔森便放弃了这次旅行的初衷——报仇;于是第三天他要完成另一个心愿——并不荒唐和虚情假意:访问佩特鲁斯。

圣玛利亚的监狱,我们这些三十岁以上的老住户一直叫它“警备队”,当时还是崭新洁白的建筑物。入口处设有岗亭,亭子两侧有玻璃墙,亭顶是水泥制成,顶上竖立着高高的旗杆。“警备队”实际上是个扩大了警察分局,在老广场北侧占据了四分之一一个街区。当时刚刚建成一层楼,因为外面还堆着水泥、木梯和脚手架准备建筑第二层。

探监的时间是三点钟到四点钟。拉尔森坐在圆形广场边缘的一条长凳上,广场里面是由潮湿墨绿的草皮铺成,外围则是长满苔藓的砖头小路,广场四周是些破旧的杂色房屋,外面严严实实地围着栅栏,墙壁上则布满了斑点污痕,每到下雨时便格外明显。拉尔森望望广场上的塑像,上面的题词惊人地简短:缔造者:布劳森,牌子上长满了铜绿。他一面晒着太阳吸烟,一面心不在焉地想着,在每个城市和家庭,甚至他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安静而昏暗的区域,一个类似下水道的地方,躲避着命中注定要发生的事件。那是个神秘莫测的区域,里面总有一些缓缓爬行的扁虫,它们总是伺机报复,人们无法及时察觉。

三点整,拉尔森走到玻璃岗亭面前,向身穿蓝制服的警察询问之后,又转身从警备队的大门向广场上的铜人铜马望去,在冬天的阳光下,那人和马显得无力和顺从。

(这座纪念碑揭幕时,我们争论了几个月之久;在俱乐部里,在最简陋的公共场所,在茶余饭后,在《自由派》杂志上,大家争论雕塑家给英雄穿戴的服饰,根据地方长官的演说,这位英雄的名字“几乎可以给城市命名”。这句话大概仔细斟酌过;并没有明确建议给圣玛利亚改名,它暗示地方当局可能赞同改名的活动。大家争论的问题有:北方式的披风,西班牙式的皮靴,军衣式的上装;此外还有:这位英雄的侧影像闪米特人,从正面看头部则显得冷酷刻薄,眼睛对视,身躯前倾显得骑术不高;那匹马则像是未阉过的阿拉伯种。最后,大家认定塑像的位置是违反历史和荒谬的,这个位置迫使缔造者布劳森要永远马不停蹄地向南方奔去,仿佛由于后悔而返回那遥

远的平原，而从前他离开平原是为了给我们创造未来的。)

拉尔森走进铺有瓷砖的寒冷过道，接着手拿帽子站在办公桌前，他对面是个身穿军装、蓄有短髭的印欧混血儿。

“您好。”他微微一笑，那里面包含着嘲讽与蔑视，只是经过四十年的时间，他已经变得平静和衰老了。他没有打开身份证，直接递了过去。“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见见佩特鲁斯先生，堂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

随后，他沿着冷清的过道向前走去，向左转弯之后，他停下脚步，等候另一个身佩毛瑟枪的站岗警察的盘问。一个身穿线衣、脚蹬麻鞋的老人走来，他点头示意拉尔森随他走向另一道回廊，那里更冷，一阵阵阴沟和仓库的气味吹过来。走到一处有消火栓的地方。老人停下来，拉开一扇没有上锁的门。

“我可以呆多长时间？”拉尔森一面望着里面黑洞洞的房间，一面问道。“呆到您烦了的时候为止，然后我们来收拾。”老人耸耸肩膀说。

拉尔森走到里面，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随后便听到关门的声音。这里不是牢房，而是一间办公室，里面有废家具、木梯和颜料桶。接着，他脸上露出准备问候的表情向错误的方向走去，结果因为一股狐臭味飘来，他放慢了脚步。突然，他在右方发现了那位囚徒，原来他躲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身体缩成一团，刚刮过的脸上露出警惕的神情，似乎他一直在窥视拉尔森，似乎他早已布置好家具，以便给拉尔森一个惊讶，似乎他一开始就处于有利地形便可以确保会见时的胜利。

佩特鲁斯显得更老更瘦了，络腮胡子显得更白更长了，那双眼睛显得更加惊慌不安了。他双手撑在一本皮面杂记簿上，除此之外，四方形的绿色长毛绒台布上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几乎是刚一看见这老头儿，拉尔森马上变得热情起来。

“咱们又见面了。”拉尔森说。

对方十分激动，但是在控制着，刚一启齿又马上闭紧了。嘴巴又闭成了一条曲线。也许为了有这样一张嘴，佩特鲁斯无须自幼便表现出傲慢和否定，也许别人要活动几百年才能继承这样一张嘴，一个仅仅用于吃饭和说话的口子。“就在旁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一张嘴巴就可能被吊销。一张嘴巴可以守口如瓶，又可摆脱诱惑。一张嘴巴既可张开又可闭拢。”光线是灰色而柔和的，因为一道窗帘遮住了几乎整个阳台的门窗。在房间的另一端，八月的阳光呈三角形抛出一道长长的光柱。靠近窗帘的地方，有个黑皮长沙发，上面放着一条折叠整齐的毛毯和一个扁平硬实的小垫子。这个角落就是佩特鲁斯的卧室，比起水上别墅里那些卧室来真可谓天壤之别。家里的枕头宽宽大大，外面罩着带有十字花边的枕套，上面绣着常用的日期，或者农村的花饰，说明这样一个谚语的双关含义：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①

“咱们又见面了。”佩特鲁斯伤心地重复道，“可方式不同了。请坐。我的时间不多，有许多问题要考虑。”

“对不起，请等一下。”拉尔森说。他觉得自己应该尊重对方，但

^① 原文为德文。

不应盲从。他把帽子放在绿台布的一角，然后走到窗帘处，掀起一角，露出一副好奇的表情。

拉尔森看见了那匹马斑驳的臀部以及马尾巴甩出来的 S 形；由于梧桐树叶的遮挡，他只能看见缔造者的披风穗子和里面的腿部及高腰皮靴。死心眼的拉尔森极力要弄明白这一时刻对他的生活和世界的意义。那些歪歪扭扭、阴郁凄凉的大树，那照射在青铜马臀上的阳光，这位老人的拘禁，这个省城里的神秘而懒散的气氛，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放下窗帘，感到心力交瘁而又毫无愤恨；他摇晃着身体，又回到了这真真假假的现实中来。拍拍椅子，在佩特鲁斯又一次发出邀请之前，冷静而又忍耐地坐下来。

“劳驾，请您坐下。”

他想：“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这件事而不是别的什么事情？反正都一样。为什么是他和我而不是另外两个人？他被逮捕了，一切全完了。这个黄白色的骷髅用他那每道皱纹告诉我，再也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自欺欺人、可以混日子、可以表现热情或者吹嘘了。”

“几天以来，我就盼着您的来访。我不相信您会开小差。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没改变。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的事。自从上次见面以来，事情变得好多了。实际上，我现在只是暂时被隔离，我是在休息。这种临时被关押的荒唐状况是我的敌人可以使出的最后一招，是他们能够给我的最大打击。在这个不舒服的办公室里再少蹲上几天，这阵风也就刮过去了。眼下我不能浪费时间，这里的人肯帮忙拦住那些会耽搁我宝贵时间的人。因此我

就可以从从容容下决心解决我的问题了。现在我可以告诉您，我已经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了，那些难题再也挡不住企业的发展了。”

“这真是了不起的消息。”拉尔森说，“我回到造船厂，把这个消息转告大家，大家一定会感到欢欣鼓舞。当然，这要征得您的同意啰。”

“您可以讲出去。但是严格控制在高级职员的范围里，只告诉那些证明是忠实可靠的人。我并不十分想知道被捕的原因。不过看来起诉的根据是我们谈过的那张有名的证券。究竟出什么事了？难道我委托您的事办糟了，还是您跟我的敌人同流合污了？”

拉尔森微微一笑，开始慢慢点烟，然后恨恨地望望那颗鸡头般的脑袋，只见对方正期待而狂热地俯身看着他，这老头儿对于胜利颇为自信，认为官司打到最后也没人能够说他败诉。

“您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拉尔森缓缓地说道，“就凭着现在我来查看您，凭着我一听说您被捕就跑来探监便可以证明。”但是他心里却想说：“我已经尽力而为了。我已经忍受了不少屈辱，当然也使别人受到屈辱。我使用了暴力手段，这个您像我一样地了解，不多不少跟我一样。这种手段的牺牲者是无法通过起诉发现的，因为他无法明白这些手段、无法分清吃苦的原因。您大概天天在使用暴力手段。别人像我一样地了解，不过没有我清楚，因为我们都是人，卑鄙无耻的行为可能人皆有之，不过有以下区别：狡猾、忠诚、忍耐、牺牲、追随于他人左右，如同游泳运动员那样帮助别人破浪前进，帮助别人潜水，当然总是要根据对方的要求，总是要在时机合乎我们要求的时候。”他又说：“我唯一应该受到指责的事就是打了败仗。”

佩特鲁斯像乌龟那样缩回脑袋，接着又张开嘴巴，露出了黄牙，这一回显得宽宏大度。他并不谴责一切。那对深陷发光的眼睛沉思地望着拉尔森，那有趣的好奇表情中几乎还有怜悯的成分。

“好吧，我相信您。我从来没看错过人。”佩特鲁斯终于开口道，“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可以证明我根本不知道假证券的存在。同样，谁也不能证明我知道这件事。先把这个放在一边吧。重要的是最后审判的日子已经近了，也就是几天的事，顶多两个星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忠实、能干的人来领导造船厂。您觉得有力量、有信心吗？”

拉尔森于是神情专注地点头称是，他一面争取时间，一面让自己的肺习惯于这种古怪的禁闭空气，整个冬天一直沉浸在这种气氛之中，现在他忽然感到难以忍受，感到这空气是可以用肉眼看到的。起初，他觉得这空气是难以忍受的，后来，又认为这空气是几乎难以排除的。

“您可以跟我讲一讲。”拉尔森说，那老头子冲他微微一笑。“可是我的确在造船厂浪费了许多时光，如今我已经不年轻了。我承认眼下工作轻松，但是责任重大。暂时我还不想说这个工资的事，不过我认为有必要告诉您，没有发工资，或者说，没有按时发工资。我认为等时来运转的时候应该保证给报酬。”

佩特鲁斯突然向后一仰身体，脸皮紧紧地绷在颧骨上。一瞬间，拉尔森以为那颗脑袋会挺得笔直，会超出阴影之上；在这样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气氛里，在这样一个衰老、没落的世界里，会昂首直立。佩特鲁斯慢慢把手指伸向上装的口袋里，然后把脸凑近拉尔森

的鼻子。也许有某种蔑视的神情,对那种容易向别人妥协的人表示小小的遗憾。

“不管造船厂是不是发工资,那都不是我的问题。有加尔维斯先生管这件事。您把这些问题提交给他。”

“对,有加尔维斯。”拉尔森重复了一遍,脸上露出轻松的表情。他觉得如释重负,一种温暖的、康复后的活力又充满了全身。“正是他交出了证券,把您给告发了。”

“很好。”佩特鲁斯点头道,“这对他可更糟。我很想知道您采取了什么措施把他替换掉。您别以为像造船厂这样的企业没有可靠的内行来管理就能正常运转。您至少该把他辞退吧?”

拉尔森想:“我多么想助他一臂之力,或者为他拼命,或者借给他十倍的钱。”

“您瞧,”拉尔森边说边解开大衣,“加尔维斯是管理员,他把您告发之后就失踪了。或者确切地说,他早就有心要藏起来了。三天前,他寄给我一封信,提出要辞职。我当然立刻就明白了,我的责任是辞退他。我找遍了造船厂之港的各个角落,后来就到圣玛利亚来了。我本想用这个家伙把他辞退。可是他没有露面。”

他把左轮手枪悄悄放在书桌上,然后退回几步望着它。

“是史密斯牌。”他自豪地报告说,既不合时宜又无精打采。

两人沉默了片刻,低头专心地望着枪的漂亮外形,枪口和皱曲的枪柄上发出幽幽的蓝光。他俩仔细观察着左轮枪,并不想去碰它,仿佛那是一头证明确实存在、但是一直没有亲眼见过的野兽,是一个刚刚飞落到书桌上的昆虫,它停在那里既威胁他人又受到他人

威胁,不过并未意识到这种情况,而是静止不动,不为人所理解,也许它是在通过鞘翅的颤动努力同外界交流,而这些粗俗的人是无法察觉的。

“请您把它收起来。”佩特鲁斯命令道,一面重新坐到椅子上。“我个人不赞成这种方法。再说,现在对我们也毫无用处。您怎么会带着枪就进来了?难道监狱的人没有检查?”

“没有。他们没有想起来,我也没想到。”

“这可真是怪极了。这么说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走进这个房间把我给杀了。加尔维斯这个家伙昨天和前天来过不知道多少次了,他要求见我一面。我不想见他,跟他没什么可谈的。要是您动了枪,他早就完蛋了。”

“这么说加尔维斯来过了?您能肯定吗?好吧,那他一定没走远。我必须找到他,并不是给他一枪。这想法是一时冲动,总得有所行动。不过,我真想当面啐他一口,或者骂他一个狗血喷头。”

“我明白。”佩特鲁斯装出颇有决心的样子,“您收起这把枪,忘掉这段历史吧。请您找一个忠诚可靠、有能力的人来管后勤吧。您给他定好工资和条件。一定要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造船厂都要继续办下去。”

“好的。”拉尔森答应说,一面总是望着手枪;在把枪收起之前,他伸出一个指头,轻轻摸摸枪柄的底部。

(第一次玩枪,是一把32型的手枪,形状扁平,可以随身装在衣袋里。那一次是几家临时性的社会、文体俱乐部组织的,地点在城外的旷野地,是他最早一次接触女人,最早一次预见到枪的重要与

危险。玩枪是他青少年时代培养的爱好的，他经常在夜间用刷子和凡士林擦枪。后来，他从一个士兵手中廉价购得一把科尔特牌手枪。那支枪太重太大，难以掌握，实在没有什么用处，除去野餐拿它对准罐头或树木练习瞄准之外，他从来没有使用过。在瞄准时，他只穿着衬衣，嘴里叼着香烟，左手端着一杯苦艾酒，与此同时，别人在准备烤肉。在更好的一些机会里，他也练过枪，比如一次乘着小巧平稳的嘉乐特牌车在路上行驶，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有一位斯拉夫垦殖者陪同。这时，他已经成年，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那一次是把特大号手枪，挎在身上简直要斜身走路，它沉甸甸地压在肋骨上，叫他永世难忘。那支枪只是在黄昏时分，当大家的扑克牌玩腻的时候，他给大家做拆卸表演时有用。那时，他被蒙住双眼，嘴里叼着某个女人塞进来的香烟，把枪全部拆完之后，仍然蒙住眼将零件再一一组装起来，周围不断响起一阵阵惊讶赞叹的声音，当他凭着手指的记忆熟练地拧上带有骏马飞奔的木柄时，周围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他感到万分的幸福。）

“咱们的看法一致。”拉尔森强调说，一面系好大衣的纽扣，“造船厂的运转是一切问题的基础。我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必要的措施。工资的事也要得到解决。不过，我再跟您说一遍，对我十分重要的是，明天以后的事要有一定的保障。”

佩特鲁斯举起双手，然后手摩擦一下脸颊。发黄的面孔上露出快乐和稳操胜券的神情。

“先生，我明白。”他低声道，“您希望自己的牺牲变成资本。我认为这很对。至于眼下的工资问题，请您任命一个会计，同他商定

就是了。至于明天以后的事嘛，您的意思是什么？”

“要有一定的保障，要订个合同，签署一个文件。”他轻轻一笑，显得顺从而又会安慰人。

“我看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佩特鲁斯激动地喊道。他轻巧地拉开皮包，弄得拉锁响声很大。“我认为原则上咱们是可以商定的。”他从包里掏出纸张，从上装口袋里摘下钢笔。“您说吧，要什么样的文件？是要为期五年的合同？请等一下。”他在西装里面的衣袋中摸眼镜盒，然后戴上眼镜，傲然一笑。“先生，请提要求吧。”

“好的。”拉尔森友好地一笑，他说，“为了将来不反悔，这事我并不着急。第一，签署合同，为期五年，这很好。拴在一个地方，对我没好处。其次关于工资嘛……您明白总经理这个岗位必须有相应的生活水平。”

“完全正确。如果是我换了您，会首先提出这个要求的。”这时佩特鲁斯已经抬起头来，脸上露出很有节制的得意神情。“您现在的工资是多少？我得向您坦率地说，有更操心、更重要的事等我考虑，因此最近一段时间我没办法检查造船厂每月的结算。”

“我现在挣四千。那么从形势正常以后开始，就定六千吧。”

“六千？”佩特鲁斯犹豫起来，他手中的钢笔顶端在嘴唇上滑来滑去。“那就六千吧。我没有什么异议。不过，先生，您可得努力工作。好吧，我先草签一份临时性的合同，确认您五年中的职务和报酬。然后咱们再签正式合同。”

他埋头写起来，一笔一画，写得很慢，好像在绘画。一个高音喇叭的广播声突然打破了室内的寂静，广播的声音还没听清便渐渐远

去了。拉尔森挺直腰板，向四周望望。木板、罐头、画笔，一一躺在那里；空气中弥漫着宁静与急迫的色调；还有那个伏案的老人。在这座衰败、几乎没有变化的城市的这一角，除去所见的景物之外，这安静气氛使拉尔森感到不安。那匹被惊动的高头大马，正扬起前蹄准备飞奔，它那波浪式的马尾，在秋天草地的衬托下高高扬起。潮湿的圆形广场上，树木不停地摇曳着枝叶；长椅上空无一人；水潭边无人光顾。黄昏已降临到河边，降临到商业区附近已经焕然一新的街区。

“请您过目。”佩特鲁斯说道。

拉尔森接过那张道林纸，仔细审视着上面那匀称秀美的花体字。“本文件认可拉尔森先生为佩特鲁斯(董事长)有限股份公司所属造船厂之总经理。本合同有效期限五年……”

拉尔森叠好这张纸头，放进衣袋里。佩特鲁斯于是站起身来。

“现在万事齐备了。”拉尔森说，“我从来没有对您产生过怀疑。不过，应考虑到事情的合法性。您是个绅士。我不想再多占用您的宝贵时间。我想越早回到造船厂越好。因此不可能再回来向您辞行了。”

“也许用不着了。”佩特鲁斯答道，“我打算休息一下之后安安静静地工作。有些具体问题还要重新安排一下。”

“那好吧。”拉尔森没有伸出手，那老头儿也没伸手。走到门边，拉尔森又转回身来。佩特鲁斯仿佛已经把他给忘记了，正坐在写字台前翻阅文件。“对不起，”拉尔森抬高声音说道，“我觉得奇怪同时又感到高兴的是，那警官会记得我的姓名，甚至连小名都知道。”

佩特鲁斯望了他一眼，然后转头看着文件说：

“警官是个大好人。他常常来看我，甚至在一起吃午饭。我们谈过很多事情。他知道您在造船厂工作，也知道您来这里看我。先生，他给我看过他的工作手册。实际上，他变化不大，也许更胖了一些，更显老一些。”

拉尔森拉开门出去，随手轻轻关好。在过道尽头，他找到了那个穿线衣的老人，给了老人几个比索之后，便由后者领到原先那个持枪的警察那里。接着，他独自一人缓缓地走在花砖地上，阴森的空气使他浑身发抖，最后终于来到大街，见到了阳光。

拉尔森穿过“缔造者”的圆形广场，沿着一条墙壁破烂、长满攀援植物的街道向市中心走去，在这条街道的两侧，有一些空荡荡的公园和破旧房屋。他想：“这个地方大概没有来过，也许从前这里是完全两样的，也许以前一直愿意住到这里来。”他昂首阔步，故意选择行人稀少的街巷，挑战似的踏着重重的脚步，他已决心取得胜利，全然不知为何而战。

他想：“为什么不行呢？如果五年前我就习惯了下午在圣玛利亚旧区散步，那么现在情况也许就不同了。在这静悄悄的街道上散步，无所事事地等待着夜幕降临到新广场上空，并不急于到达目的地，不去操心工作和贫困的生活；先是出于异想天开，接着是出于友谊，仔细回想了一下那些曾经在这里、在这些有大理石台阶和铁门里生活过的亡友。为什么不行呢？这是可能的。无论如何，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做些什么事情，随便什么都可以。”

走在去新广场的半途中，他一面犹豫去哪里吃饭和过夜，一面

盘算他必须打消不回造船厂的念头。“因为别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存身,我既不能做事也不能考虑其后果了。”

他走到码头,在那里心不在焉地吃了一顿饭,在旅馆定下过夜的房间;然后一面搅着咖啡一面考虑着死亡来临前的那个阶段,考虑着那样一个惯有的虔诚时期,就在这时他冒出一个念头。他首先感到惊讶的是,当佩特鲁斯说“加尔维斯这个家伙昨天和前天来过不知多少次了,他要求见我一面”的时候,他竟然没有想到这个主意。接着,他认为有必要找到加尔维斯,有必要见某个同污浊世界有关系的朋友。加尔维斯大概像他一样也在圣玛利亚城里闲逛,也像个异乡人那样为语言和习惯而感到困惑,为寂寞孤独而苦恼。他想象着两人会面的情景,交谈的内容,对异乡他国的影射,多余的对往事的回忆,对野蛮人的蔑视。

他于是回想起五年前的圣玛利亚,回想起那段待业的时光,回想起后来那些胜利的岁月,回想起后来虽则不公正但是预见到的那场灾难。在纷纭复杂的事件和人物中,他终于找出唯一能够帮他追踪加尔维斯的人来:警长麦迪纳,那个身材高大、粗壮、有人情味、嗓音嘶哑的人。这位警长或许还在城里。他走到电话处,不抱希望地拨动了号码。

“这里是值班室。”一个睡意蒙眬的声音传过来。

“请麦迪纳讲话。”他听到对方犹豫和沉默了片刻,但沉默是明显地有希望。拉尔森微微一笑,努力回忆麦迪纳的样子,想象着他那副嘲笑和怀疑的神情,回忆起他怎样帮麦迪纳生活下来并当上了警察。

“这里是值班室。”另外一个声音警觉地响起来。

“我是麦迪纳的朋友，刚刚来到这个城市。”

“您贵姓？”

“拉尔森。我是他的老朋友，请您转告一下。”

接着，他听到一阵细微、遥远的呼声，然后是寂静，是回音撞在墙壁上的嗡嗡声。

“我是麦迪纳。”一个嗓音嘶哑的声音传过来。

“我是拉尔森，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记得，拉尔森。”说过之后，他立刻对自己的热情、对自己的紧张与傲慢感到后悔。他的脸上露出谦卑的神情，似乎在小心地讨好对方。

“啊，拉尔森，”对方停了片刻好像在喘气，“啊，拉尔森。”对方又惊又喜地重复一遍。

“是警察局长吗？”

“我是副手，就要退休了。您这是在哪里说话呢？”

“我是来江边吃鱼的，就在码头和工厂之间的地方。”

“请您等一下。”（拉尔森想：我并没有想逃跑。不管怎么不幸，我也不会损失什么，也不会出什么事情。）“拉尔森，糟糕的是天亮以前我不能离开这个地方。您能打电话给我，心里还能想着老交情，还能来看我，这真让我高兴。您要是能找到码头门口，就保险能看见出租汽车。要是没有，您就乘二路公共汽车，在广场边上下车，对面就是警察局。我等着您呐。”

拉尔森说声“好吧”，就挂上了电话。他想：“他们会拿我怎么样？既然现在没有敌人，就不会给我布下陷阱，也不会伸出援手。

倒是我能容忍一切,我可以跟他们谈谈,让他们高兴高兴。”

麦迪纳坐在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一盏强烈的日光灯照耀着烟气弥漫的房间,喝过咖啡的杯子东一个西一个地乱放在桌子和书架上。他的两条长腿架在写字台上,脸上挂着笑容,大拇指在肚皮上转来转去。那张面孔还同拉尔森记忆中的样子一样,脸上的麻点使得皱纹不曾显露,两缕白发已经出现在鬓角和耳边。他想:“这屋里原来有许多人,他把他们给请出去了。‘你们走吧,留我一个人就行了。’”

他俩谈到了往事,可谁也没提及开妓院的事。麦迪纳脸上挂着甜甜的微笑,仿佛在回忆那艰苦但抱有希望的岁月。随后,他打个哈欠,慢慢站起身,拽直了那身棕色的制服,这样更显得肥胖,不过还年轻。

“拉尔森。”他说,一面望望那个坐在皮椅里沉思的人。拉尔森脸上的假笑好像在戒备着什么,他用手机械地理了理一缕垂向眉头的灰发,“我早就想跟您谈谈。我们知道您几个月以前到造船厂去了,眼下正在那里工作。”

拉尔森想:“你又在玩什么把戏来迷惑我,你是想让我别忘记把咱俩给分开的那件事。”

“是的。”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口气里有一丝嘲讽的意味。他装出自负的神情说:“你们的消息很灵通。我住那边的贝尔格拉诺旅馆里,在佩特鲁斯的造船厂里工作。我是总经理。我们正在为复兴企业而奋斗。桌子上堆满了信件。再说,您什么都知道,我从来也不瞒着您。”

麦迪纳启齿一笑，摇摇头，嘶哑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又响起来。

“我从来也没跟您作对。过去省长说‘行了，动手吧！’，我们也不得不执行命令。事情好像过去一个世纪了。您还想起来打电话找我，我很感谢您。另外，如果我能给您帮点什么忙……”他退回写字台旁，把一条腿跨在桌角上。“来杯咖啡吧，怎么样？这是我唯一能拿给您的东西。我已经喝得太多了。正像我刚才跟您说的，我已经当上副局长了，也就算到头了。用不了一年，我该退休了。”他微微一笑，伸个懒腰，动作像运动员，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好吧，您如果需要办什么就提出来。您打电话找我，除去想看看我，大概还有别的事。”

“不错。”拉尔森说道，他两条腿交叉，把帽子扣到膝盖上。“您打一开头就发觉了，从电话里一听出我的声音，就知道有事找您。事情不大。造船厂里有个职员，名叫加尔维斯，是个台柱子，几天前失踪了。他给我寄了一封辞职信，发信的地点是圣玛利亚城。他老婆当然很着急。于是我答应她出来找一找。可是跑遍了全城，连一点线索也没发现。我在回去之前，于是就想起来求您帮忙，看看您是不是知道这事。您想想看，我要是毫无消息带给他老婆，她会怎么样。”

麦迪纳等了片刻，慢悠悠地看看腕上的手表，一推写字台跳到地上。他走过来，皮鞋后跟踩在地毯上发出“吱吱”的呻吟声。他在拉尔森身边停下，双腿几乎触及后者的膝盖。他那满是酒气的面孔凑到皮椅上的人，苍老的脸上露出冷酷和厌恶的神情。

“拉尔森，”嘶哑的声音变得不耐烦了，“还有别的什么事？下班

之前,我还有几件事要办。我已经累了。关于这个加尔维斯,您还知道别的什么情况?”

“别的情况嘛,”拉尔森应声说,“我没有任何瞒着您的事。”他举起双手,笑着看看手掌。他毫不畏惧,他想起有许多人这样俯身问过他,这使他精神振作起来。于是便问道:“什么别的情况?可以说那是商业秘密了。不过我可以肯定,相信您是没错的。加尔维斯来圣玛利亚,是控告佩特鲁斯先生的。法官下令逮捕了佩特鲁斯先生。您知道,他就关在这座楼里。今天下午我同他谈过话,他告诉我,加尔维斯曾经多次企图见他。情况就是这些。当时我想,这很容易理解,既然加尔维斯在这一带转悠,你们一定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别的嘛,再也没有什么了。用不着从嘴里再掏什么了,因为我知道了。”

麦迪纳俯视着他说:“那好吧。”说罢又是微微一笑。接着,他两手移到胸前,系好上装的纽扣,同时脸上露出困倦的神情。他又一次望望手表。

“好啦,拉尔森,劳您驾,请站起来。我相信您说的话,可以肯定您不知道别的情况了。请过来,我来给您讲其他情况。”

他们两人走出办公室,向铺有瓷砖的楼道走去。

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名看守双脚一碰给他俩敬礼。麦迪纳猛然拉开一扇房门。

“请进。”他以厌倦而又满含嘲讽的口吻说,“今天我没法请您挑选了,咱们两个太穷了。”

他俩在昏暗的光线下走着,寒冷的空气里弥漫着消毒药水的气

味，走过一把牙科医生使用的皮椅，走过两个装满金属物的玻璃橱柜（二者之间有个没有使用的暖气装置）。又绕过一个罩着凸起布套的小写字台。在这房间的尽头（更加寒冷），几乎在靠墙的地方有一排钢制档案柜，它的周围是一个方形的水槽。他们看到一张盖有白色粗布的桌子。麦迪纳上前揭开白布，随后摸索一阵衣袋，终于掏出一方手帕，赶忙捂在口鼻上，压住了喉咙里的喷嚏。

“这就是故事的尾声。”他低声说，“这是加尔维斯，对吗？请看仔细，赶快说吧，不然要伤风了。是不是他呀？我不催您了。”

拉尔森对石桌上那张苍白、变硬、毫无表情、有些猥琐的面孔以及那半开半闭、没有光泽的眼睛，既不感到痛恨也不感到可怜。他想：“正像我经常说的那样，脸上没有笑容，他总是这副嘴脸，掩盖着他的真面目；总是极力使我们相信他在活着，而实际上，他处在一个怀了孕的坏女人、两条尖下巴瘦狗、我和孔茨、没完没了的泥泞、破败的造船厂以及希望的谎言之中，早已厌烦极了。现在，他脸上倒是像个男子汉似的严肃起来，既坚强又焕发出光彩，可他生前却从来不敢如此面对生活。现在只剩下一对肿胀的眼皮和半月形的视线。但是，对这一切他都没有过错。”

“是的，这是他。事情是怎么回事？”

“很简单。他跳上木筏，经过拉多雷岛的时候就下水了。我们晚到了半个小时。但是，太阳下山的时候，他自己漂到水坝上。我知道他是加尔维斯，只不过想让您亲眼看看。”

麦迪纳又打了一个喷嚏，他一手搂着拉尔森的脊背，一手迅速拉过白布，将死尸盖好。

“情况就是这些。”他说，“现在您给我签个字就可以走了。”他领着拉尔森穿过昏暗的走廊，来到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两个人在下象棋。这时，麦迪纳忽然板起面孔，不再露出刚才那副亲热的劲头。

他说：“多萨尔，这个人刚才辨认出了那个溺水者的身份。请把他说的话记录在案，然后就可以让他走了。”

多萨尔把打字机搬到写字台上。另外一个人漫不经心地望望拉尔森，便又埋头看棋盘去了。麦迪纳穿过整个房间，从另外一个门口走了，既没有告别也没有回头。

拉尔森脸上挂着笑容，对这个鬼机灵的手段感到震惊，他没等邀请就自己坐下了。他不久前还判断加尔维斯不会死去，还以为自己不会落入如此简单的陷阱中，还以为天亮时可以回到造船厂，回到那个一成不变的世界里去，而且不带任何消息。

造船厂之七

凉亭之五

佩特鲁斯之家

窝棚之七

这样，拉尔森便做了最后一次逆水之行，一次返回造船厂的旅行。这一次不仅仅是孤独，而且还有恐惧在伴随着他，还有一种刚刚开始清醒感，对自己怀疑一切的态度开始动摇起来。他孤陋寡闻，而且怪模怪样地拒绝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

他最终落得孑然一身，再也无戏可唱了。他缓缓地迈步前行，不慌不忙，既不想择路又没有这种可能，在这片版图日渐缩小的土地上走着。他的骨骼、神经和身影并非自身情愿，要他按时到达那个并不知晓的某地。他许诺过（并非向什么人）约会的事一定要完成。

就这样，这位拉尔森先生，独自一人，登舟上溯，在一个冬天的黄昏里，百无聊赖地望着两岸依稀可辨的树丛，右耳倾听着不知名的鸟雀的叫声。

就这样,除去知道他所能了解的那点事情之外,他便一无所知了,不过在旅途的某个时刻,他还发现了他站在佩特鲁斯囚室窗前眺望缔造者广场时所寻找的东西。夜幕遮盖住整个大地时,他到达了造船厂之港。他走进贝尔格拉诺之家,以便稍事休整,振作精神,洗澡更衣,然后再喝上一杯,让那位老板看看他可不是幽灵。

他上楼回到自己房间,由于寒冷而全身颤抖。他只穿着衬衣,跑到走廊尽头的洗澡间,不伸手开灯,全凭在暗中摸索。黑夜中,除去欢快的流水声,周围一片寂静。他从澡塘里站起,擦干身上的水迹,立刻感到寒风刺骨。他抬头寻找月亮,见到的却只是胆怯的银光。正是此时他才毫无顾虑地接受自杀的念头。他的腹部靠在洗澡池的外沿,慢慢擦干手指和后背;他干得一丝不苟,心情平和,不去操心日期;他盘算着到他死的那一天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有些什么事情要做。他知道他的死不会是一桩个人小事。

穿好衣服之后,他对检查左轮手枪已经感到厌烦,对扳开机头、转动空弹膛已经厌烦,对把子弹摆在桌上像检阅仪仗队似的一一过目已经厌烦。他衣着整齐,头发光洁,面部干净,没有胡须,散发着香气;一个臂肘支在桌上,手指夹着香烟,吸进嘴里,并不咽下。他独自一人坐在这个小得可笑的房间中央,感到浑身冰冷,寥寥可数的几件家具使这个小房间变得正常了。他脑海里没有去想往事,只知道今后非做不可的事自有他或别人去完成。他感到幸福,这种幸福感已经毫无用处。正在这时,用人敲门要进来。

拉尔森没有转身去看那用人,他早就熟悉那窄窄的前额、又黑又硬的头发以及脸上警惕但不动声色的神情。

“我好像听见您叫我。您这一阵子过得怎么样？听人说您不会回来了。我来问问您是不是要在这儿吃饭。运鲜肉的船来了。”

小伙子用抹布擦擦床头柜和闹钟座，然后走近桌子，抹去上面的尘土。

拉尔森说：“你听着：这里做的破烂玩意儿，我一口也不想吃。”

“您说得对。”小伙子起劲地回答说，“可是，送来的肉很新鲜。其实您吃不吃跟我没什么关系。”他弯腰擦拭桌腿，随后直起身子一笑，并不去看拉尔森。

“你听着”，拉尔森又重复一句。他把烟蒂丢到地上，扭头用吃惊的目光望着用人。“你在这个地方干什么？我是说，你留在造船厂之港、留在这个肮脏的角落能盼到什么？”

小伙子没有搭腔，好像不相信人家是在说他。他的一条腿斜靠在桌子上，然后慢慢把那块用作抹布、手帕和餐巾的烂布头举到眼前，用食指和拇指捏住两角，面带笑容，露出白牙齿，不停地抖动。

“这话我也可以问您，而且理由更多。您在这儿盼什么呢？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您希望的事一件也没有办成。这是我的看法。”

“啊，”拉尔森感叹一声，开始搓起双手来。

小伙子离开桌子，手里扬起抹布，转身跳了两下舞步。

“下面那个蠢婆子大概又要喊我了。”

拉尔森又“啊”了一声，那张正在思考和盘算的面孔扬了起来，它有些变形。他要做一件小小的无耻勾当，如同需要一剂补药或者一杯烈酒一样。“这么说你是不想弄明白我的话了。去把滑石粉给

我拿来，给我擦擦鞋。”

仍然跳着舞步，小伙子跑到衣柜前，取出一个黄底蓝花的椭圆形铁盒来，然后双膝跪到拉尔森懒洋洋伸出的双脚前，开始往鞋上洒粉，接着用破布擦起来。他摇晃着发亮的黑发以及那身破旧的白外套。

“这么说你是不想弄明白我的话了，龟儿子。”拉尔森一字一顿响亮地说道，好像有意要拉长这句话。

他等用人放好铁盒关上柜门以后，悄悄走到小伙子身后，知道他在等着什么，便用一只手捏住了他的面颊，轻轻地摇了一下，便松开了手。小伙子纹丝不动，偏过脑袋望着别处，把破布举到齐肩高，打开来又折上去。

“你要放明白点，一定要懂得这个。”拉尔森声音缓慢而厌烦地说道，“你要记住，摸你脸的是个正派人。可从前我认识一个人，他跟你一样。甚至连体形都很像。他常常早晨起来卖花，地点在科连特斯大街，那个地方你不认识。他把花卖给艺术家、女逃犯和情妇们。我记得他专门卖紫香堇。后来，过了好多年之后的一天晚上，我没走几步便来到一家咖啡馆，坐到一张有人的餐桌旁边。那个卖花的小伙子提着紫香堇的花篮走到我身边。两个负责收杯子的伙计来来去去经过小伙子的身边，都要笑着摸摸他的脸蛋。不知道你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我跟你谈话就像父亲对儿子一样。我想起的这些话是一个人一生最后才会发生的事。”

拉尔森走到桌旁拿起帽子，他对着镜子戴上帽子，打着口哨想吹出一支老探戈舞曲，曲子的名字和歌词他已经不记得了。这时，

用人走到床前，脊背对着拉尔森，然后用那团破布把窗框又擦拭一遍。

“事情就是这样。”拉尔森忧郁地说。他解开大衣，掏出钱包，数了五张十比索的钞票放在桌上。“拿着，送你五十比索。我欠的钱另外单算。不过，你可别对老板说我在到处散钱。”

“好吧，谢谢。”小伙子边说边走过来，“这么说您是不在我们这里吃饭啦。那我可得通知下面。”他的声音这时有些气喘，显得更尖、更无礼。

“要是在几年前，我不但不会劝你，还要把你打得灵魂出窍。你还记得刚才我给你讲的故事吗？他提着一束束紫香堇走过来。那也是个冬天。那两个伙计摸他的时候，他没办法掩饰，因为大家都看见了；他还不能生气发火，因为人家有钱有势嘛。他干的是世界上最伤心的事，可脸上还得挂着笑容。但愿上帝一辈子别让你有这种笑脸。”

“对。”小伙子应道，几乎是快乐地眨眨眼睛。他已经把餐巾铺在桌上，这时便把双手撑在台面上。他那黧黑的脸盘瘦得像个娃娃脸，那歪斜的眼睛和半张的嘴巴带着睡意，现出狐疑的神情和打算提问题的样子。“您是不是要很晚才回来？看看要不要给您留点吃的东西。啊，对了，我忘了一件事。有人给您送来一封信。我想这是昨天的事。”他低头在裤子口袋里摸索了一阵，然后掏出一个开口的边角磨破的信封。

拉尔森念起一张淡紫色的纸片来：“我们同何塞菲娜等您在楼上吃晚饭，时间八点半。不过请早些来。您的朋友——安·伊。”

“是好消息吗？”用人问道。

拉尔森没有回答，他头也不回地走出房门。来到楼下，他不想跟老板喝上一杯，便快步来到寒冷的街道上。他向右拐弯，走上一条更宽阔的大街，两边是光秃秃的树木。月亮还没有出来，天上只有朦胧的白光可以为他照亮。他什么也不想，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向前走去，因为想想他自己这副四处奔走的样子便什么也想不成了。他不仅要去别墅，去那间昏暗寒冷的凉亭，去那座雕像破败、野草丛生、花坛残坏、树木枯萎的花园，而且要在这大冷天里去那座楼里。那里地势很高，远远超过河水上涨的最高水位。他要到那间暖烘烘的客厅里去，那里有壁炉，欢快的火舌令人头昏目眩地跳个不停；他要坐到那把年代最久、最受敬重的扶手椅上，那把唯一可以承受佩特鲁斯身体的扶手椅上，或者是那位亡故的母亲坐过的扶手椅上，或者是那位他叫不出名字并且也已死去的姨妈坐过的扶手椅上。

他大步向前走去，一面想象着如何迈进那个温暖、整洁的房间，如何骄傲而从容地主演那一台戏，一面检查这样设想会有什么错误。他准备做些变化，以使用自己独特的风格满足这一历史需要：指明新时代的开端。

他摁响门铃。在等着开门的时候，他看到月亮正渐渐离开树冠，它是从某个谷草堆或者农场里人烟罕至的某个破茅棚后面向上升起的。接着，像在魔幻小说里描写的那样，他从这种小说里感受到不断克服困难的快乐，穿过大门，从那个沉默寡言的女人何塞菲娜面前走过时，她并不回答他的问候。随后，拉尔森摆脱开狗的追

踪，有意用力踏响鞋后跟，碎石路上便发出清脆的撞击声，他一面躲避迎面挡住去路的树枝，一面极力把水池中月亮的倒影和散发出来的水汽看作受到欢迎的表示。

拉尔森走到凉亭的入口处便停下了脚步。何塞菲娜的走路声以及狗的呼气声从他身后传来。

“我们没有料到您会来。”何塞菲娜说道，并且发出不耐烦的声响，远远听去像是笑声。“先生一声不吭就走了，回来的时候又是一声不吭。”

拉尔森依然面对着凉亭入口处的尖形拱门，望着里面的石桌和座椅，双手插在衣袋里，斜身看着天空，等着月亮爬上肩头。

“天晚了，我不知道怎么下来给您开门。”何塞菲娜说。

拉尔森摸摸衣袋里安赫莉卡·伊内丝那张便笺，但是并没有拿出来。这个别墅有两扇窗户里闪烁着灯光。

“如果您愿意的话，请明天再来吧。今天实在太晚了。”他熟悉这种挑衅中含有希望的口气。

“请你告诉小姐，我已经来了。是她捎信请我到家里吃晚饭的。”

“这我知道。那是三天前的事。是我亲手把信送到贝尔格拉诺之家的。可是小姐现在病倒在床上了。”

“这没关系。我之所以必须去圣玛利亚是因为佩特鲁斯写信叫我。请你告诉她，我带回来她父亲的消息。我一定要跟她谈谈，哪怕几分钟也行。”

那女人又像刚才那样轻轻一笑。拉尔森仰头向上看去，注视着

别墅的灯光。他很想取消这段在外面等候的时间,尽快坐到炉旁那高高的木制扶手椅上。终于,她转回来了。

“我跟您说了,她病了。她不能下楼,您也不能上楼。您最好还是走吧,我要锁门了。”

拉尔森只好慢吞吞地转过身,心里感到怀疑并且涌起一股怒火。他看见这个小巧的女人,月光照在她脸上,嘴角挂着一丝微笑。

“她要我不必回到她房间里去了。”她咕哝道。

“我这里有她父亲一封信。事情确实是很要紧的。咱们上楼吧?”

那女人向前跨出一步,她等着这些话的含义冷却下来;再等一秒钟,让这些话烟消云散。接着,她真的笑起来,但笑声是压抑和挑衅的。拉尔森明白了这笑声的含义,也许他并非自愿,而是躲藏和活跃在他脑海里的记忆使他明白了她的笑声。他伸出一只手去,用手背摩擦一下那女人的脖颈,随后便沉重地滑到她的肩头上。他听到那只狗在嗥叫、在直挺挺地竖着脑袋。

“小姐病了,她大概睡了。”何塞菲娜说道。她几乎一动不动,唯恐吓跑了那只手;她希望他的手上再增加些压力。“您不想走啦?这外面不冷吗?”

“外面很冷。”拉尔森承认道。

她脸上一直挂着笑容,眯缝着发亮的眼睛,用手摸摸狗头,要它安静下来。她贴近拉尔森,肩头上仍然托着那只手;稳稳当当地像长在肩上一样。随后,他低下头吻吻她,模模糊糊地回忆起并辨认出嘴唇上那股热烈而平和的劲头。

“傻瓜，”她说，“等你这么长时间，傻瓜。”

拉尔森高兴地点点头。他望着她，仿佛两军遭遇一样，直视着她那大胆和发亮的眼睛，直视着那张月光下露出白牙的普通嘴巴。那女人摇晃着脑袋，用惊喜的目光打量着这个男人的傻样儿，考虑着生活的荒诞性，然后再次吻吻他。

拉尔森由那女人挽着手，穿过花园中央属于凉亭的地域，从雕像旁擦身而过，他闻到来自花草、湿气、烤面包和鸟窝的种种怪味。他们来到通向住房的花砖路面上，砖下是厚厚的水泥路基，隔开了地下水的侵袭。何塞菲娜的卧室在底层，与花园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拉尔森在黑暗中笑了。“我们这些穷人呀！”他心里平静地在想。她点燃灯光，请他进屋，帮他摘下帽子。就在她来来去去收拾东西或者藏起什么东西的时候，拉尔森并不东张西望，他站在屋中央，感到脸上有股已被遗忘的青春活力在燃烧，使他身不由己地咧嘴一笑，并且伸手理理前额上那缕稀疏花白的头发。

“坐下来吧。”她并不望着他，声音平和地说，“我去看看那疯子是不是有事，马上就回来。”

她快步走出去并轻轻关上屋门。拉尔森这时感觉到在这整整一天的奔波劳碌中、在整整这个冬天里所忍受的寒冷，现在已经深入到骨髓了，并且从骨髓中向他所到之处散发出一股冷气。他极力想笑，想忘掉一切，于是狂热和激动地检查起这个女佣的房间来。他动作飞快。敲敲这里，掀掀那里，为的是瞅个明白；他要用安慰填补悲哀造成的空虚，要在离开人世之前仔细闻闻家乡的气息。那些

家具还在老地方：只要一撞床栏杆就丁当作响的铁床，洗脸盆和绿瓷水罐，罩着发硬发黄薄纱的穿衣镜，圣徒、圣母的画像，喜剧演员和歌星的照片，镶在椭圆木框中的一个已故老妇人的铅笔素描像。屋里有股难以驱散的混合怪味：隐居的、女人的、油炸食物的、脂粉的、香水的、在木箱中存放的破布头的等等气味。

当她返回屋里时，手里拿着两瓶白酒和一个杯子；她一面喘气一面用脚把门关上，免得冷风吹到他身上，免得那只哀叫的狗把爪子伸进来。拉尔森感到真正应该恐惧的时刻刚刚来到。他想这一切使他恢复了本来面目，恢复到青少年时的真面目。他又回到了青春期，又回到了那间属于他或他母亲的房屋，同一个与他想象的女人住在一起。他可以跟这个女人结婚。可以揍她或者自己出走。总而言之，无论他做什么事都不会搅乱这种亲密无间的感情。

“这事办得好，快给我喝一口。”他说着，此刻方肯在床沿上坐下来。

他和她就用那只唯一的杯子畅饮起来。他想把她灌醉，一面漫不经心地傲然微笑，一面以此应付那女人滔滔不绝的谎话、提问和责骂。最后，他终于说道：“你闭上嘴吧。”接着，他小心翼翼地推开那个插有花束的水罐，在洗脸盆里烧掉了那张由老佩特鲁斯签署的通向幸福天地的护照。

他不想打听睡在楼上那个女人的情况，那楼上曾一度是他憧憬的福地。他脱光衣服躺下，整整一宿他都要求保持安静，与此同时他十分感激那女人用灵与肉奉献给他的亲密友情。

黎明时分他起身告别，一字一顿地吐出了一切必要的誓言。他

挽着她的胳膊,另一侧由小狗保护,向大门口走去。天上已经没有月亮,地下是一片令人难以置信的寂静。接吻告别的前后,他都没回身张望那座难以进入的楼房。走到这条街尽头,他向右拐去,踏上去造船厂的路。此时此刻,拉尔森已经不再是任何一种人了。同何塞菲娜共度良宵是为了回顾以往,是同自己的亡灵会晤,是自我解嘲与安慰,是一种障眼法,而任何人处于他这种地位都是可以识破的。

走到造船厂,他向那座巨大的黑色楼房瞥了一眼,他是在行使职权。接着,他绕着加尔维斯和他女人住过的窝棚转了一圈,静悄悄地窥探着什么。他闻到一股燃烧桉树干枝的烟火气味。脚下践踏着铁渣碎木,然后弯腰坐在木箱上,点燃一支香烟。他蜷缩着身体,纹丝不动地坐在这个最高的地方,意识到自己身处绝对的孤独之中,这种处境早在许多年之前他就曾经设想过多次、盼望过多次。

起初,他听到一阵沙沙声,接着立刻看到从窝棚的几何图形式的窗缝里透出的淡黄色光芒。那沙沙声开头是一群幼崽的嗷嗷待哺声。随后,由于他听错了声音,变得通情达理,并且诅咒这个世界。大概这屋中不祥的光线比那压抑的不停的叫声更有内容,他便不再看那光线,而是闭目抽烟,直到烟蒂烫着手指方才睁开。在这寒夜将尽的时刻,全身缩成一团,极力变孤独为心不在焉。

他痛苦地站起身,沉重地拖着双腿向窝棚走去。他登上台阶,看到了用手锯锯出的漂亮窗洞,它一部分用玻璃、一部分用马粪纸、一部分用破布遮盖起来。

他看见那女人半裸着躺在床上,由于流血不止而在用力挣扎,

只见她用手指紧紧抓住脑袋疯狂而有节奏地晃动着。他看见了那令人惊讶的圆肚皮,看清了那对眼睛的锐利目光以及咬紧牙关的表情。只是过了片刻他才明白并且想象出这里的圈套。由于恐惧和厌恶,他浑身发抖,急忙离开窗口,快步向河岸走去。几乎是用跑步的速度,他脚下淌着泥水,匆匆经过沉睡中的贝尔格拉诺之家;几分钟后,来到木材码头。他眼里含着泪水,呼吸着周围植物、木材和烂泥塘的气味。

在天大亮之前,驳船上的水手把拉尔森从造船厂之港的木牌下唤醒。他弄明白了驳船是向北开去的,便向水手提出用他的手表抵作船票,他们痛快地接受了。他蜷缩在船尾部分,等着人们把货装好。马达转动起来之后,周围响起一片告别的喊声。这时,天空大亮了。拉尔森裹在大衣里面,浑身发冷,心里焦急;他脑海里浮现出一幅阳光明媚的风景画:何塞菲娜在同小狗嬉戏;佩特鲁斯之女形容憔悴、声音尖细地在问早安。拉尔森低头看看手掌,出神地审视着手纹的走向以及血管跳动的速度。他极力扭头向船外望去(驳船已经开动,正在弯弯曲曲地驶向中流),望着造船厂那飞快形成的废墟以及正在悄悄坍塌的墙壁。对于行船的嘈杂声,他充耳不闻,可是那只竖直的耳朵却能听出苔藓在乱砖堆里生长的簌簌声以及铁锈吞食金属的沙沙声。

(或者,这样的结尾会更好一些:驳船上的水手发现他的时候险些踩到他身上,他们看见他黑乎乎地缩成一团,脑袋垂到双膝上,盖着那顶油腻的帽子,上面沾满了露水,他本人则在说梦话。他粗暴地解释说,他必须逃走;他还恐怖地挥舞着左轮手枪,结果水手们给

了他一耳光。其中有个人可怜他，把他从泥水里扶起，并且给他喝了一口甜酒。别的几个一面哈哈大笑，一面拍拍他的肩膀，装出给他掸掉衣服上泥土的样子，他那身制服已经破旧不堪，紧紧地绷在肥胖的身体上。水手一共三人，姓名都是有案可查的。当时他们正穿过黎明时的寒冷街头，不慌不忙地走在驳船与小货棚之间的路上，他们一面运货一面并无恶意地骂着脏话。拉尔森愿意把手表给他们抵作船票，他们夸奖一番但是没有接受。他们极力不让拉尔森感到难堪，帮他上了驳船，把他安顿在船尾的板凳上。当驳船由于马达的开动而颤抖起来的时候，拉尔森披着水手们扔给他的麻袋片，脑海里想象着造船厂楼房倒塌的详细情景，耳边仿佛听到颓垣断壁中发出的嘘嘘声。但是，令人最难以忍受的大概是九月的怪风，这是春天不可阻挡地透过冬末的缝隙，传来了第一个微弱的信息。拉尔森舔着干裂出血的嘴唇，呼吸着春天的气息。与此同时，驳船正在顽强地逆水上行。就在那一星期尚未结束的时候，他由于肺炎而病死在罗萨里奥城。在医院的病历上，写下了他的真名实姓。)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造船厂

作者 = (乌拉圭) 奥内蒂著

页数 = 2 0 3

S S 号 = 1 2 7 9 0 5 4 2

出版日期 = 2 0 1 0 . 1 0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